

新 文 化 叢 書

蘇 俄 的 婦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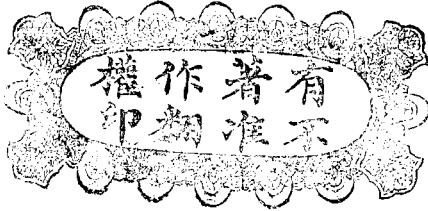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美 國 J. Smith 著

女 婦 的 俄 蘇

譯 合 裳 明 詠 紹 蔡 董

民國十九年一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一月發行



蘇俄的婦女 (全一冊)
定價銀九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譯者

蔡詠明
董紹裳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邯鄲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揚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香港 新加坡

中華書局

(五六三一)

題記

著者斯密司 (Jessica Smith) 女士是美國一個藝術家的女兒，曾在本國從事婦女運動多年，一九二二年去俄國參加鄉村的社會工作，饑荒以後來到莫斯科，於俄國語言及社會家庭狀況多所探討，一九二四年返美國為俄國農田改良募捐，一九二六年再來俄國助理農田工作，著有論述俄國之論文數種。

原著是『先鋒叢書』(Vanguard Press)之一種。該叢書中關於俄國問題的著作已出十餘種，其中如蘇俄之教育，蘇俄與隣國，新俄國之新學校等皆譯成漢文，而蘇俄之教育一書且有數種譯本。編者引言中述及刊行此種叢書的態度，說是與陸地的發現和科學的發明同其無成見，讀者但能讀完這幾種譯本大概可以相信這並不是一種誇大或掩飾的言詞。

關於本書的內容，原著者觀察的細緻，推論的精到，大可使我們驚嘆，這是留待讀者來領

略的，不想再說什麼。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譯者

蘇俄的婦女

目錄

第一章	舊式的生活	一
第二章	女工	一三
第三章	鄉村的婦女	三五
第四章	婦女之加入公共生活	五六
第五章	婦女與教育	七九
第六章	向着新家庭的過渡	一〇五
第七章	結婚法之製定	一二一
第八章	革命的道德	一四一

第九章	居住問題·····	一六六
第十章	母親與嬰兒·····	一八七
第十一章	人民的飼養·····	二一五
第十二章	未來的公社之建設·····	二二五

蘇俄的婦女

J. Smith 著
蘇詠裳 董紹明 合譯

第一章 舊式的生活

關於廢除婦女在一切關係上（由家庭到國家）所受的歧視的法律和宣言，蘇維埃俄羅斯都已發表過了。第一部法令把婚姻解釋作自由聚散的一種結合，國家所關注的祇是保證小孩們相當的照料和給養；承認母性是應受政府資助和保護的一種社會功用；除掉未婚父母的小孩所受私生子的污辱；創立同工同酬的原則；並且給與婦女以市民的完全權利和義務。

但是法律不能將許多世紀傳流下來的偏見在十年之內掃除淨盡。這不過是經驗和教育的背景；經驗和教育才可以養成思想和行爲的新習慣。

『立下好的法律是一件事，』雅露斯拉維士基（Yaroslavsky）一個著名的共產黨員，

寫道，『創造實際的條件，使這些法律見諸實行，又是一件事。我們在這裏要坦白地說，如果我們整個的生活方式沒有激進的改造，就一定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因爲目下正在進行激進的改造，所以很難寫出現在俄國家庭的清楚情形，並且如果未嘗考慮正在改變的家庭關係，就不能夢想婦女的新地位。任何形式的新家庭不能圓滿實現，除非等到下一代的人受了教育，舊日的偏見和舊日的污點都掃除淨盡，新的房舍和新的公社都建設起來。我們所能見到的一切，不過是可能性趨勢和起點罷了。

革命對於家庭生活最高的成就，乃是給與做妻，做母，做市民的婦女以完全的平等，藉了使她明白平等意義的教育來使她享受平等的種種制度，以及舊時束縛她在家庭中的工作之社會的處理。往日維繫多數家庭在一起的有兩大條件，一是妻和小孩對於丈夫和父親之經濟的依賴，一是家庭中其他各人對於女人的依賴，如預備食物，衣服和生活中的零碎事件。這些遺制已經廢除了。男人和妻在經濟方面彼此是獨立的，共同擔負小孩們的養育，公共住宅，托兒所，公共膳堂和洗衣店，漸次代替女人在管理日常生活零碎事件上的地

位。

在西方各國，婦女所獲得的政權，不過是給她們一種武器，用來對於社會和經濟的解放做更有效的鬪爭。經濟權——沒有它別的都不足數——往往來得最後。在蘇聯的歷程則恰恰相反，經濟權來得最先。大家相信但凡革命所能給與的，男和女一樣有份。憲法上清楚的規定，凡在十八歲以上的人們，不問性別，信仰，或國籍，祇要從事社會上有用的工作，不爲了個人的利益來榨取別人，對於蘇維埃都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裏邊包括家中的主婦，她們的勞力被認爲有價值的，因爲有了她們的勞力，男人的生產勞力才成爲可能的。(註一)但是關於婦女解放，大體上著重經濟方面過於政治方面。因爲她們有着無教育和貧乏的大原因，所以祇有藉着經濟的自由和教育，她們才可以獲得充分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獨立，給與她們政治的平等以一定的意義。

在舊政體的壓制下，男女羣衆，在經濟和政治方面，少有程度的差別，但在社會方面，婦女當然要受最壞的待遇。大體說來，在社會和家庭的關係上，女人對於男人正如工人和農人

對於在上的階級一樣，在這一方面，革命所給與女人的，要比給與男人的多着許多。克倫斯基的時代，似乎沒有注重這件事，對於解釋家庭關係的舊法律，并未做改訂的嘗試。但是布爾賽維克的政府得權不到一個月，還在爲生存而戰爭的時候，便乘機將婚姻和家庭的整個基礎完全改變過來。

要打算明白俄國婦女現在的地位，先要了解她們向來的艱難。要想描寫當日的情形是十分容易的。老俄國到處都遇得著。那種情形便殘留在鄉村的道路上，在那裏農婦負着木材，番薯，或麥子等非人的重擔，蹣跚而行；在卑陋的 *izbas*（小屋子）裏，農夫對於妻的暱詞不是「拉塌鬼」就是「傻瓜」；日常的見禮是咒罵；在鄉村會議席上，「枯拉克們」（註二）形成聯合戰線，反對婦女在蘇維埃中的地位。有的時候工人因爲妻去參加會議而加以撻楚。甚至在較開通的社會裏邊，老俄國還是膠固着像隔年未落的樹葉一樣，沒有被新芽擠下來。我聽人說，就是在共產黨員中，還有人主張他們的妻最好是留在公共廚房的火爐前面，不要來同自己環坐在會議席上。

舊時的諺語也講到這種故事。『鷄不是鳥——baba (巴已) (註三) 不是人』——『撻你的妻去預備早餐和午餐』『我以為我看見兩個人呢，不料却是一個男人和他的妻』——『女人的路線——走向火爐的起點』——同性質的話還有許許多多。

比起世界各地婦女生活的狀況來，沒有很大差別，不過是更卑賤更退化，因為民衆是落後的，東方的氣息又深入了俄國人的生活，男性看女人不過是一種所有物。

從孩童的時候起，俄國婦女就常是屈服在男人的權勢下面。她是父親的女兒，丈夫的妻。母親的心意是算不了什麼的。當她一結了婚，她的靈和肉兩方面就都轉移給丈夫。祇有教堂結婚是正當的，教堂專斷結婚生活的條件。『妻必須畏懼她的丈夫！』這是祭司在舉行神聖的結合的婚禮時所下的可怕的警告。一個青年新婦當然要畏懼一個男人，平常是由自己選定的，對於他，在將來，按着俄羅斯帝國神聖的法律，『要服從他作一家之主，要用愛情，名譽，和無限的順從來相處，要按着主婦的本分納上一切的歡樂和忠誠。』(註四)

做妻的本分是要隨從丈夫到任何地方去。如果她離開了他，他可以派警察把她帶回家。

中來，而這不忠實的妻是可以送入監獄的，倘非得到丈夫的同意，妻不能領取護照或擔任職務。離婚要受教堂的判決，祇是有限的幾條理由可以允許，而最大的理由是由證人證明通姦。律師和證人往往索極大的手續費，這種離婚的費用祇是很有錢的人可以擔負得起。法律非常偏向着男人，女人要離婚幾乎是不可能的，反過來，一個無罪的女子，一旦被法庭判為不忠誠，硬使她母子分離，乃是常見的事。女兒祇可承受十四分之一的遺產，其餘的十三份完全歸兒子或兒子們所有，結婚以後，女人的一切財產統歸她的丈夫管理。

在工作 and 摧殘的兩種壓制下，農婦變得蒼老，醜陋，而且性劣。當她們的弟兄們到學校去讀書的時候，她們被關在家裏照料弱小的弟妹。你還可以看見她們八九歲的小女，很重的抱着母親的孩子，她們自己的幼稚的面孔上現着衰老的預兆。在勉強可能的時候，她們就跟着家人一起做田間的工作。當她們到了結婚的時候，常是由父親選擇丈夫，將她的女兒賣給出價最高的男人。農夫的結婚是不含有什麼情趣的。一個十六歲的活潑的女孩的結婚，不祇爲了她自己的方便，也是爲了她丈夫的家庭的方便。因爲她是他們工作中的新助

手，并且一定要殷勤的工作，來償還她所消耗的食品。小孩開始一個隨着一個的生下來。

生產率高死亡率也必然隨着增高，一歲的小孩的死亡率，平均是每百個中死掉二十七個，有些地方還多到五十個以至七十五個。產婦的死亡率也是高的。鄉村裏面的醫藥救助是極不適當的，忙不過來的產婆，祇能顧到一年中無千無萬的小孩的一小部分。平常都是僱用村中的 *Midwife*（伯加）（註五）母親躺在雜有油蟲和南瓜的火爐上頭，粗糙的污穢的手接下她的嬰孩，包裹在破布裏邊。伯加灑許多聖水在產婦和嬰孩身上，以驅逐邪魔，而濺穢的預防却一點也沒有。教堂教訓人，女人在分娩的時候是不潔的，有許多人將產婦擱在牛棚裏面，墊着一塊污穢的羊皮，來產生嬰孩，不祇從前是這樣，到現在還是這樣。

雖然墮胎是要受法律上嚴重責罰的，但是那些不願意繼續生產的母親，還是去求伯加的指导，她們用指甲或結鈕鈎或紅蘿蔔來施手術，或者開一個危險的藥方。鄉村對於節育的方法當然毫無所知，即在城市中曉得的亦很少。

農婦終生襁褓着，和男人一樣的在田中操勞，小孩生下來又死了去，做飯和挑水，河邊

洗衣服，燒火，整個冬季在紡織，取牛奶——凡此一切工作都一無所得，所得的是丈夫的虐待和鞭撻。冬季是多數農婦特別可怕的時候，因為農人在這個時候工作比較的少，不能不在家中做長時間的逗留，酒和性便成了他們整個的生活。女人是無所逃避的。能起反抗的很少。而反抗時要受非常的迫害，所得是不償所失的。

城市中的生活，於貧民階級絕無好處。做丈夫的從田間到工廠，如果有一點改變，那就是變得更野蠻了。他的家庭生存在更擠擁，更艱難的狀況下。妻和小孩們都在工廠中工作，女人比男人要受更大的榨取。她們得較少的工資而作較長鐘點的工，抬舉很重的物件，工作到分娩的最後一分鐘，一生下小孩來即刻回工廠去上工，生怕一旦失了業。從前連一條保護女士的最初步的法令也沒有，直到一九一二年才通過一件社會保險法，但是因為受了許多限制，簡直沒有發生什麼效力。

許多女人被迫去做娼妓——開幕時受教士祝福的議院通過這是一種合法的組織。許多棄兒被擲入井中與河中。育嬰堂充斥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私生子。甚至父親即使願意承

認自己的子女，法律上也不能允許，祇有私生子本身能證明自己的父母，才可以得到少許的供給。父親一旦死去，私生子就失掉與他的家庭的一切關係，因為人不以為他與其餘的人是有絲毫連屬的。

在中等階級裏面，雖然生活較為安閒，較多享樂，但在精神方面婦女也是同樣受賤視的。小工業家或商人的青年女兒都被關在屋裏，往往直到舉行婚禮的時候才能見到丈夫的。而貴族階級也是同樣的受壓制。青年人們到處被監護，結果是在暗中造成絕對的放縱。每一個城市都有『小燭俱樂部』(Little Candle Club)，青年人們在那裏耽溺於難以形容的幽會，模擬長輩們在比較明顯的處所的縱慾，祇要不傳揚出來，或不被人看見，就算不要緊的。

不幸而被搜獲的女孩，就被逐出家庭，或強使她和那個男人結婚，即使是一個大流氓，也絕不計較。一切內部的黑暗，表明道德的藩籬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這是法律外表上的限制——離婚的禁令——的自然結果。就是在廣眾中，偶而提到離婚這個字，就要被人看為不

大純潔的，如果青年人們這樣說了，是要被逐出屋外去的。上等階級的女孩，先在藝術、音樂和詩歌上加以充分的訓練，然後粉飾上速成學校的皮毛知識，在學校所學的是俄國一切都好，沙皇是造福子民的慈父。她也許知道許多書籍，但是關於人生方面却一點也不知道。任何造成獨立思想的機會都被隔絕。真實的教育，必須得到父親或丈夫的允許，才成爲可能的。有些女人祇因爲要進大學所以才結婚，因爲結婚後丈夫的意旨就可以替代父親的意旨了。她們不能像男人一樣得入同一的大學，祇有少數特別女子學院，供給才能最強的女子一種高等教育。但是女子入大學讀書是要受人訾笑的。倘有一個女子得了學位，把相片登載在報紙上，是要當做一件奇聞來記述的。貧苦階級的女孩，連一點機會也沒有。革命前開設了一間建築、工程、工藝等科的女學校，不過總結一句話，俄國婦女爲要置身職業界，有過一場艱難的奮鬥。她們多數去做醫生或牙醫，有少數能註冊做女律師，間或有一個女營造師。有一個女營造師爲波利伯拉罕斯加亞（Preobrajenskaya）城起造了一個車站，曾引起極大的反對，當那個房頂倒塌的時候，當地人是歡聲雷動。凡是規劃着加入俄國社

會生活的，或能够得到一件職業的女人，乃是出類拔萃的人材，因為需要非常的勇氣，力量和智慧，來衝破圍困着她們的壁壘。

智識階級當然與上述情形大不相同了。在他們的社會中，有着充分的自由和同情，所以他們可以照他們所喜歡的去生活，至少等到他們的活動成爲政治的勢力底時候，一定可以辦到。

人民忘記戰爭是第一個分裂的原因，曾經非常的搖動往日這一個強盛的國家。他們忘記蘇俄的損失超過聯盟國中任何一國。從開戰到講和，俄國共計有一千四百三十萬人（其中四百萬是女人）死於戰爭，瘟疫，和饑荒。這乃是開始破壞俄國家庭的一場戰爭。未被殺死的人們，有許多經過許多年沒有回到他們的家中來。隨即發生了國內戰爭——惹起更大的混亂，擊碎更多的家庭關係。掙麵包的人沒有了——全家人出發各地去找工做，從此大家分散了。女人投到工廠裏去代替男人工作。男人回來，又把女人擠了出去。當工廠關閉的時候，城市中沒有了麵包，他們都撲到鄉村中來。當田地產不出更多糧食的時候，於是

又逃到城市中去。災荒擊碎的家庭之多，超過他種原因的總和。無數的人民羣集在火車上，無數的人民挨餓，生病，死於饑餓和熱病。離棄了無數的家庭，到這裏，那裏，任何地方去尋求食物。做父親的，因為再不能養活這一家，於是夜間溜出去為自己找麵包吃去了。做母親的，因為自己的饑餓，眼見五條憔悴的身體她再不能救護了，於是就發狂。母親們交換孩子的身體來吃掉；人們互相殘殺做食料。又是一年，又是沒有麵包……

隨後集聚他們全副的精力來圖恢復。新秩序尙未造成，舊秩序就有保存的必要。第一件工程是修理橋梁和道路，把停息了的機器活動起來。舊的機器存在一天，舊的出品就必得推銷出去。新的機器必須建設，新的生活工具（在將來的希望還未實現的時候）必得加以製造。新的家庭，人類彼此相對和對於社會的新關係，祇有等到人類各種關係得着機會在一種新環境中來擴張和表現，然後才能發展。很可以覺得出，那種新環境已經在計劃中和形成中了。很可以覺得出，女人的生活正從舊時的伏處和成見中拖曳出來，用小的家庭團結做為社會大模型的一部分。革命不能立即從各方面作平行的發展；它的物質方面是

必得首先顧到的。家庭中的革命還在方興未艾，當破壞的手續尚在進行的時候，建設的手續是難以望得見的。

(註一) 見蘇維埃憲法第四章第六十四和六十五條。

(註二) 義同「Собака」(小狗)，是以揶揄他人爲生的富農階級的老名稱。

(註三) 農夫對於女人的稱呼。

(註四) 俄帝國聖法典第十卷第一章第一百零八條。

(註五) 「伯加」是未受訓練未經許可的產婆，鄉村和城市都有。因爲迷信上的關係，她們必得是老年人，青年婦女說是會吸取小孩的生命。

第二章 女工

許多大的光線充足的屋子，梭子在織機上面往來穿插，織着顏色鮮明的布匹。瀾漫着的女人的聲音和唱歌，在機器有節拍的嗚嗚格格聲中織入一種光明清晰的音縷。女人們自由地舒適地來往於紡錘之間，在這裏接續一條斷線，又在那裏整理一下紗捲。有年老的，纔

紋的臉，駝了的背，和粗糙的手。又有年輕的，紅潤的臉，筆直的身軀，敏捷的手指……我永不會忘記莫斯科紅露莎（Red Rosa）絲廠的情形，那裏僱用着多數的女工，是我在俄國第一次參觀過的工廠，那時候是過去的一九二三年。帶我參觀的老女織工，已經在那裏工作多年了。她現在是一個女工頭，帶着一種藝術家的豪氣，向我解釋機器的構造。

『革命以後工人得了些什麼呢？』我問她。

『Своя』，是她嘴裏發出來的第一個字，意思是『我們自己的呀！』

『你不曾注意機器旁邊的女工們麼？』她往下說，『她們察看每一條斷了的線是如何的敏捷？若在往日，工作是很顛煩的。也許出品比較多，因為從前我們每天工作十二點到十四點鐘，如今我們祇做八點鐘的工。但是現在每人都比從前做的好。爲什麼？因為工廠和它的出品是我們自己的呀！經理——他也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每個月向我們報告，每個工人都知道有多少錢用在原料，修葺，和工資上頭——我們收入的又是多少錢。我們知道如果出品增多，我們的工資也將隨着增高。你聽見女人在唱歌嗎？從前永沒有像這個樣子

的。從前他們有時還打我們——但是現在我們自由了。』

工廠的隔隣是一所白房子，『胖子』——從前本工廠工人對於經理的稱呼——曾經住在那裏。現在一部分是寄兒所，另一部分是幼稚園。另一座大建築物，從前是經理陳設獵品的地方，現在是俱樂部和大會堂，圖書館和課室，花室也已改作設置完備的運動場了。在工廠委員會的辦事室裏邊，主席委員是一個女人，打拉蘇娃 (Tarsova) 和菲立蒲娃 (Philipova) 兩位同志，都是漂亮的女工，當下正在討論工廠中每個不識字的女工的教育計劃。

『紅露莎』也許是一間最好的工廠。像這樣一種自由的快樂的空氣，不是到處可以找得到的。不過莫斯科的三山大紡紗廠，僱有八千工人，其中的幼稚園，寄兒所，醫院，藥房，小兒保育法的完備，俱樂部生活的愉快，令人感受更深的印象。住在擁擠的寓所裏面的工人的妻，身邊依然圍着一大羣小孩，那些小孩所以不能交給寄兒所，因為寄兒所專供廠中所有女工寄兒還不够呢。女工在工廠做完八小時的工作以後，還要回家為人口衆多的家庭去

洗衣和做飯。

在紡織業大中心的伊凡諾烏渥斯萊順斯克 (Ivanovo-Voznesensk) 我發見同樣的新和舊的對照。那些工廠是陳舊的不合衛生的。出品已經達到戰前的水平，不過舊機器到了不能支持的地步，祇有等到新房子建築起來，新機器裝置好的時候，才可以有更大的進展。但是當我問到女工們，她們的待遇比從前好一點不，她們的回答常是一樣的：『現在我們如果生育，產前產後都有兩個月的休息，工資照足發給——我們有餘暇來喂小孩，還有額外的工資——此外我們還有例假——』。產婦保險法給與女工的印象，彷彿比革命後任何旁的改變都大。關於安全，排穢，流通空氣，到處都有適當的設備。在低濕的染房裏，女人祇做六小時的工作，并且承受一份特別的口糧——牛奶和脂肪。

對於生活程度的高，和經理們違法的嘗試，有時還有一點怨言。因為恢復常態生產的經營，以及數年來建設期中工廠經理所遇到的經濟難題，注意點難免要稍微離開保護工人的需要，而轉向工業狀況上去。因為散工的加入和大量的生產使得工作率加速，所以有一

些工廠的空氣比幾年以前較有秩序——但是工人們依然非常自在，不像任何別處那樣緊張。

在拉斯妥夫 (Rostov) 的大製煙工廠裏面，我發見同樣保護法的實行，特別使我驚嘆的，是『夜間療養所』的設施。這些療養所已經推行得極廣，專為那些不至於臥病不起，而需要特別照料和特別飲食的工人設備的。他們繼續的工作，到晚上不回家而到所裏去療養，因為有這種辦法，曾經防止了許多的肺病和險症。單說這一個療養所，其中住有二十五個工人，多數是女工，停留的期間或一月或數月，全看情形的需要而定。有一個白日工作已完，剛入過冷水浴的女工，領着我們將那可愛的潔淨的屋子看過一遍，她以為被派到這裏來，是一種幸運，很表示愉快。

俄國女人在工業上大量的僱用，並不是新奇的事情。因為幾十年來女人就從事紡織業的工作，本世紀開始以後，別種工業中不大熟練的工作，僱用女人去做的也日見增多。僱主常是喜歡錄用比男人『更安靜更可靠』的她們，而另一原因就是她們的工資較為低廉。

她們的工作範圍是受限制的，單是男工們就不允許女工有同等的標準。但是戰爭開始以後，無論那一種工業，都用着相當數目的女工。這一件事的本身具有一種革命化的影響，打消了許多舊有的偏見。隨後因為戰爭終結，失業的女工到處皆是。一九一七年，印刷工業決定開除一切女工。彼得格勒的斯哥羅海 (Skorohod) 工廠，開除了六百個已婚的女工，把位置讓給歸來的兵士。造紙工業也採取同樣的行動。這種完全違背蘇維埃政府的原則的政策，不久就被檢舉出來，一九一八年四月彼得格勒職工組合大會，向全體工人與工廠委員會所致的請求如下：

「如何防止失業的問題，已經嚴重地臨到組合的前面。在許多工廠和商店裏邊，問題的解決方法是極其簡單的……開除了女人而以男人來補充缺額。自政權歸於蘇維埃以後，工人階級得到一種機會，在新的原則上來改造我們國民的經濟。試問這種行動，是與新的原則符合的嗎？……抵禦失業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國家生產力的恢復，根於社會主義的改造。當這種恐慌時期，工廠和商店紛紛裁減工人，我們對於解僱問題，必須加以十

分小心的研究。我們要將每一件事單獨的解決。不要問工人是男是女，祇要問需要的程度如何。……祇有這樣一種態度，能把女工保留在我們的組織以內，防止工人隊伍的分裂。……』

其他組合和政府的機關都極力保持這種態度，女工的大量解僱遂有了限制。到了一九二一年，工業集中的時候，又有大量的工人被解僱，組合因之再提起男女權利平等的問題。在當時所公布的法令中，規定開除女工的條件是這樣：在同等工作情形下，男女工人的解僱條件是一致的，但是獨身而兼有未滿一歲的小孩的女工，得加以優待。如遇有此等女工必須受開除的時候，工廠不能將她們逐出寓所，她們的小孩仍然可以留在寄兒所，幼稚園，或學校裏面。懷孕和乳兒絕對不能作為解僱的理由，並且當女工因分娩而請假的時候，工廠也不能加以開除。這些條文都規定在勞働法裏面。

女

工

女工的數目，最近幾年不斷地增加，而男工數目的增加，幾乎多到三倍。一九二六年正月時候，被工廠僱用的女工共有七十萬八千之多，比前一年增進了十七萬三千人，佔全體

產業工人的百分之二七·四。女工佔工會會員的四分之一，內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僱工，差不多全數是產業工人。雖然加入工會的女工的比例數最近幾年差不多一樣，但是實在的數目已由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四百增加到二百二十一萬七千二百。工會實際上包括一切工業的和職業的女工人。現下大多數的女工是紡織，縫衣，食料工人，醫藥和公眾衛生工人，以及教育會裏面的工人。過半數的產業女工是紡織工人，有六萬以上的女工受僱在五金業裏面，其中少數人已經升到高等技能的職位。祇有農婦和家庭女工還沒有什麼組織，雖然這樣說，地位也改變得很快。

在一九二六年間，有組織的家庭工人的數目，已由四萬七千增到十三萬三千。她們，如同別的工人一樣，也受勞動法的管理，此外還有一種特別的法律，嚴格的規定她們的服役範圍和鐘點。此種工人，約略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旅館，飯店，和機關的工人；一種是家庭工人。前一種差不多完全是組合會員。對於保護她們的法律，都小心地遵守，組合又特為她們安排適當的時間，來會議，授課，和娛樂，使她們工作的鐘點不致妨碍她們享受別個工人所有

的利益。這種工人常是敏捷而且聰明的，旅館的女侍者對於新聞紙，與她們所照顧的客人有着同樣銳利而且聰明的興味。許多這樣的女子在革命裏頭佔一個活動的部分。

家庭工人是比較容易落後的。她們的待遇，當然因僱主的派別而不同。工人——常是一家一個——多數受僱於 *neimen* (註一) 職業界，政界，智識界，以及從前的資產階級，貴族階級。換一句話說，就是受僱於那些從事最少生產工作，藉着商業上掙得的錢來使女人們享樂的人們，以及那些有着相當職務的女人們，因為在那些處所關於小孩的養育，飲食，和其他家庭工作，還沒有很好的設備。在開明的家庭裏面，僕役是與主人合作的，是家庭中的一員。到處搾取的情形還照舊存在，但是搾取的程度，遠不如從前那樣利害了，打算免除這種情形，除非等到婦女們覺悟了她們不應當受虐待的那一天。對待僕役的整頓的態度，的確是改變了，她們也像社會上別的工人一樣，是自尊的并且受人尊重的。有一個女人曾在舊政府的時代服役過多年，頭腦中深印下一種卑微的感覺，當着問到她現下的待遇如何的時候，她聳了一下雙肩，把改變的情形總括的答道。

「啊！我們現在睡得比較舒服，因為他們必得為我們安置適合的牀舖，他們不能對我們再有非禮的舉動了。」

積極參加組合工作的女人的數目，是與加入組合的女人的數目不相合的。在高級的行政機關，女人祇佔全體工人的百分之六·四。在受薪俸的工會職員中，女人佔百分之二二·六，在組合中央委員會，女人佔百分之一五。在低級的支部中，女人比較活動一點，她們佔工廠委員全數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勞工保障委員會的數目則超過百分之二十。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第七次工人大會中，契阿梅羅瓦 (Tichomorova) 報告女人中的工作說，工人俱樂部有一百零二萬會員，其中有百分之三三是女人，上一年則為百分之二九·八。差不多有二十五萬的女人，在各種與工人有關的「團體」中活動。茲將女人所參加的各種活動列表如下：

在這些團體當中做會員，是代表大會以外的工作。(註二) 從統計表上考察這種工作對於女人的影響是很難的，不過可以知道有這多的女人加入了組合中這多的文化工作。每

個工廠和機關，都有自己的『壁報』，另闢專欄討論婦女問題。例有的俱樂部以外，組合還有 Red Corners (註三) 的組織，在那裏安放書籍，報紙，雜誌，供給未加入俱樂部的工人流覽。對於那些未加入照例的活動的女工和男工的妻，有時藉着旅行展覽來同她們聯絡。又組織特別的「家庭懇親會」藉以維致女人們。男人帶着妻和孩子們來赴會，秩序單上雜

活 動 範 圍	女人所佔百分比
裁縫	九四·八
歌詩	五七·三
圖書館	五〇·〇
文學	四二·九
戲劇	三八·七
普通教育	三五·八
自然科學	三三·四
體操	三一·四
生產問題	三〇·六
勞工之科學的組織	三〇·四
政治(初步的)	二九·五
馬克思主義	二八·三
列寧主義	二八·二
組合運動	二七·〇
非宗教問題	二三·二
奕棋	七·二

有特別的點綴，又爲小孩們在別的房子裏預備下一個看護來負責照料。有的時候這種設備就發達成了固定的夜晚寄兒所。

因有組合的各種活動，工廠不僅是工作的場所了。新的社交機關——俱樂部，課室，運動場，醫院，戲院，和圖書館，環繞在工廠的周圍。工人用不着與別個爭先，而得到較多的工資，所以他和他的家人都可以享受點貧苦工人平常得不着的娛樂。因爲工廠出品增進，娛樂和教育的機會也隨着增進。遇着放假的時候，一個工人不要同他的妻和十三個小孩一塊擠在暑日中的『免窩子』裏面，挨着個的斥責和咒罵。他駕馭一隻組合借給他的小船，到莫斯科，或地尼伯河，或頓河等處。小孩們出外野餐，妻得到一整天的閒暇。許多女人因爲太疲倦或心情冷淡，不肯利用這一切。但是她們領悟得極快。一年中有無千無萬的工人被送入休息所或療養院。

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時候，失業女工的數目增到六十萬，約估註冊全體失業工人的數目的一半。差不多直到去年，男女兩方失業的人數，還是有加無已。工廠歇業的時候，普通是回

到鄉間去，等到工廠復業的時候，不特舊的工人擠着回來，連那些聽人說過工值增加和待遇改良的新工人，也要到工廠來作工，於是工業發展的速度，不能照顧這麼多的人。失業的增加曾經加以限制，終有一個時候，工業的發展會將失業的數目減至最低限度。因為熟練的工人差不多有無限制的需要，所以失業男女大多數是不熟練的工人。

共產黨組合與勞工部 (Narkomtrud) 不斷的舉行減少女工失業運動，所採用的方法，是調查不僱用或不能僱用女工的理由，設法增多女工受訓練的機會。保失業險的工人約佔全數失業工人五分之一，而這種保險是專為熟練工人設的，所以領保險費的，男工比女工多。這種保險費的數目，平常由五盧布到十一盧布，但是一切失業者都可以享受相當的利益，如免房租，免服役，免納稅，減少稅率等等，失業的女工得受同樣的額外資助，在產兒的時候，也是和有職業的工人一樣，享有免費的醫藥照料。此外救濟失業的特種辦法，是社會工作和「勞工組合」。受這種辦法照料的，有四分之一是女人。

蘇俄政府所有的勞働法對於女人是特別重要的——如每日八小時的工作，社會保險，

療養院，休息所，週年假期，特別工作表，保安方法和衛生設備，十四歲以下的童工的禁止，十四歲至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祇許受四小時的工作訓練，十六歲至十八歲的兒童祇做六小時的工作等等。實際上，女人在這些設備中比男人得有更多的利益，因為從前的不衛生和危險的狀況加於女人的傷害，比加於男人的為甚。在男女共同享受的利益以外，還依據對於母性之社會價值和女性生理上的差異的認識，規定下女人工作時特別法律。產業女工的四個月的產兒假期也適用於非產業工人，如果她的工作是特別勞苦的；職工們有三個月的假，流產以後，也有三個禮拜的例假。如果產婦在四個月的假期後生了病，得延期兩個月，期內不能開除她。嬰兒的補助金，雙生子得領兩份。在懷孕時期找尋工作的女人，也不能加以歧視，而祇給與三個月的產兒假期。

關於女人負重的標準，勞働法裏面也有詳細的規定。未滿十八歲的女工，不能僱來從事負重的工作。搬運女工的負重標準等於男工的一半。從事踏機工作的特別勞苦的女工，一個月裏面得有兩天的休息。印刷業的各部，化學工業，以及有鉛粉，毒氣或其他危險狀況的

職業，都不得僱用女工，在不衛生的環境裏面工作的，她們得享受一份特別的養料——牛奶和脂肪。起初不許女人做夜工，除了少數的例外；並列出許多危險職業，不許她們加入。這種限制結果遂生出歧視，增加了失業的人數，因而女界自身起來反抗。因此法律的執行暫時弛緩下來，現在准許女人在特別情形下作夜工，並可以加入一些從前所禁止的職業中。這種弛禁並不適用於幼女，孕婦或乳婦。例如車務管理員，油漆匠，以及伙夫的工作，都不許僱用孕婦或乳婦。勞工視察員隨時可以把一個女工從妨碍她的健康的任何工作中更調出來。

爲要抵制一些區域對於女人的歧視，其趨勢是把婦女置入各種工作中，不問適當與否。因此組合設法把礦工學校的女生增加到百分之十。還有些女人要求廢止一切保護女工的特別法律，理由是因爲這些法律時常產生被歧視的結果。

理亞莎娜娃 (Rizanova) 在她的著作『婦女的勞工』(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勞工書店印行)裏面反駁這種觀點，在俄國所有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她這一本書大概是最完備

的了。她這樣寫道：

『但是婦女在礦產裏面擔任熟練的職務可以成功嗎？組合應當反對這件事嗎？我的意見，以為沒有理由可以任婦女在礦中工作，因有生理方面女人是不宜於這種工作的，而對於孕婦更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不是「婦女平權」的出路。』

理亞莎娜娃還指出一些別種勞工，如木工和建築工業等，都是使女人特別感受困難的。她反對勸勵婦女從事新職業的這種趨勢，因為這種職業不但會傷害她們，並且在做不好的時候，還會挫敗了這整個的運動。

『祇要有一天工人不能在工業歷程上進行激進的變革，』她繼續寫道，『有一天職業的選擇要依賴偶然的環境，並沒有按着趨勢和才幹對於青年做特殊的研究，那末，「軟弱份子」避免危險的職業，乃是前進中的一步……當然很難說男女工人的關係會變成怎樣，在那樣一種社會中：對於兩性兒童的體育加以充分的注意，十六歲以下的兒童不准有職業的活動，並且共同飲食和共同生活的組織把女人從爐邊解放出來——不

過即使在勞工的理想情形和生活的健康情形下，母性功用的完成也會把女人置入一個特殊境況中，並且需要特別保護的政策。」

因爲在所有女工中，祇有百分之十六是熟練的，百分之三六·九是半熟練的，其餘的都是不熟練的，所以現在的俄羅斯沒有一種職業沒有女人在裏頭擔任。她們許多人還保留着由戰爭得來的地位，如街車管理員和司機生等。有女鉛匠，女鎖匠，女旋盤工人，女畫圖師，女電氣師，女海員，女兵，女營造師，女工程師，女紅軍軍官，甚至還有女船主。

在俄羅斯，聽不到婦女『經濟獨立』這一個名詞。革命以前，整個勞動階級的經濟獨立是重要的。革命以後，沒有人對於婦女獨立謀生的權利發生過疑問。理論上，每個身體健全的男女，不特有作工的權利，而且有作工的義務。但是事實上，目下俄國大多數已婚的女人，經濟方面還是依賴丈夫的供給。除非等到女人得着充分的技能，進身於工資較高的實業裏面，能在家庭的收入上比當下佔較大的部分，事情就不會兩樣。雖然立下了『同工同酬』的法律，但是直到一九二六年底，女人在實業界中每月的平均收入，爲數不過四一·

七四盧布，而男人的則為六十盧布。這不僅因為女人大多數是不熟練的——其中亦有這樣的情形：女工與男工做同一的工作而得較低的工資，因為許多男工不肯做與女人同一工值的工作，這種情形，在農業工人當中，比工業工人當中更容易發生。

在我所居住的 *Yoshov* (政府農場) 裏面，女人所任的職務祇是屬於『女人工作』的，如做飯，洗衣等等，但是到了忙碌的季候，許多女人都被僱去做犁田，除草，打掃，割禾，以及收穫的短工。這些人都是女伯特拉基 (*butrakhi*)——村中最貧苦的農婦，她們當中大部分都是沒有耕田工具而受僱度日的寡婦。這些女人有三分之一是農林組合的會員。在一切農業裏面，一條通行的條例是：女短工一日的工資是八十五個戈比 (*kopek*) (註三)，男短工的是一·一〇盧布。伯特拉基是俄國任何工人隊伍中最落伍的。我曾三翻四覆地問她們為什麼不和男工受一樣的工值。她們祇聳一下雙肩并說，『舊時我們一日祇掙得十五到二十個戈比——現在我們所得的，已經增加到四倍或五倍了——我們為什麼應當多要呢？人人都知道，女人的價值是低過男人的呵！』

非常奇怪，倒是一個美國的指導員後來提出這樣一種計劃：日工計值的標準，不能在工人性別上區分，祇在工作種類上區分。新條例實行的後一日，有三個男工和三個女工同時僱來打掃果園。當男工聽見這種新章程的時候，他們立即把工具扔下。

『做回巴巴一樣工錢的工作？世界上永沒有這種事情！我們真覺得羞辱——每個人都會嘲笑我們，人人都知道男人比女人強壯，而且能够做較好的工作……』

女人們鼓起她們的勇氣來。

『很好，如果你們能比我們做較好的工作，來證明一下罷。把這個果園分開——你們打掃那一頭——我們打掃這一頭……』

那些女人不特完工較先，而所做的也好的多，這是男人不能爭辯的。在別的工作裏面，亦有同樣的情形，女人的工作勝過男人。於是男人對於新的規定，不再發生怨言，馴順地接受這『巴巴的工資』。爲了公平起見，我必須附加一句，祇是在最簡單的田間工作中有這樣的情形。一旦用着技巧的時候，女人的工作常是不大好，並且也不難看出女人的工資所以

低於男人的緣故。雖然間或有女人的工作可以抵過幾個男人的，不過這種事情是很少見的。

婦女們這樣一寸一寸地取得她們的途徑，走入男人視為獨有的世界裏頭，於是對於她們的勞力在各種工業上的實施，漸漸使人注意到有系統的研究。拿康特拉 (Nankontud) 的女工中央委員會，及其全國的支部，和莫斯科的科學勞工院，曾經把女人在實業上和社會上得來的病症作特別的研究；搬運重物對於生育功能的影響，以及各種身體勞工，地下勞工，擺動工作，和夜間工作在女人一般生理發育上的影響。

各委員會這種研究的結果，將要用來決定訓練婦女加入新工業的未來政策。關於女子從事身體勞苦的工作，同時要受特別的體格檢查。現在正設法將工廠工人學校的學額，按着工廠女工的百分數來平均的分配。

這些工廠工人學校，或稱爲 Fabzavuchas，在教育制度上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學生們通常都是學徒，其中每個工廠都佔相當的成分，學齡為十四歲或十五歲，受課期間各有不

同，從兩年到四年。學生們在工廠裏面做四點鐘的工，又在學校裏讀四點鐘的書，他們在那裏所習的課程，對於工藝中所需要的較高技術的理論知識，與普通教育同樣注重。入學資格要有一種初級教育的一定標準。在我所參觀過的許多工廠學校裏面，我發現女子的數目和所造就的程度，有很大的差別。比例數常是少過工廠的女工，但是差不多我到處都能發見女子的人數是日在增進。紡織學校的女生成績很好，不過拉斯安夫的製煙工廠裏面，從前有過十二個女生，除了兩個以外，其餘的都必得退學，教師告訴我那留下的兩個的工，作也是軟弱的。在五金業的工廠學校裏面，本來沒有女工肄業。但是她們慢慢地鑽進去了。女生平均的成績比男生的要低，很少見得出她們有創造力和技巧，證明她們祇適宜於旋盤和拖曳的工作，偶而有幾個宜於極熟練的機械工作。在所有的工廠學校裏面，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祇有百分之一六·五是女生；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則為百分之二十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增到百分之三十七；統計預測指明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學期內，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

團體的和個人的學徒制度也逐漸用來教給女工較大的技巧。因為有這一種方法，熟練工人在職業上常像不熟練工人的一個教師。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因有這種制度，九千個女人能够歸到『熟練工人』裏面，而歸入『半熟練工人』裏面的女人，則有八萬之多。有些區域，受了當地女工委員會的鼓勵，對於女人在較高技巧的職業上的增進，已經從事不斷的運動。

又有一種提高婦女行政地位的運動。雖然在工業上得有高等地位的比較少，可是得到的人，已經把管家的傳統工作轉向有利的方面，對於經濟制度與以有力的援助，而且時常能增加生產。

雖然舊習慣依然根深蒂固的保留在羣衆中間，革命已經產生出一種新式的女人。強壯的，有決斷的，大無畏的，她們在發展一種獨立精神，比較選舉權和獨立謀生的意義更爲深遠。戰爭和革命給與她們的教訓是，她們不特能做男人的工作，并且她們能够獨立生活。不論是在行政地位或者工人的職業上，她們不再是往日服從的受壓制的動物了。她們漸漸

對於爲工作而工作的見解發生興趣。她們獲得莊嚴和自尊心，并且滿有一種求知知識與技能的欲望。雖則這種女人還居少數，不過她們乃是別的人當中的酵母。

(註一) 新經濟政策下的投機商人。

(註二) 參看第四章。

(註三) 研究紅色理論的地方，居俱樂部之一角。

(註四) Kopek 俄國銅幣，等於一個銀盧布的百分之一。

第三章 鄉村的婦女

一個考察俄國婦女實情的中立調查者，可以隨便選擇甘馬利亞夫加 (Gannulayevka)，革勒可夫加 (Grachovka)，烏斯來沁斯克 (Voznesensk)，或馬司羅夫結特 (Maslov Kut) 的任何鄉村，踱進任何一打房子裏面去。房子有的全是泥磚的，有的全是木頭的，看各區的情形而定。房子的內容大致是相似的。一間屋子——最多不過兩間——一個大火爐佔去大部分的空間，地面大概是土的。一張粗糙的桌子和幾張板凳，一張蓋着一塊污穢羊皮的

木床，室隅有許多金色的神像插在纏了色的假花和一條鮮明的綉花巾裏面，在天花板的下面還懸着一個搖籃。看得出最少有三個小孩——到處是令人不能忘記的，窒人呼吸的氣味。

女人，如果不在田中或園中操勞，也不在河邊洗衣，就是在紡織，或烤麵包，或將嬰兒一前一後的狠狠的搖動，以停止它的哭聲，或無精打采的坐在那裏，一點事也不做。她們對於調查者的詢問這樣回答：

『啊，一切還像從前一樣！如果你有一個好丈夫，在往日是順適的，如今也是順適的。不然，在舊時挨打挨罵，現在還是挨打挨罵——』

『是的，離婚說着是很好的——但是我怎麼能夠養活我的小孩？到了那種時候，兩個人比一個人要好一點。阿林門塔（Aliment）（註1）是的，我是知道的——但是當我知道了丈夫的口袋裏面一個錢也沒有的時候，這又於我有什麼好處呢？並且假如我的丈夫走開了，我在附近得到一片田地，我怎能獨自一個人來耕種呢？合在一起我們才有辦法呀。』

『學着怎樣讀書和寫字？你試想我們什麼時候有功夫來做那樣的事——又要擠牛奶，又要喂豬，又要挑水，小孩會叫了起來，也許有一個在生病——讓孩子們去讀書吧。』

『是的，孩子們是進學校的——但是他們在那裏學了些什麼？他們把小孩們教壞了！小孩們時常都應當依着父母的吩咐去做，但是現在他們到了家中，還要告訴我們去做什麼。這是怎樣的顛倒呵！你怎能够希望小孩們學些事體，如果你不打他們？』

一個冬季的一天我選定了馬斯羅夫結特的一條街，到每一家裏面去，這就是那些覺悟了的農民羣衆對我所說的話！

隨後我走入市場裏邊，見着三個和顏悅色的包着頭巾的巴巴，她們正在私相議論呢，我過去問她們對於多年壓迫後所得的這許多權利，有怎樣的感想。

『噫，天哪，』有一個回答說，『一切都是胡說！一點差別也沒有！如果上帝賜給我們足夠今年用的糧食，那就頂好了——不然，你所講種種女權能幫助我們什麼呢？』

我走到那些正在政府農場工作的伯特拉基的隊伍裏面去。

「你們現在的境況一定比從前好一點了罷？」

「你見到什麼以為比從前好？我們現在還是從早做到晚——但是我們并不是一直不歌手的做下去。我們甚至可以停止工作來唱歌，在太陽底下睡覺，當我們這樣幹的時候，工頭是不在意的——他自己也是這樣幹哪！但是他們現在要我們加緊工作，我們在三點鐘的時候回家。或許回到家裏的時候還有工做呢。從前，我們回家太晚，來不及做別的工作。」其餘沒有說話的都吃吃的笑，並且表示同意。她們這樣承認，家裏有馬並且有男人一同工作的女人，是要好一點的——對於守寡的和獨身的女人們——有田地也等於沒有，因為她們沒有法子來耕種。

女人搬運重物，鋤田，刈草，收穫，打麥，烤麵包，參加生活上各方面的工作。同着男人一起在田裏工作，幫忙收割，並且捆紮那些金色的稻束，這是俄維斯頂心悻的生活了。女人們受着風吹日炙，輸送斯特拉達 (Strada) 的土產——受苦的時候——一年一年的結她們自己的果。不可愛的，粗糙的生活使她們大多數成爲不可愛的，粗糙的動物。雖然她們忍受了長

久的苦難，她們沒有得到什麼理想。男人和女人同是一株樹的分枝，同是過去的產物。他們有許多相同的性質。他們撒謊並且偷竊，因為這是他們唯一的方法可以得到他們勞苦終日所能得的一點點東西。他們工作起來像惡鬼，當他們靠着這樣工作生活的時候，祇是在自己的田地以外工作的時候，他們才是懶惰而且顛預。他們對於牲畜是絕對和善的，而對於人則非常殘酷。但是他們的行為，也有正相反的時候。從他們身上推論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就是一切。我曾看見一個衰老的父親，和牲畜一起住在一個透風的棚子裏面，因為他的女兒不許他住在家中。但是我又聽說在饑荒的時期，青年農夫快要絕糧的時候，而他們決議要供應老年人的飲食。喜歡鞭撻和咒罵，不祇男人為然。連女人也會說出一些話來，如果你明白內中的意義，一定要毛骨悚然。有一次我聽說有一個農婦鞭撻她的丈夫，有的時候，她們還告訴我，有些男人到 *Garndel* (婦女部) (註11) 去訴苦，述說妻對於自己的虐待。習慣上是祇有男人在假期內可以痛飲麥酒和 *Sama onka* (註12)。但是在復活節，我就看見一對老婦在街上踉蹌着行走，像農夫一樣的酩酊大醉。他們的內心是牢不可破的，

那些由許多世紀深種下來的迷信和恐怖，不是一代之後可以剷除淨盡的。對於過去的固執，女人甚於男人，她們還是要到教堂裏去聚會，並且相信牧師們所說的奇蹟和魔鬼。

馬斯羅夫結特的女人，在街上走來走去，四處去談論自己和隣舍的困難。她們會有幾點鐘的功夫，坐在房子前面，破着向日葵的子，怨恨這個，怨恨那個，常是怨恨——並且當她們被請去赴改良生活的會議的時候，她們咒詛着搖她們的手。娜打尼亞格勒斯杜娃（*Natya Grudova*），鄉村婦女部的職員，是一個能幹的小婦人，她曾加入過一個黨務學校，對於這些人就沒有收過什麼效果。但是她並不氣餒。

『我們盡力幫助年老的人，』她告訴我，『但是到末了，很難令她們懂得任何什麼。我現在所注意的是年青的人。』

不過就是在這地方也做過一些事情。去年她們開始選舉女人到鄉村蘇維埃裏去——一共三個女人，大受枯拉克們的反對，他們對於女人的用處，加以污蔑的批評。很不幸，這三個都選的不得當，沒有做什麼工作，而蘇維埃的枯拉克們也並沒有鼓勵過她們。今年決定

不像別的地方那樣設法在蘇維埃增加女人的數目，要找出三個靠得住可以盡職的女人來。於是召集代表（註四）會議，教員會議，和母親會議，考慮那一個最宜於這種職務。我參加過一個在鄉村閱書室所開的代表會議，蘇維埃的主席在那裏把地方蘇維埃的意義和功。能提要的說了一遍。將村中所有適當的女人的名字都審查過，並且，對於每一個人都加以坦白的批評。

對於馬利亞達威杜娃 (Maria Davidova) 有一個說，『她曉得許多事情！——但是別一個說，『是的——她曉得許多事情，因為她吃得許多酒呀——我們不願意蘇維埃裏面有她這樣一種人——』

對於別一個，她們說，『她甚至不能料理自己的家務，那裏能照顧到這一村呢？』當提到拿斯提亞斯提賓娜娃 (Nastia Stepanova) 的名字的時候，便是一陣嘖嘖的稱許。

『她是一個很活動的巴巴——讓我們選她吧——她也是一個好的戰士，不怕對男人——』

說出她的意見。』

拿斯提亞坐近牆角落，面上變成深紅色，用一種尖銳的高聲表示她的反對。

『但是我不認得字又不曉得什麼——』她這樣反抗的說。

『不要緊，你可以學——你能說話，你不能嗎？這是蘇維埃會議裏面的重要條件。書寫的事是由別人擔任的。』於是她的名字就被選入。

對於日尼亞猶克娃 (Genia Jukova)，有過劇烈的辯論，因為她的父親是一個枯拉克，而今年的枯拉克們在蘇維埃裏面沒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

『好的，即使她的父親是個枯拉克又算什麼她自己是一個教員，一個好工人，她一定會顧到貧苦農人的利益。』

她自己也接受了。隨後提到娜打尼亞格勒斯杜娃的名字，婦女部的職員。

『一定要有我們的娜打尼亞——她所曉得的比我們全體曉得的還要多——並且誰能使那些男人們這樣好的盡義務呢？』

那些預先選定她們的代表的女人，運動村中一切機關都同意她們。在和舊蘇維埃職員的一個特別會議席上，一切男人，連共產黨的主席也在內，都謙恭地對待女人，願為她們的後盾，很像拿糖菓來哄小孩一樣。當着女職員對於男人們的笑謔提出質問的時候，主席回答說：『好的，你不能期望我們嚴肅地對待女人哪，你能嗎？』但是選舉女人加入蘇維埃乃是政府的策略，當選舉期到來的時候，主席自己為那三個女人運動中選，把女人參與政務的重要說得非常動人。因為枯拉克份子已經沒有選舉權，所以女人的選舉竟得一致通過，她們今年在蘇維埃的工作中佔能幹而且有用的部分。

在馬斯羅夫結特召集女人開會是很難的（除非秩序裏面列入一種好玩的東西），而在隣村的亞魯吉爾斯克伊（Archangel'skoye）禮堂就容納不下那麼多來聚會的女人。三月八日，國際婦女日，她們從各 Rayon（區）來赴會。開會的時間定在正午，整天都有女人來參加，有的步行，有的騎馬，最遠的路程足有四十 *Versta*（註五）。離開會的時候還有六點鐘，女人們整天忍耐地等候着。到晚上禮堂裏簡直擁擠不開，有幾百個女人站在外面的當

街上。每村都有代表來慶祝大會的開幕，述說各村女人上一年的工作；她們在合作社和蘇維埃裏面怎樣工作；有多少人學會了讀書和寫字；她們下一年的計劃是什麼。她們有的講得很好，很清楚，像銀鈴一樣的聲音；有許多把話講錯了，不得不快快的完結，有一個人演講未完忽然的頓住，並且從講台上哭着跑下來。不過這是一種奇蹟，看見這種情形的發生，在朦朧的禮堂裏面看見這幾百個女人的閃光的眼睛，初次了解在過去黯淡的途程以外，生命還為她們保留下一些東西。

另外一天，我接到一個電報，說是有三十個女人剛由波力堪斯克（Prikumsk）到這裏來參觀農場。她們的代表告訴我，她們的代表大會共有二百個人，曾經出款來幫助那些出不起旅費的女人。波力堪斯克，因為是州廳所在地，比較高斯羅夫結特有更多的社會階級，這個代表團就包括其中的一切，從一個藥房的主人——她有偉大的身軀，鬚曲的頭髮，戴着金耳圈，包着頭，穿着淡紅衫，外披着白洋紗的外套——到一個皮膚黯黑的小農婦——拽着手杖蹣跚而行，活像一個愉快的小女巫。她的年齡定在七十以上，從她沒有牙齒的雙

鬚上發出一串聽不清楚的俄語。她那一雙閃光的眼睛注視到一切的東西。

游行了一週之後，她們都到裏邊來吃茶，並且回答了一些我的問題。

我請她們告訴我，她們那市鎮的婦女生活近十年來改變的情形。

這個團體的領袖，一個熱誠的少婦，正在寫着許多記錄，（證明她從前是知識階級出身的），站起來回答。

『你須要明白，直到一九二〇年，我們那裏還沒有歸到蘇維埃的政權之下。從前這個區域內除了國內戰爭沒有別的。蘇維埃政府曾經給與女人充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權利。承認……』有一個農婦搖手叫她不要說。

『讓我告訴她！』她說，並且往前說。

『第一件，同志，從前絕對不能有這樣的事情！想一想——這許多女人，能够結合在一起，到外面來旅行。坐在這裏的巴布斯加（Babushka）從前連一次火車都沒有坐過！整年的我們都是上課和開會。現在看看我，我已經學會讀書和寫字——當我看見傳單的時候，

我自己可以明白其中的意義，又當我的兒子遠遠地從西伯利亞寄信給我的時候，我用不着像傻瓜一樣去求隣人解釋！我還要告訴你別的事情。我們再也不怕什麼了。這是很要緊的一件。我們不怕我們的丈夫。我們無論做什麼都不用先得他們的允許。自從我當選做代表以後，我再也不相信宗教——我知道教會事業完全是無意識，並且明白這些年來它們是怎樣的欺騙我們。我不相信我們當中還有到教堂去的人。」

如果不是別的人也要說話的時候，她一定是滔滔不斷地說下去。討論到節育問題的時候，她們的話頭就永沒有停止過，這和我對於農婦的平常經驗恰相反，她們彷彿都受過很好的指導。當着我們討論到新道德問題，那個開藥房的女人側着身子對我說：『現在請告訴我，同志，你要對我持什麼態度，如果我使你的丈夫與你分離』

我的問話還未完，她們便開始問到美國的情形。她們要知道革命什麼時候會來，我們有沒有一個婦女部。她們特別關心的，是要我們明白蘇俄的婦女運動完全不帶女人氣。

『我們并非要使女人反抗男人』那個領袖解釋說，『我們并不像你們美國一樣，選舉

一個女人入辦公室，祇爲了她是一個女人的緣故。例如，我們也要投票反對女枯拉克，同反對男枯拉克一樣。」

當鄉村有了覺悟的時候，它所取的方式不常是健全的。婦女部，戲院，圖書館，離婚法律，和改良農業，同擦胭脂抹粉一齊來了。合作社裏邊即使缺少勞的重裏的東西，化粧品也一定是不可少的，那些置辦不起化粧品的女人們，用甜菜汁和麵粉來代替，樣子是很難看的。在禮拜日和放假日，塵土飛揚的鄉村街道上全都閃爍着高底皮鞋。建設俄國新秩序的人們和一切別的人們十分相似。這是一點也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最可稀奇的是僻處俄國各鄉村的女人，兩個人或是兩百個人都沒有什麼關係，她們已經對於新秩序所給與的最好貢獻起了反應，她們在學習讀書和寫字，組織寄兒所，創辦戲劇團，有時還給男人做農業上良好方法的榜樣。

鄉村婦女在田地上享有與男人同等的權利，關於代表家庭出席鄉村會議也有同等的權利，這在往時是很難允許她們出頭的，發言的機會尤其難得了。有一百萬農婦耕種她們

自己的田地，做她們自己的一家之長，雖然大眾還是缺乏自信和落後，同時已有許多人能够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思想。就是年青的人們也很受人尊重，在從前是教他們不要多管閒事的。在蘇俄共和聯邦和烏克蘭（Ukraine），去年有十萬女人選入鄉村蘇維埃，到一九二七年還要增多，上一次莫斯科的全國工人大會，有一百六十九個農婦參加。參加選舉的女人，佔有選舉權的女人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九十，但是數目還要年年加多。單是西伯利亞一地的鄉村蘇維埃，就有八千個女會員，並且有四十五個西伯利亞的鄉村用女人來做蘇維埃的主席。

她們要打算常坐在辦公室裏面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例如，安娜沙拉美托娃（Anna Salamatova）被選做烏斯來沁斯克村的主席。村人不大贊許她的工作。當地有一個農人，是一個有很多人口的家庭的鰥夫，他以為把所有的管家的才幹用在村事上面，是很可恥的，他於是向她求婚，她就接受了。很令她詫異，他希望她停止她的職務。村中其餘的一切人都是這樣想。

『從車上下來罷！』他們說，『現在你已經結過婚，不再是一個獨立的人了。你的主人要吃飯，你怎麼能够在村子上跑呢？』但是她堅持自己的意見，終究把她的工作和她的丈夫都安排得很好。

還有蘇蒲拉娃 (Feodosia Ossipovna Shupurova)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我從報紙上看見她的相片最少有十二次，在莫斯科的一次婦女部會議裏邊，我還與她談過話。她常是穿着同樣簡單的農人服裝，頭上圍着一塊白巾，這種裝束在大眾中間一點沒有改變過。她已經有五十歲，來自西伯利亞的阿爾泰 (Altai) 省。當我請她將她的生活告訴我的時候，她說是沒有什麼可說的。

『我是一個窮農的女兒。我的父親早就去世了，遺下一大家的人。當我十四歲的時候，母親命我到修道院裏去做工。那些聖潔的人們叫我赤着雙腳，甚至幾乎裸着體，去牧養牲畜。我忍不下去，所以就逃走，隨後我就爲別個農人僱用。在十七歲的時候，母親命我和一個四十歲的農夫結婚。他一旦喝了酒，就變得像瘋狗一樣醜，差不多要把我打死。我想離開他，但

是我的母親說，那樣便是罪惡。

『於是到了一九一七年——我們的鄉村屢次換主。一九一九年，哥薩克（Kozak）的軍隊來到村子裏。我藏起我們布爾賽維克的農人，被祭司看見了。於是兵士們來毆打我。自此以後，我對於宗教簡直沒有做過什麼。我開始為窮農工作。他們選舉我做 *volost*（註六）會議的代表，我整整的哭了一夜。他們想把我差遣到地球的哪一地方去呢？但是當我到了那個地方，並且稍稍諳習各種事情的時候，我的眼光就放大了一些。他們又選派我參加 *oyezd*（註七）會議，又從那裏到 *Gubernia*（註八）去。這是我頭一次離開家鄉的一切旅程。當我再回到家鄉的時候，我就開始讀書，每晚上市祇能認識兩三個字母。末後我就被派去參加莫斯科的蘇維埃會議。農婦們說，「她是個巴巴，像我們一樣，但是她居然到莫斯科的 *Volk*（註九）裏面去工作了！」現在我識字了——不再是盲目了——我在雙腳所能到的地方，盡力為我們的農婦工作。』

『男人們對於你的工作，持些什麼態度呢？』我問她。

「那是很好的，讓我告訴你吧！他們方開始尊重我們的權力，因為女人在蘇維埃裏面的工作有的時候比男人的好——她們多懂得經濟的方法。起初男人們像雄雞一樣在我們面前嘈鬧。一個女人懂得什麼，」他們說——「你們祇曉得大鍋和小鍋罷了！」但是現在是大不相同了。」

「你們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喔——我們有許多問題——學校是一件事——我們的預算還不夠。我們這裏依然有流氓和馬賊——我們的法院還不够嚴厲。另有一件事——我們的巴巴應該有四個月的假期，當她們和女工一樣的生小孩的時候。但是她們生了小孩第二天就到田裏去！我們的農人照顧牲口，比照顧妻子妥當得多。」

農婦的活動，不祇在蘇維埃裏面表現出來。有許多人在扶助窮農和寡婦的鄉村互助委員會裏面也很活動。有五十萬以上的農婦是消費合作社的社員，有十八萬是 *Kustarny*（手工業）合作社的社員，還有大量的人數加入農業合作社裏面。因為男人依然堅持一

個人代表一家的習慣，所以在這些組織當中，女人的比例數還是小過男人的。有很少農婦做了法官。有一天我在路上碰着一個。她用來巡行的福特車，是一千九百十年製造的，已經壞了。她告訴我，她在拉斯安夫學習了一年課程作為預備，那裏有九十六個男生，十六個女生。祇要有初級的教育便可以應考，但是對於蘇維埃政府政治原則要有澈底的認識，這是非常重要的。祇有四個女生及格。她說，考試的標準，多注重運用常識的才能，少注重書本的知識。

她在鄉村經手辦理的案件，多數是關於『阿林門塔』（見本章註一）的。

『做法官是不容易的。』她說，『你必得將案中一切情形加以小心的估量，不能立刻就援引蘇維埃的法律。每一個案件必得根據它的特別的環境來判斷——要查出那一方面有道理，不常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有時良心上所告訴你的，和事實上彷彿證明出來的大不相同。但是對於社會的利益，當然時時刻刻要首先顧慮到。』

她自己，她解釋地說，很相信道德感化的效力勝過法律的制裁。平常如果有一個妻怨恨

她的丈夫，他就對待她非常可怕，但是要和他講道理呢，或者可以和好，或者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無須訴到法庭上來。

在研究俄國婦女的新地位的時候，必須記住，鄉村裏面的改變，實際要比城市慢得多，大多數農婦的生活，爲革命所改變的依然很少。不過任何懷疑無生氣的羣衆之興起的可能，多疑家，倘使聽到伯利安斯克 (Briansk) 省烏特夫加 (Verteyevka) 的鄉村通訊記者關於現代利希斯特拉 (Lyssistrata)，愛克信尼亞加拉雪哇 (Aksinya Karaseva) 的故事而敘述，一定會受感動。

愛克信尼亞開始參加會議，並且參與烏特夫加的政治工作。她的家人，特別是她的丈夫希美安 (Simon)，簡直發了狂。他盡力忍耐下去，直到她擔任演講的時候。隨後他喝醉了酒，就鞭撻她，命令她不要再參加男人的職務。她略微哭了一下，隨即揩乾了眼淚，跑到婦女部去。不出半點鐘，村中的女人統統齊集到學校裏面，開起婦女大會來了。

天色漸漸黑暗。太陽走去休息了。但是男人得不到休息。小孩們號哭。母牛必得下奶。豬不

斷地叫着要求它們的晚餐。什麼災難降臨了呢？巴巴們到那裏去了？隣人們惶惑地互相奔視。『你的人在那裏呀？』——『走了！』——『你的呢？』『不見了！』——『也許有人把牠們一起偷走了吧！』——『真是作怪！』——我在日頭底下過了四十年，從來未見過這樣稀奇的事。』

天黑了。男人們最後在學校裏面找着這烏特夫加村的另一半人數。他們像救火一樣的跑向學校那裏，希美安也來了。他們把學校包圍起來。他們大聲鼓譟。他們請求，他們威嚇。

巴巴們祇是靜默着——像大禍將臨一般的靜默着。

愛克信尼亞手裏拿着一張紙，走到前面來，她告訴男人們，嘈吵是沒有用處的——他們必得靜聽紙上所寫的東西。當着人聲沈下去的時候，愛克信尼亞開始誦讀

『由烏特夫加村全體已婚的女性市民致烏特夫加村全體已婚的男性市民最後通牒。因爲我們一切已婚的女人，烏特夫加村的市民，在困難的狀況下生活着，我們受丈夫的鞭撻，我們聽不到他們口中的親愛的言詞，他們待我們像牲畜一樣，我們對於這些欺辱，再不

能忍受下去，我們所以發出現在的最後通牒，我們同意家庭中的工作，並且做丈夫的助手，但是我們的要求是：我們不能太過順從丈夫的意旨，他們不能太過安逸，並且將「醜老婦，」「狗馳，」「賤人，」以及別的難以說出口的稱呼加在我們身上。我們還要附加一句話——我們決不解釋，決不回到丈夫那裏去，直等到他們都在通牒上簽了名為止。」

有幾個男人開始放聲大笑。但是女人們還是保持着嚴肅的冷靜的態度。於是男人們明白這不是鬧着玩的事情。他們就開始咒罵這些女人……」

愛克信尼亞要求男人們採取合禮的行動，並且重複的說，女人們決不離開學校，直等到簽好合同為止。

那些男人們在他們那些地方顛足，堅決地賭誓，叫喊了許多時候，終歸羊一般的馴順下來，一個完了又是一個，走到愛克信尼亞跟前，用抖顫着的手來簽名。那些不曉得寫字的，都畫上一個十字。

閉會的時候已經是夜半，希美安悄悄的走回家中，在鼻子裏嘟囔着說：

『每天都有新奇的事情。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有一點新奇的事情。但是不打你的妻如何過得下去……？』

(註一) Alimenta 是離了婚的丈夫對於妻或孩子們法定的給養。

(註二) 共產黨婦女部。

(註三) 家做的酒。

(註四) 選派入初級政治專修科的女人。參看第四章。

(註五) 一 Verst 等於一哩的三分之一。

(註六) Volost 相當於美國的政治區。

(註七) Oryezd 差不多與美國的州相當，不過實際上常是大着許多。

(註八) Gubernia 約略與美國的一省相當，不過面積要大着許多。

(註九) Vsiik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四章 婦女之加入公共生活

當布爾賽維克剛得到政權的時候，以為不需要特別的婦女工作。憲法上既保證婦女完全平等，無階級獨裁制又會增加它的效力，普徧教育又能給婦女以運用它的準備。但是許多世紀遺傳下來的束縛是太牢固了，具有領袖資格的婦女又太少了。就大體說來，女人未嘗在政治上活動過，雖然革命的緊張和罷工會經製造出幾個勇敢的戰士，而階級意識的覺悟還是有限，大多數的婦女對於新政府依然是隔膜的。農婦，就大體說來，都是反對革命的，女工中間雖有較大的贊助，而大部分在獨創的活動上還是太生疏太落後了。宣傳和教育的普通方法不能把她們喚起。因此一九一八年彼得格勒的第一次女工大會，決定組織特別委員會來訓練婦女行使她們的職權。不過這種方法後來覺得是不合適的，到了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忽然有人反對這種步驟，以為它是女性化的，而共產黨的『工農婦女部』人所共知，婦女部終於成立了。女人的活動立刻增多起來。整千的『紅色看護隊』去到前綫，有許多女人從事軍事工作，掘戰壕，放鐵網，或在戰綫上做政治的或教育的工作。在紅軍裏面，傷亡的婦女差不多有二千人，有二十八個女人得到『紅軍的勳章』。在饑荒的

時候，賑災是婦女部最大部分的工作。許多人奇怪革命後佔重要位置的女人比較得少。但是祇要有一個女委員，郭倫泰（Golunsky），後來成爲世界上第一個女大使——那末，在羣衆裏面也會有許多女人做着英雄的事業。自後一九一九年組織了婦女部之後，加入共產黨的婦女從六千四百九十九人增到十四萬人，從前女黨員佔全體黨員百分之七·八，現在增到百分之三·一。多半是女工。但是婦女部的工作並不十分注重介紹黨員入黨。她們的任務是一種教育工作——訓練婦女怎樣行使職權，增進她們的政治的了解，並且預備她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完成這種工作的主要方法是『婦女代表』的組織。每年在所有參加選舉的婦女當中，每十個女工裏面選出一個代表，每百個家婦和農婦裏面也選出一個代表。當選的女人每一個月有兩次聚會，會中的領袖是一個受過訓練的共產黨職員，她們所習的課程是政府的構造和問題，婦女的地位和權利，教育問題，合作社問題，生活狀況問題等等。爲女工預備的課程注重在工業的和組合的問題，至於農婦的課程則注重在農業的和鄉村的問題。

代表的每一隊分爲許多小組，從事特別問題深入的研究。每組組員都是地方蘇維埃合作社，或組合職員的實習者。這些機關的領袖曾經接受正式的命令，要設法使這些女人充分的了解這種組織，並且給她們一些實際的工作。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季，全國選出的代表共有五十萬人，農人佔百分之六十四，工人佔百分之二十，其餘的是家婦，職工，和家庭工人。每一年選出一批新的代表來，『畢業生們』就升爲教員，並且在她們曾經受過訓練的組織裏邊有一定的地位。會議按期召集，代表們在會中對於她們的『選舉區』做一切的報告。婦女部也從事『民衆工作』，藉着會議，大會和交往來喚起那些非代表的工農婦女們的興趣。

莫斯科每年有一次俄國各地婦女部領袖大會。亞提奧堅娜 (Artiokina)，往日是一個女織工，現在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少數女委員中的一人，同時是婦女部的主席，在去年十一月我所參加的大會中聰明而且鎮靜的充當主席。開力堅娜 (Kaligina)，一個健康的，深胸的婦人，是她得力的助手。那一百五十來個農婦，大半是三十開外的年紀，多數在革

命以前入了黨，也有許多工農婦女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才成爲活動份子。大體說來，她們都穿得很簡單，甚至是很襤褸的。她們全體都彷彿是極能任事的，並且用一種有秩序的辦事方法來討論事件。她們中間有少數的人看來像是職業的政客，但是大部分都是肅然可親的。除了一個之外——一個初次到莫斯科的怕羞的農婦——一切都是極好的演說家。我彷彿覺得，比起我所參加過的許多次男人說話最多的會議來，在這裏廢話是比較少的。

因爲這次大會是緊跟着共產黨第十五次年會開的，所以他們的第一種任務就是將黨的政策用到婦女間的工作上去。現在共產黨的主要政策是工業化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這個名詞，在他們用來，就是說恢復的期間已經過去，建設的期間已經開始了。工業和農業已經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在老的方法和舊的機器的限制下，是不能有更遠的進步的。他們現在必須多注意生產工具的製造，而少注意消費的物品；要用新的機器和技術來代替老的不中用的方法。工業化的計畫是不能把農業除外的。農人不僅要有更多的糧食，用來給養隨時增長的工人隊伍，交換城市的製造品，並以較多的剩餘出口，得款

購置俄國所製不出的機器，並且還要為工廠產生較多的原料。要辦到這一步，農人也要有新的方法和新的工具——農業的自身也必須成為工業化。

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問題的注意，是共產黨中一派入勝利的結果，這一派人相信在一國之內可以實現社會主義，不管世界其餘各地的革命運動是怎樣。這就是說，在國家化的工業更遠的發展以外，對於一切集體組織的開始，要加以從來未有的更大的注意。這是指着製造品價值的降低，和『經濟政策』的嚴厲執行說的。他們知道這些事情沒有一件是可能的，如果沒有女人充分的和智慧的合作。共產黨大會通過強有力的決議案，責罰以守舊態度來對待婦女的頑固派，並且主張用加倍的努力來增進她們的活動。

整個大會的方針就是怎樣可以使她們的工作更有力量更切於實際。大多數女人過於傾向理論問題的討論。比方，在一個會場裏邊，演講的人把捷克斯拉夫的合作運動大致說過一遍，但是關於對街合作社的商店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本年的計劃規定課程中每一問題都應當和當地的實際問題發生關係。

『我們沒有時間來空想的！』有一個代表對我說，『我們祇能用現有的材料盡力的做下去。我們還沒有教導我們的人民來擦牙——當我們做過很多這種工作的時候，就是一種偉大的勝利呀！』

大會中隆隆的響着幽默的插話和聰明的建議的，那是伊凡諾夫渥斯奈沁斯克 (Ivanovo-Voznesensk) 的婦女部領袖維拉亞利希娜娃 (Vera Alexeyeva) 的底聲音。當我走上去問她那一區女織工的情形的時候，她建議我親自到那裏去看看。

幾個禮拜以後，我冒着濛濛的細雨乘一輛馬車，經過大紡織中心的泥濘的路途，走向藏有她那大身體的小市區。在那樣早的時候，維拉亞利希娜娃已經穿着停當，在門邊迎見我，她領我到一間臥房裏面，房中僅能放下她的床，她的桌子，和她自己。桌子上頭攤着一本法文文法，一盞燈黯淡地照在前面。

『這是我唯一的研究的時候，』她解釋說。『去年有一個代表團從法蘭西到這裏來，現在我研究法文，爲的同那一位同志通訊，藉以得到法國女工的消息。』

她的母親，鱗喻倔強像一顆老松樹，很快的預備好早茶，維拉的小孩們懼怯地來用早餐——這是他們當中的三個，最大的那一個，比較瘦一點，最像她的母親，最近從烏克蘭受滿了訓練課程歸來，當下在一間工廠的託兒所裏面任職。

那老母親向我申斥地說。

『維拉今天也許要去醫院裏面割症。本來幾個禮拜前她就應當去，但是是一件事完了又有一件事。』

維拉趕快地插嘴說。『好了，好了，母親，』她安慰她，『這位同志祇有一天留在這裏。我明早就去了。』

用完早餐之後我們立刻就出去。維拉的奇怪的樣子，在俄國到處惹人注目和暗笑。一頂粗糙的男孩子的帽子遮住了她的剪髮，一件難以形容的黑上衣緊繃繃地裹着她那闊大的胸部，短裙下面露出六吋來長的白襪筒，在沈重的黑鞋外面套着一雙男人的雨鞋，這雙雨鞋，因為我們走過泥濘的路途，比原體積大出兩倍來。

維拉的工作實在太忙，她不能多告訴我關於她自己的生活，不過我曉得她在十歲的時候到烏克蘭一間製煙廠去做工，每月得七個盧布的工資。她參加過許多次的罷工，入獄的次數之多，她自己也記不過來。她起初是一個社會革命黨黨員，在十一月革命的時候，加入了布爾塞維克。她曾被派到前綫，在士兵中間做宣傳工作，並且參加過國內戰爭。當披特落（Peltura）的馬賊闖入烏克蘭的時候，她是三個飛行隊長中的一個——其他兩個都是男人——足有幾個禮拜，整日整夜地坐在飛機上窺探馬賊，時時和他們交鋒。

『到了和平的時候，他們要我在婦女中間工作。每一個人都笑了。他們簡直想不到我是一個巴巴。起初我自己也未嘗有過這種思想——我常常像男人一樣的四處跑，並且穿男人的衣服。我那時是瘦一點，人常把我當作男人。但是我要服從黨的紀律——究竟我也並非十分不宜於這種工作。』

我問她自從她開始在婦女中間工作以後，女人們的態度有什麼大不同的地方。

『世界上所有的差別！』她回答說。『我記得由我召集的第一次婦女會議，我竭力引着

她們一同討論問題。一個一個地站起來訴說她們自己的困難。每一個人都要訴說她在革命和饑荒的時候所受的苦。她怎樣能夠得到麵包和衣服，怎樣能夠得到工作，爲什麼有這麼多的災難臨到她的身上？現在她們在討論我們的問題了——我們怎樣組織託兒所來照顧我們的小孩——我們怎樣改善我們的待遇，使得女人們一致地思想和行動，乃是一種很大的進步。當然，並且她們所有的人！她們還有整千整百的人，像往常一樣的生活着……

我們到了一所白色的府第，現在不再是兩夫妻和十五個僕役所居住的地方了，在它的雲母石的大廳裏面，設有共產黨省黨部一切機關的辦事處。維拉離開了我，去婦女部告訴她的主任，說她要到一個職工組合執行委員會的常年大會預備會裏去報告，不多時候就可以回一個助手，在彼姆（Bim）——當地最大的紡紗廠——工作還沒有很多的時候，她告訴區內共有十二萬六千織工，女工佔全數的三分之二，內中有二萬六千人前兩年方才到工廠裏面工作，她們從前都是農婦。

「你可以想像，要使這些女人對社會的或政治的問題發生興趣，或學習讀書和寫字，是怎樣的困難呵。她們大多數的人每天早晨從村中走來，路程是從五到十 *Versts*（見三章註）——晚上又要走回去。你可以看見她們在清晨的時候從各方面沿路而來，像許多條黑蛇。我們能够期望她們參加會議呢？我是知道這種意義的——有三年的功夫我做着這樣的事情。」

雖然有這些困難，去年居然有三萬個女人從各方面受婦女部的指導，內中有八千個是代表。全省組織了五十間幼稚園。整百的女人在政治 *Meeting*（組）裏面研究。在討論家務和婦女目前的利益的問題的各組中，共有三千個女組員。這種活動，她解釋說，大部分是在維拉來後的兩年中發達起來的。從那時起，婦女選入蘇維埃的數目由百分之十九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三，合作社的女股東由四萬八千增到七萬，共產黨的女黨員由百分之十八增到百分之二三·四。

差不多在維拉回來的兩點鐘以前，她搖着頭訴說男同志們的倔強。

『祇有兩個女人在全省職工組合執行委員會裏面』她解釋說，『一切都定規了，在新任的候補委員當中應該多加兩個女人。但是到表決的末一分鐘，有些男人起來阻撓。他們說：「在女人能够勝任這種負責的位置以前，我們應令她們多受教育。」我指出來說，一個人一年的實際經驗，比較五年的研究所得的更多，女人永遠不會受到教育，除非男人們給她們一種負責的機會。到末了他們也同意了，現在我們共有四個女候補委員。她們一定可以當選的。』

我參觀過彼姆工廠，在合作膳堂吃中飯，看見維拉的女兒在一間有趣的託兒所中工作，和她在一起的是一個曾經派到莫斯科受過管理訓練的女士，隨後我們到工人俱樂部去。維拉在途中指給我那座『音樂研究院』，那裏有許多由組合派出的較有才幹的工人。我問她婦女部和工會的文化工作有什麼關係。

『這個』她回答說，『前幾年是一個極尖銳的論點。原來工廠女工中間的一切工作，都由一個婦女部負責的職員辦理。結果常常是這樣，工廠委員會絕不舉辦關於女工的任何

工作，並且拒絕在計劃上放進一些能够引起女人特別興趣的數目。當女工們來參加會議的時候，她們所遇到的是：『好的，讓我們聽聽巴巴們說些什麼！』她們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於是不得不組織特別的婦女會議。當這種辦法在刺激女人的興趣上有了相當效果的時候，同時引起「我們」和「他們」的一種態度，所以我們就決意變更方法。上一次職工組合大會決議婦女工作完全由工廠委員會負責，並且訓令各組合要在一般的計劃中含有引起女人特別興趣的問題。這種辦法曾經產生過很好的效果，從此以後，組合在引領女人加入他們的工作上更爲活動。現在每一個工廠裏面，還是有婦女部的職員，不過她們祇注意代表會議和黨的工作，工會負責辦理一切普通的和文化的工作。但是婦女部却爲組合的工作預先立下了基礎。』

第一次換班的工人從工廠回到俱樂部的大房子，所有的屋子裏邊早擠滿了人。一羣青年婦女學着裁剪和縫衣，同時有人演講婦女參加下次蘇維埃選舉的重要。

『當我們用一種方法不能得到她們的時候，我們就另試別的一種！』維拉說。『有許多

女人是我們不能引近會議的——但是當我們給她們一點實習工作的時候——看她們怎樣地向前呵！在她們縫衣的時候，我們可以為她們做關於政治，合作社，和衛生的演講——我們開頭常是說兒童的保養。她們發生興趣了，不顧她們自己所盡的力量。我們主要的意見是要她們真的去參加——不強迫她們去遵行不自然的計劃。」

有一間專為性衛生問題預備的特別室，裏面有表冊和圖畫說明花柳病的影響，警戒過早的和雜亂的性交，及火酒的服用。工廠的醫生正在對着一羣婦女演講衛生問題。運動場上擠滿了女人。禮堂裏面有男女工人在排演一齣戲劇。

維拉不僅在這一切工作上，是婦女背後一種領導的力量。她還要想到村中的婦女，常常派遣職員去指導農婦間進行着的工作，計劃暑期運動場的開設，召集大會，親自到她們中間去遊行。她在晚上的時候，也和日間一樣，忙着各班的組織和教授，充當大會的主席和預備報告等等。她簡直是一個精力的代那模。像她這樣不過是全俄國整百的女人中的一個，這些女人並不等待什麼靈感或災殃來為她們指路，她們祇是站牢她們的地位，不斷地在

攻打那許多世紀建築下來圍困着女性的無知的和偏見的厚牆。

婦女部主要的工作是在女工和農婦中間進行，然而對於職工們，家婦們，和家庭工人們，也不稍忽略。婦女部用了工會，代表會議或家庭合作社等來接近她們。家庭工人通常都是初由鄉間出來的愚昧的農家女子，一點也不曉得蘇維埃的法律。但是，或遲或早，她們總可以由婦女部聽到組合是擁護她們的權利的，使她們和產業工人一樣，每日做八小時的工，每個禮拜有一日的休息，此外還有特別的休假和社會的保險。住近工廠俱樂部的家婦們，都被引入工廠的文化活動裏去，至於那些住在 *Posholky*（工人村）或者公共寓所的就

在當地爲她們組成特別代表會議的組織。

婦女部利用合作社來推行特別的婦女工作。合作社常是首先爲組織寄兒所籌款，有許多還有母親的和嬰兒的同樂會，供給嬰兒需要的用品。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有一百五十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個消費合作社的女社員。對於婦女的生產合作運動也加以鼓勵，在許多鄉村裏面，寡婦們和獨身的女人們已經組織了 *Arbels*（註1）來販賣牛油和幾士，或手

工業的出品。

三月八日的『國際婦女日』常常是一年的計劃的焦點。在這一天俄國各處都開特別婦女大會。同時要成立新的託兒所和診療院，臨時膳堂和洗衣所，提高許多女人的地位來做較為熟練的工作。在這一天所有婦女的刊物都刊行特號，所有俄國的報紙都專事論述婦女運動。應有的設備事前早就辦好，女人們有半天的休假來參加大會，在那天晚上戲院都停止演劇，以便女人借用劇場。

婦女部總部刊行四種月刊。全蘇維埃聯邦，有十五個婦女刊物，暢銷到三十三萬七千四百份。但是這並不能代表讀者的數目，因為訂閱者常常是團體，俱樂部，圖書館，鄉村閱書室等等。這些雜誌的文字是淺薄的，插圖極其豐富。當發覺大工廠的女工好讀時裝雜誌的時候，婦女部立即在它的刊物上增加時裝的頁數和花樣，這樣一來，讀者就越發加多了。會有一種特別的嘗試為這些刊物造就女 *Rabkors* 和女 *Solkors*——工農婦女通訊記者——她們有整百的人是常川的通訊記者。女人們也被招致去做正式報紙的通訊記者，全俄

國二十四萬農工通訊記者之中，有三萬是女人。這是一種極重要的制度。藉着這種辦法，人民可以常常對於工廠經理或鄉村職員的一般政策或一般行政表示他們的不滿，他們時常能得到反應，因為這種通訊，雖然有時報紙限於篇幅不能登載，却總要加以注意。在莫斯科以及其他各地，已經成立了許多「無產階級婦女著作界」，其中的份子都是較有才幹的女工通訊記者。她們每個禮拜由各工廠來聚會一次，誦讀或批評彼此的論文。

婦女部的工作擴張到蘇維埃聯邦的各處。爲要充分地了解它的意義，不可不看看地圖。散布在大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外高加索，中亞細亞以及遠東等地，有三千萬不是俄國人，他們的種族在一百種以上。在帖木耳和無名英雄的墳墓以下，是莊嚴的尖塔，杏仁樹，甜美的果子和鮮艷的顏色，而女人們的生活還是醜惡可怕的。這些邊地上的人民，還在原始狀況下生活着。他們所有的不過是粗笨的農業，種棉和畜牧，在城市裏面，有手工業和商業。在中亞細亞，有百分之十是俄國人，其餘的大部分是回教人。蘇維埃政府有完全的統治權，但是在社會的風俗裏面，*Shariat*（註三）的法律有着更大的勢力。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

妻，她們要貞潔地被囚在深閨，如果丈夫死了，寡婦或寡婦們由親族手裏承受剩餘的財產。買賣婚姻還很通行，在不同的區域，一個妻的身價由二十四羊到六十四駱駝。因為一匹駱駝可以要價一百個盧布，所以窮苦的土耳其農夫淒慘地抱怨，他們連一個妻也得不到手，而富足的人却佔有兩個以至三個。父母一旦得到很高的價錢，便溫和地讓女兒被人擄去。在家中和在田中，女人的勞力受父親或丈夫殘酷的榨取。如果她出外，一定要蒙着厚紗；至於到市場去購買自己的食物和衣服，尋常是不能得到允許的。在這些人民當中，生產工作女人實比男人做得多，他們佔有女人，差不多完全為着營利。

那些從事反抗的女人，要受極殘酷的苦痛。烏支比吉斯坦 (Uzbekistan) 有一個女人被鎖禁了五年，因為她要揭開面紗，以致觸犯了她的丈夫。諷罕默德的法律允許一個丈夫「剝奪他的妻的自由，在警告之後，還可加以肉體的刑罰。」Shariat 規定十二歲結婚，不過平常是春情剛見發動便舉行婚禮。衛生狀況是難以形容的，各種疾病都在流行。

女人們完全不識字和不開通，所以她們難得有機會知道蘇維埃的法律已經廢除了這

一切野蠻風俗，並且改變了婦女整個的地位。土耳其門尼斯坦（Turkmenistan）的全部，一九一四年祇有二百五十個識字的女人，在烏支比克（Uzbek），城市中識字的人數是百分之·五，鄉村中識字的人數則為萬分之一。直到一九二三年，這些國家裏面的婦女地位，並沒有什麼改變。偶而有一兩個共產黨員在家庭中給女人自由，不過就是在內地的共產黨員中間，舊的風俗也還存留着。從一九二三年起，婦女部在她們中間工作，現在到處都有她們的宣傳。在可能的時候，當地的女人被派到莫斯科去受訓練，預備在她們本地人中間工作。否則俄國婦女在她們中間工作。說到這些區域的工作，可以用事實來評判；曾經有過幾次俄國的女職員和當地的女人被她們的狂怒的父親和丈夫所戕殺。在東方工作的整個方法，必須適合當地的情形。要令她們行使選舉權，有時必須令她們蒙着面紗坐在一間隔離的屋子裏面，由門口或者窗戶來參加會議。在別的地方他們的會議要完全分開。過今年居然有整千出來選舉的女人，東方全部有一萬七千個女人選入蘇維埃，現在這些地方最高的行政機關也有女人參加。三月八日那一天，中亞細亞各處都有民衆大會和婦

女大會。整百的女人騎着駱駝來赴會，有的騎着馬從中國的邊境走來，那路程足有四五十 *versets* 遠。在那一天有六千女人掀去了她們的面紗。從那一天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有八萬七千烏支比吉斯坦女人不曾蒙過面。

要想引領東方的女人來和男人度共同的文化生活，現在是辦不到的，工作的大部分限於婦女俱樂部的組織。接近她們的第一步，是教她們清潔生活的初步規則，即如肥皂的使用，和母兒的照顧，她們有許多女人還不曉得。在塔希根 (Tashkent) 和巴庫 (Baku) 有婦女部組織的模範俱樂部，每一個都差不多有兩千人。其中設有藥房，診所，託兒所，產科，誦讀和習寫的課程，初級政治學，打字科，工場，戲劇，音樂，以及藝術的團體。散布在市鎮和鄉村各處，有許多小俱樂部，婦女宿舍，和 Red Corners，不管當地的情形如何，一切工作都很相似。在游牧的民族當中，『紅色帳幕』已經出現，女人被引到那裏去聚會，漸漸地發展較多有組織的活動。有七萬以上的女代表按時參加會議和上課，藉着傳單，電影，和普通會議，使整千的女人都受到影響。在東方民族當中，有一萬八千零七十五個女黨員，佔全數的

百分之十八，但是內中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是當地的土人。

婦女部幫同女人們做開設特別學校的奮鬥，因為革命以後當地的新學校常是專收男生。有一萬五千以上的女人學習讀書和寫字，一千以上的女人在塔希根的高級的學校肄業。校中已經設有女醫科和女師範科，這都是從前所未有的。婦女部在各處都設有經濟和法律指導機關，成羣的女人跑了來，她們開始曉得不一定要服從丈夫了。託兒所和幼稚園已經開設，此外還有為母親和小孩組織的機關。合作運動因為特別婦女商店的開設，大加興盛，女人們在那裏得到有生以來頭一次為自己買東西的機會。

學校乃是全部東方女人的最大要求。祇有藉着教育她們才可以得到解放。同時，有兩種偉大的勢力可以使她們自由：第一種是發展經濟的新機會，蘇維埃政府正把這種機會給與所有人民，為婦女創造家庭以外的工作的新需要；第二種是婦女部準備她們做較大範圍的活動的工作。

當共產黨的女黨員在百分比上還佔少數，在黨內還少佔較高位置的時候，在

mol (共產青年團)——共產黨的預備學校——的組織中，女生的人數已佔全體的五分之一，而在少年先鋒隊 (The Young Pioneers)——兒童的共產黨組織——則差不多有一半是女隊員。當我問到女子部的時候，莫斯科 Comsomol 的那位少年書記很詫異的望着我。他告訴我他們沒有分部的必要，因為他們一切工作是在少年男女一起做的。他解釋說，婦女部是祇有這一代需要，因為從前女人受教育的機會比男人的少得太多。但是現在的教育機會已經是平等化了，特別的婦女工作下一代應該不再需要了。在 Comsomol 的組織裏面，同別處一樣，很少女人佔較高的地位，雖然有許多在地方小組裏邊有位置。女孩子們告訴我，那些男孩子們起初反對她們工作，並且要將這種組織完全歸入他們的掌握，但是現在的態度有了進步，因為女孩子們已經表現出她們所能做的事情。我向一個熱心的 Comsomol 女團員問，在這種組織裏邊女團員們最大的興趣是什麼。

『在相當工作方面成爲熟練的！』她毫不遲疑的回答。『我們對於結婚的問題並不發生很大的興趣，像我所聽說的美國的女子那樣。我們的興趣是在尋求真實的同志，他們也』

是熟練的工人，我們可以和他們將生活建築在一種永久的基礎上。我們對於家庭有什麼需要呢？……我們要舒服，要有文化上的利益——我們有公共的廚房等等，因此我們不用操心這些零碎的事情……』

Comsomol 的女團員像婦女部成年的女人一樣活動。她們不論在那一處——組合，學院，鄉村——她們常常被人期望做青年人的領袖，而她們也常常做到了。她們在各地雖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對於機關或社會常進行真有價值的工作。莫斯科 Comsomol 的組織，曾經在全省區進行過膾炙人口的工作。在鄉村裏面，他們組織了六百個『農業團體』。成人和青年人都來加入。第一年，他們在晚上一塊讀書和研究，第二年，從事一些實際的工作。雖然在這些團體的七千會員之中，祇有八百三十九個是女人，這終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其中有十二個團體由女人充當主席，許多這樣的團體有 Domovodstvo (家庭科學) 的特組。這些 Comsomols 曾經討論到提高鄉村農產的具體問題，並且留意到使農人們用農田輪種 (Crop Rotation) 的複田制 (Multiple Field System) 來代替三田制 (Three

Field System) 改用精選的種子，和改良照顧牲畜方法等問題。在莫斯科省區裏面，有七個村子接受他們的指導，實行複田制，並且有許多地方已經舉辦牲畜的共同飼養，見出農人們在牲畜上有了第一次的飼養改良。甚至那些幼小的『先鋒隊員』也可以給予鄉村生活一種重要的影響，他們將從學校學來的較好的農業方法告訴給家裏的人們知道，組織模範區，並且派出衛生視察委員來擴大衛生的宣傳。

(註一) 合作社的簡單形式。

(註二) 回教法典。

第五章 婦女與教育

在舊俄國的時候，不祇男人比女人容易有受教育的機會，使得不識字的女人的百分比多過男人的三倍，而且因為女人的生活中毫無抗拒的能力，舊制度的存留給她們以格外大的惡影響。男人受着環境的壓迫，至少要把他們所學的那種遠離人生經驗的東西拿來實行。因為男人必得出外與實際問題掙扎，舊方法蒙混的影響於是得到相當的修正。但是

那些入過學校的比較少數的女人，當她們返到瑣碎的家庭職務之無邊際的煩厭的日程中，就沒有什麼來刺激她們向前進展了。不論在賢妻良母的養成上，或在社會更寬廣的利益的營求上，教育對於女人都沒有什麼貢獻。

俄國的新學校已經廢止了大多數的老方法。新教育問題到處都有詳細的討論，因為祇有教育能使解放婦女的任何政策發生效力，所以考慮婦女的地位而不涉及特關重要的教育方面，一定是不能圓滿的。蘇維埃政府按照美國實驗過的現代法則，改造它的整個的學校制度。新教育上最大的貢獻，下一代的男女得以同等的享受。它貢獻給兩性一個新紀元。它要把人類的心靈造成一種建設新世界的強大工具，不祇給與各個人生命的了解和欣賞，並且給與在生命的歷程中做聰明的參加的準備。日下俄國所推行的教育功用，不再是強把半生不熟的事實注入兒童的腦筋，祇是藉着創造的經驗來鼓勵兒童去求親切的知識——滿足好奇和求知的豐富本能，這種本能有時可以跨過多數教育的障害，不過它會從源頭上為顛倒混亂的方法所壅塞。新教育要使青年男女所有的官能得到合理的充

分的發展，並把他們的環境改造得更切合人類的需要。

具有一切生活和勞動的歷程的當下的環境，乃是兒童課程表中的第一科目。以此為起點，推廣開來，由鄉村或城市區域，國家，以至國際的問題和關係。各種科目環拱着自然與人，勞工與社會等中心問題。相關科目的這一種結合名為『複合制』。教員和學生選擇一定的特別設計，或組合企業。舉例說，他們可以將伏爾加河作為一種設計，研究當地的歷史，地理，和經濟。他們的日課乃是特殊的探討工作；藉了面積，物產，和人口的實際問題來學習數學；藉了每組選就的特別事物的報告來學習寫作。應用很多的模型和圖畫，表冊和圖解。我曾參觀過這種特別優良的工作的展覽會。

低級班是很少用書籍的。兒童們頭幾年由一個教員指導做一切工作。隨後用實驗方法來代替複合方法；在實驗室裏面，兒童研究他們問題的各方面，那裏有各科的教員做他們的指導。在鄉村學校裏面，這一層平常是辦不到的，因為開頭七年的一級通常由一個教員教到底。舊日演講和考試的制度，已經完全不見了，一個教員現在成了一組的組員。自治會

已經有很大的進展，就它自身說來，乃是一個意義極深的教育的功能。大體說來，男孩子是比女孩子活潑一點的，並且常佔較高的位置，不過同時也可以見到許多女孩子充任學生執行委員會和各種特別委員會的會員。

新教育有一方面，對於女人特別重要，那就是自助的注重。這種辦法在男女兩方面同樣施行，並且日常工作，如鋪床，補襪，灑掃等等，正如洗澡和穿衣一樣，在將來是要看作各人生活的一部分的，祇有須要公共管理方能做得好的事情才是例外。因為兒童訓練裏面含有這一類的事情，學校實在代替了家庭相當的功能。

假如新教育計畫在俄國各地有充分的進展，有受過良好訓練的能幹的教員來推行它，那末，關於預備將來的女人行使職權的工作，差不多就算完備了。新學校大部分的價值，是還在實驗的時期，教材方面當然還是混雜的，幼稚的，並且十分缺乏的。像海上老人一樣，對於既往多所固執。舊教員要再來受教育，同時也要訓練新教員，不過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對於新計畫的一切，祇懂得很少的一點，或竟完全不懂。在新方法施行的程度上，有很大的

差別。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施行得很充分，成功的程度不同，但是時常產生饒有興致的結果。在鄉村裏邊的實施我也見過有成功的。有一些鄉村，如馬斯羅夫結特，看不出有一點徵驗來。兒童們照常單調的誦讀，並且朦朧地說他們的得數。但是鄰近的鄉村學校，就常出來旅行，參觀機器廠，調查牛乳店，察看田間的機器，考查美國人的生活。他們睜大的眼睛到處觀望，發出無窮的問話，寫下許多的記錄。『你們美國什麼時候革命呢？』瑪麗璧克佛真死了嗎？『爲什麼你們的麥子比我們的熟得快？』爲什麼你們把豬養在那樣乾淨的地方？『美國的農夫在田裏也裝電燈嗎？』

免費的普及教育是蘇維埃共和國最初夢想的一種。大量的傳單向四方散發出來，述說從事識字運動的新村鎮。宣傳列車在國內來來往往的從事文字的傳播。在蘇洛金斯克伊 (Sorozhinskoye) —— 饑荒時代美國貴格會的總部 —— 革命前有五間學校，在第一次狂熱期中添設了十七間新學校，分教原來學校的設備，聘請那些稍識幾個字的人來充當教師。各學院中擁擠着兩三倍的學生。但是政府受着連續的災難的壓迫，不得不將注意點轉

移向別的事情上去。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學校的經費由中央政府移入地方的預算。饑荒越發妨碍迅速的發長。在這種恐怖時代，很多地方的學校完全關了門。在那些日子，狂亂的人民把一切可以攜取的東西都拿來交換食物，學校的設備全被「吃光」了。學校建築物、門廊和棟樑，維持許多人民免於餓死。

謀恢復的努力是很偉大的。饑荒的後一年，我在境內旅行了四五百哩路。我到處參加農民的會議，那些會議都在討論如何重新開設，或重行建築學校的計畫。在那些日子，教員們所得的薪金是僅僅不致餓死的口糧。這是農民自行湊集的，每個月的第一日送他們的子弟入學，就他們能力所及，饋送一小袋或多或少的穀類。雖然缺乏原定教育計畫的組織，並失掉學校應用的物品，都還有積極的效果。有許多農人曾經告訴我，他們因為要入學校怎樣的被父母鞭撻，以及怎樣祭司們警戒說除了教會學校都是反對基督的。現在老人們都說，「我們是愚昧無知的人了——我們是傻瓜叻——但是我們不願意小孩們也做傻瓜！」既已創造出這種求學的渴望，它的本身就已不是小小的成功了。

雖然是貧乏和設備不週，也有他們積極的方面。在俄國遼遠的內地的鄉村，任何新教育的回聲還沒有達到這些教員的耳朵，他們為環境所迫也要應用現代最進步的方法了。關於學校的設備，除了環繞着他們的生命以外，他們一無所有。他們觀察並繪畫走獸，飛鳥，和花草，研究不用書本教學的理由，把學校變成了小小的博物院，藉着耕種他們自己的田園來維持學校的存在。有的時候教員在一間農人的草屋內火爐旁授課。兒童們用木炭的碎塊寫字在舊木板上面。他們把舊政府的檔案的空頁拿來當紙用。鉛筆要一直用到沒有鉛條，祇剩下黏在筆杆上小小的一片灰色。校園是盡量的加以使用，有的時候，一天之內兒童們要在園中換三次班。

當中央政府又能注意教育的時候，就執行得非常嚴厲。現在所進行的問題，祇是他們要有一個經濟的基礎，用來保證適當的教授和遠大的進步。他們甚至需要減少高級學校相當的數目，以便造就那些未受教育的，並且對於低級學校加以較多的注意。他們特意收錄工人，農人，和他們的子弟，這些階級在從前是永遠沒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的。他們用競爭

式的試驗來甄別學生的去取，使得資產階級的學生更加難以取錄，因此，祇是那些很有才幹的才可以留下來。他們對於教育制度的態度，已經有了重大的改變，爲要反應以下兩件事實：第一，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因別國革命運動的失敗而延期；第二，資本主義各強國的封鎖和干涉使俄國不能全神專注於建設計畫。蘇維埃政府既堅決地要求和平發展的機會，它相信祇有它的進步才是它的和平的導線，並且終歸有一天世界資本主義要來和它衝突。因此，教育問題不祇教導兒童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生存，還要爲共產主義的社會而戰爭。這意義是，摒絕一切他們的敵人的書籍，從孩童期起就將黨綱和口號教給孩子們，成爲他們的福音。盧那查爾斯基 (Lunacharsky) 說，『教育是掩護共產主義藉以成熟的內部進程的盾牌。』但是他們也將教育轉向戰備的用途。

俄國的新教育，顯然是共產主義的教育，不是自由教育。這並不是說，他們放棄了任何原定的理想。不過他們覺得，因爲受着敵人四面的包圍（像一個鐵環子一樣），他們第一歩的注意，不能是發展較好的個人，祇能是發展較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遇着十分聰明的教

員，兩方面都可以顧到。但是假如要犧牲其中一方面的時候，那就要犧牲前面一種了。凡是反對這種制度的人，須要記着，創造的智能同發展，在這裏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得較大的機會，不論他們的方法會取任何狹窄的政治形式，他們編制兒童不亞於改造社會。他們既要忠於蘇維埃政府，他們就不要忠於現狀，但要忠於現狀後面活躍的理想。兒童們在這件事情上面有着很大的興趣，因為他們自己在幫助建設，並且親眼看見它的發長。從女人的觀點看來，這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她也有份來與男人負同樣的責任，又因為這種趨勢離開了私人家庭單位的發展，相信一切婦女在照料家務之外都有相當的社會功能。這是供給男女平等教育機會的一種政策。

俄國的教育一直伸張到嬰孩期的頭幾個月，在養育嬰孩的機關裏邊，職員們要有醫藥知識，同時也要有教育知識。爲了這個緣故，特別注意把充分的顏色，變化和動作納入兒童的周遭，抵消各機關難免的循例生活的消極影響。雖然有一些武斷的蠢人說，玩具是『布爾喬亞主義的殘餘』，兒童們不應當有，不過這不是一般的政策。玩具對於兒童的發展，是

與空氣日光同樣重要的，不過要知道，即使對於很小的兒童，也應當給他雛形的玩具，不可以給他完全的東西，爲要刺激他創造的活動，最好的玩具應當是『可以由它造出別種東西來的物品』。教員對於兒童的動作越少干涉越好，使他自己的機智得以充分地發展。用了遊戲的形式把社會義務輸入進來，乃是越早越好的，小童們輪流着來『服務』——幫助擺列桌子，傳遞碟子，以及灑掃。爲他們製下圍裙，以便他們自行穿着，小床要造得低低的，使他們可以扒上去，手巾和牙刷都記下記號，使他們可以辨別出他們自己的來，面盆要放在他們摸得着的地方。醫藥界正在特別研究一種他們所謂『兒童心理衛生學』，用來決定訓育嬰兒的最好的方法，將衛生和教育工作綜合在一種聯合計畫裏邊，作爲兒童後來受教育的準備，並且定出工作和遊戲的標準，免使兒童過於疲乏。教員們也要同母親們合作，至少要按照衛生的規則改良家庭的環境。一切兒童教育工作的主要目的，依婦孺局的比巴拉娃 (Bibunova) 的說法，是『喚起兒童內中的活動；發展集體主義；給他們一個世界的模型；養成衛生的和工作的健全習慣，並且訓練他們的自助的精神』。對於下面兩件

事也加以極大的注意：第一是『人生樂觀態度』的發展；第二是聘請真正愛護兒童並了解兒童的人們來擔任兒童工作。

託兒所的第二步，是幼稚園和遊戲場，或『入學前的教育』，其中收容三個月到八個月大的兒童。革命以後，幼稚園像菌一般的增多；有一個時候達到八千間，收容三十萬的兒童，後來差不多完全關閉了。最近幾年又興旺起來，雖然它們的經費大部分靠着地方的預算，在莫斯科一處共有一百零九間幼稚園，收有一萬兒童，別的城市也有相當的數目。實際上一切工廠都添設了幼稚園，當兒童出了託兒所便可以到裏邊去。在沒有組織好幼稚園的地方，常常設有幼童室，由受過訓練的工人負責管理，這與俱樂部是有連帶關係的，女工們可以把孩子暫時放在那裏。

最近幾年，對於鄉村暑期遊戲場的發展，已經大加注意，這些遊戲場專門收容三歲以上的兒童，藉以幫助在田中工作的母親，並且造成從託兒所到學校教育的聯結，以便兒童將來對於學校課程容易起同化作用。在一九二五年，教育部派遣二百個實習生到鄉村來組

織暑期遊藝場。因為除了他們自己的薪水以外是一無所有，他們必須捐款來購辦工具和糧食，同時又要博得對於他們常懷仇視的當地居民的贊助。到末了，各個實習生都得到當地機關和聰明農人的幫助，並且捐够了款足以維持極忙的幾個月。中遊藝場的進行，政府原祇籌備了五萬一千盧布，結果捐得的款項超過五十萬盧布。每年夏季派出的實習生是愈來愈多，因為他們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以及當地教員、醫生和婦女部組織員的贊助，蘇聯各地已經組織了三千暑期遊藝場，收容了十五萬的農家兒童。現時計算起來，初級學校每五十個兒童有一個在幼稚園。計畫在一九三零年縮減到二十與一之比。

入校前各機關中的訓練，包含正式學校的一切元素。第一個要件是設法使兒童的生活與環境發生密切關係。在他們集體生活的發育中，他們必須佔活動的部分，並且因為在可能範圍內分任機關中的工作，於是變作遊戲的形式，每個幼童都很喜歡做。課程單上說，『在生活的常態狀況下，每個成年人的工作都應當快樂而且自由，兒童的工作也應當快樂而且自由。』即使在幼稚園裏面，也已經開始成立自治會。兒童們常有聚會，討論問題，通過

議案。年紀太小的兒童，不能施行現下學校的互相監督制，但使他們負責保持物件的秩序，執行相當初步的任務，已經獲得很大的成功。在兒童的一切訓練中，注重自然的研究，以發展他們觀察的能力，激動他們考查的興趣。『繪圖和造像的自我表現，以及各種遊戲，在在給與一種鼓勵，在『創造兒童和環境的諧調』上，音樂又被看做極重要的。在一切兒童機關裏邊，發展出全體合唱與唱歌遊戲。但凡可能的地方，都設有幼稚園和動物園，新鮮空氣和運動差不多成爲一種偶像。教員須使兒童的生活成爲社會中一個活動部分，所以兒童要有普通的假日，領他們去參觀工廠和社會的機關，又令他們和其他的兒童來往。當一切公共的假日，有許多兒童演說，背誦，和演劇，他們完全不覺得慚愧。

介紹給兒童的文學是嚴格的寫實性質的，祇教給他們麻田怎樣轉移成長衫，不教給他們公主怎樣變化成天鵝。訓令中說，『我們文學的內容，必須依據生活的事實，對於兒童應是切近的易解的。也必須滿具勇敢的感人的意思。要用世界上自然和人的創作來代替發達恐怖和幻想的神話。』有一些俄國最好的藝術家在爲兒童的書籍作圖畫。固然有一些

是粗糙的，不過我所看見的大多數都滿具美感和情趣；與實物教授一般。至於託兒所裏邊，遊戲場成了父母受教育的中心，同時藉了兒童帶回家去的習慣（有一個農家母親抱怨說她的小孩子自尋苦惱，當他回到家裏，他就要替各個人擦鼻子），以及父母在扶助此種工作上的交換。

這種入校前的工作，在下一代人身心兩方面的發展上的影響，特別對於女孩子們，是非常寶貴的，試想在往日農家小孩從六歲起便要做看護，擦地板，洗器具，修番薯，學紡紗，織布，向田間運水，以至參加田間工作了。

『社會教育』是一個施於一般初步訓練（從八歲的兒童起）的名詞，推行在『聯合勞工學校』裏邊。一九一八年十月，第一次學校法令公布的時候，政府就宣布蘇維埃憲法所規定的普及的強迫的教育。考察普及教育在俄國施行狀況的第一個委員會，為普及教育的推行，定下勇敢的計畫。一九二三年指定了一個新委員會，更切實地計畫出來，從一九二三年起，對於八歲到十一歲的兒童，實行普及強迫教育，規定按年增加學校，教員，和學生

的數目。這個計畫爲一九二五年的法令所追認，法令上並且規定，凡能够實行這種計畫的區域，可以在期前宣布強迫教育。亞羅斯拉夫斯基 (Yaroslavsky) 和一兩個別的省區，已經實行這種制度。在俄國境內，這幾處經濟的恢復是比較迅速的。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烏克蘭也通過一條強迫教育的法律。有人批評這種辦法在俄國他處施行未免過早，因爲對於所有達到學齡的兒童還未安排好，雖然在校兒童的比例是比蘇俄聯邦的大。教育部規定的計畫雖已越過，不過盧那查爾斯基及其他教育領袖頗懷疑即使在一九三三年也不見得能施行強迫教育。一九二六年蘇維埃大會，盧那查爾斯基述說教育部所遇到的主要困難。他們的計畫，因爲經費缺乏，建築物和教材不敷用，教員薪金大小等等緣故，極感困難。薪金低廉的結果是教員稀少，因爲青年人當然要選擇報酬較優的職業。雖然教員的酬金在一九二二年達到戰前的百分之二十四，在一九二七年增到百分之四十七，比較普通工人的工銀還是低的。在鄉村區域內，有許多阻碍兒童入學的原因。距離學校較遠的兒童，沒有相當的鞋子和衣服可以在風雪泥濘的路上行走，要打算把他們運送了來便是一個難

題。事實上，許多兒童因為養育不足，體質不良，不能繼續他們的課程，特別是女童方面，在家中操作的太多了。教育也常是忙不過來。他們的班級實在是太大（他們一天常換幾次班，）所有教員同時要擔任大部分的社會工作，在晚上教授成年補習班，並且參加各種鄉村委員會。教員們，大多數是女人，對於鄉村的貢獻，是不可數量的。要使兒童有一整季到學校，常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的父母在秋季一有工作便要他們來幫助，在早春的時候又把他們叫到田間去。

在一九二七年蘇俄聯邦全體大會中，盧那查爾斯基報告說，現在兒童入學的人數，為達到學齡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革命以前則為百分之五十一。在入學兒童的全數裏邊，有百分之三五·六是女童，她們在城市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八，在鄉間則為百分之三三·六。在鄉村中男童留校的期間比女童長，但是在城市中男童留校的期間則比女童短。現在入學兒童的比例數，比革命前已有小小的進步，革命前還少過百分之三十。在許多民族共和國裏邊，教育上有了極大的進步，因為那裏的許多民族從前連一個字母都不曾有過。男童

們有時到當地的教會學校讀書，但是幾乎聽不到有女童入學。因為舊日的積習，到現在還難於勸父母送女兒入學讀書，在俄國僅有各民族共和國把男女同學當作一種例外，並且允許分設女校。

教育部原來的政策是這樣：爲要得到充分的一般的發展，在最初九年的課程未滿以前，不得有確定的「職業側重」，因爲高級學校的設施，差不多都是專門的性質。但是因爲見到高等熟練工人格外缺少，教育部已經批准在第七年以後得有專門的訓練。一九二三年開設專門學校（Technicum），規定收錄習完七年學校課程的生徒，造就他們適應工業界的高等熟練工作和職業界的次熟練的工作。在這些學校裏面，女生的數目按年增多，在有專門學校的學生中，女生佔百分之四四·八。醫藥學校，多數訓練看護和產婆，女生佔最多數——百分之九三·六；其次是師範學校，佔百分之六四·五；藝術學校，佔百分之五七·七；商業學校（訓練簿記員等等），佔百分之四四·六；農業學校，佔百分之一九；工業學校，佔百分之八·七。

鄉村也需要與工廠學校相當的機關，『農家子弟學校』就是組織來應付這種需要的。這些學校收錄鄉村中十四歲到十六歲的男女兒童，繼續他們的普通教育，並且授以農業的現代科學方法。目的是將這些學校變成現代農業的中心，結果會使鄰近的農民受到影響。三年以前初成立的時候，祇有百分之十四是女生。當下在這些學校肄業的女生，共有一萬六千人，或可說是六萬人的百分之二十六。課程裏面包含有家庭科學，縫紉，育兒，以及性衛生的特別科學。女童們並不把自己限定在這一方面的工作，她們也有許多人預備去充當亞克朗那姆 (Agronomists) (註1)，並且在農人中間傳播現代方法的福音。到各種農業學校肄業的女生日見增多，在農業試驗場裏面，從事科學調查的工人，女的佔百分之三十。

在低級學校中施行普及義務教育，現在還辦不到，城市裏面暫時還要收學費。徵收的數目，限定工會會員納月薪的百分之五，失業工人的子女例行免費。鄉村富農的子女，也要納些少費用。在容納不下所有達到學齡的兒童的地方，城市中工人的子女常有優先權，鄉村中頂窮的農民子女也有優先權。正式學校中地方不够用的時候，枯拉克和小資產階級有

時爲他們的子弟另行組織私立學校。

在拉布費克 (Rahms) 中或『工人指導員』中——爲高級機關未受過初級訓練的工農所設的一種暫時辦法——女人的百分比從百分之十四長到十七，或三萬二千八百一十六人，她們期望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的時候，能够增到百分之二十。在大學院和高等專門學校，女生佔全數百分之三一，在醫藥學校和師範學校，她們佔最多數。七年修業之後，實際上，當下並沒有普通教育這種東西。女重要繼續她們的學業，或到高等專門學校去研究醫學，教育，社會科學，工業，或一種藝術，或者，假如她升入大學的話，她就專心從事分科的研究。高級學校的分科，因要迅速地推行以滿足受過教育的人們的迫切需要，成了決定婦女運動的程度和能率的重要因子。它拯救了許多的女童，使她們不致再蹈許多美國青年婦女的覆轍。美國婦女的教育，使他們了解自己是在一個滿有偉大事業的世界上，這些事業他們是喜歡參加的，但是他們未曾受過在任何特殊範圍中做有效的活動的訓練。它給與工農羣衆一種空前未有的機會，按着自己的興趣去發展，不再接收他們從來的

生活。

高級教育也在推行與低級學校同樣的新方法。到處的課堂都用做實驗室，到處都努力使理論和實施連結起來，暑期的時候，學生們常去充當實習生，在實業界或職業界裏邊各就自己所研究的選擇一種工作。發給文憑的標準，不在乎零碎的無聊的考試，而在乎用所學的一切解決相當實際問題的成績。

如果不述及蘇俄聯邦的兒童院——現在共收容二十五萬兒童，百分之九十五是孤兒——則教育制度最匆促的觀察是不完備的。這些兒童院是由教育部管理，就因為它們的組織，外界人才得到這樣一種印象，以為蘇維埃政府在計畫使一切兒童離開父母。事實上，有一些本來是組織了來作由國家訓練兒童的未來的模型的。在恐慌的日子，那些沒有永久居處的父母，都喜歡有一個安全的處所來照顧他們的兒女。但是，大體說來，兒童院是為孤兒設立的，孤兒大多數是饑荒的結果。當時有許多父母，既知道兒童院能夠給與他們的兒女一種較好的生存機會，立刻便把他們放下來。許多別的孤兒是由災區出來的時候離

開了他們的家族。有些兒童入院時確鑿地說他們是『十足的孤兒』並且詳細形容父母死亡的慘狀，可是後來又有很多兒童說是死了的父母出現來認領這些兒童。於是決定施行一種政策，把一切非孤兒的兒童摒出院外，最近幾年兒童院的數目減少了一大半。這種政策的施行，並非反對兒童院的宗旨，不過一方面因為太多費用，另一方面因為工具的缺乏，把兒童陷入黯淡的境地，在那裏學不到一點什麼。把我所參觀過的兒童院，拿來和平常孤兒院的情形比較一下，空氣方面要好得多了，在那些地方倘使微幸得着能幹的教員，實在是快樂的地方。例如莫斯科的城外普希金（Pushkin）音樂藝術學校，其他兒童院中具有音樂或別種天才的兒童都送到那裏去。施賓（Tshin）先生是那裏的負責管理人，他曾經編過幾種歌劇，並且在布爾蕭（B. Ishoy）戲院的樂隊中弄第一枝笛子；他的妻，唱歌家兼教員，是一個快樂的婦人，把她整個的生命都獻給學校了。我從未到過一個比這裏更快樂的地方。因為有許多無家可歸的兒童，還是襤褸不堪，在俄國境內四處游蕩，教育部定有一種計畫，希望在三年以內解決這個問題。這種 bezprizornies（註二）的隊伍，差不多完全

是經過饑荒時代，討過飯，偷過東西，並且藏在火車下面四處漂流的那些男童。那種生活的刺激，使他們不能循規蹈矩；每被招呼到一個人家去，一有可能就逃走出來，由自己去滿足他們的需要。女童很少逃跑的。「勞働集團」是收容這些青年的一種方法，他們在那裏有住，有食，有工作。當他們幫助組織這種集團，並且用自己的勞力來購置設備的時候，他們每對這種事發生興趣，因此可以組織正式的班課，教授他們一種職業。另外一種方法是將他們安置在農人或工匠那裏，政府給這些農人和工匠相當特殊的權利，期望他們能教授兒童種田的方法或手藝。這種方法的第一次實驗是失敗了，因為農人是善於擯取兒童的勞力的。在這些情形下，兒童會留居一個冬季，但是一到初春，他們就跑走了。現在，至少在大城市中，他們已經規定下一種制度，事前對於人家加以小心的調查和選擇，事後又留意兒童的行徑。有許多兒童無處可歸，當他們在十六歲上從兒童院解散的時候，為要補救這種情形，因同勞働組合協定下，每個工廠或商店，要保留相當數目的學徒位置，分配給這些兒童院。當這些青年人在外流浪的時候，他們有許多陷入犯罪的行為，一旦入了常態的環境，

不論怎樣富有刺激性以保持他們舊日生活磨練出來的情趣，也很難使他變成了常態的兒童。政策上並不將他們常作罪人看待，祇給他們常態生活的一個機會，不問他們的行為如何。對於那些真有缺陷或足以危及社會的兒童，另設有特別機關。這樣兒童的數目已經逐漸地減少了。

成年人的教育統轄在教育部的 *Glavpolitprosvet*（中央政治教育局）下面，局長是娜達利亞克魯斯嘉亞（*Nathalia Krupskaya*），列寧夫人，一個穿舊黑衫的白髮小老婦，因為最能負責，所以是俄國最著名的女人。她不間斷地致力傳播教育的職務，在列寧逝世的時候，每個人都在談論如何追悼，她獨請求把錢不要用在列寧的鑄像和建碑上，乃要用在教育上，並要幫助無家可歸的俄國兒童。

克魯斯嘉亞的意見，以為中央政治教育局的主要工作，是將革命的意義和目的教給農羣衆，這是祇有令他們先識字，然後可以辦到的。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在莫斯科一間清冷的屋子裏邊，格支教授穿着 *hula*（註三）和 *ya*

Ionkis (註四)寫一道命令，規定蘇維埃共和國一切從八歲到五十歲的人都受一種教育。法令上規定，凡是識字的人都可以註冊當教員。工人要在每個禮拜中的一天，早放兩點鐘的工來讀書，工資照足發給。有些人以為每個人都識字的工作，在兩年之內可以完成。有六百萬冊的初等教科書刊布出來，有十五萬個習過速成科的臨時教員。隨後兩年之內，差不多有五百萬成年人學會讀書和寫字。自從政府的預算中停發這項工作的經費，進行得就比較慢了，但是沒有終止，並且由各種組織來擔任推行。軍隊和工會進行最早，因為易於傳授的緣故，每一個到紅軍裏面受訓練的青年農人或工人，退伍的時候都認得字了。他們回到鄉村的時候，這些紅軍中的農人常是來充當其他農人的教員。幾年以前，我曾見到他們當中有一個在奈得爾金加 (Nadi-Sinka) 小村裏面教着一班女人。他在自己的茅屋裏面自行開設講班。最熱心的學生就是他的妻。我問她學會讀書寫字以後要做些什麼呢。

「喂，我將來可以像男人一樣在委員會中任職呀。你看看我的丈夫，他也不見得比我能幹。不過他有過一個機會加入軍隊，雖然他失去一條腿，却是帶回教育來。因為這個緣故，他

們把他選入鄉村委員會，現在他是蘇維埃的秘書了。我爲什麼不可以同樣做委員呢？」

雖然不識字的女人比不識字的男人多着許多，但是不常見多有女人的講班，每年差不多有一百萬成年人加入講班，祇有比三分之一略多的女人。在這些完全不識字的人的講班以外，有整千的工人和農人加入 Malo-grammone 或半識字的講班，向前求進步，或免使他們再回到不識字的階級去。成人的教育本來是限到五十歲爲止，但是後來發現三十五歲以上的人很不容易學習，所以年齡的限制就縮到三十五歲。

中央政治教育局的一種重要工作，是 Isbatshetahnia，或『農村讀書室』，全俄國共有二萬六千所。農村讀書室有時附屬於 Narodny Dom，或『人民議院』，在那裏舉行會議和展覽，有時是一間單獨的草房，其中有從一間到四間的屋子；藏書室，閱書室，和俱樂部。Isbatshetah (讀書室管理員) 平常是一個薪水低廉的黨中職員，他的任務是管理讀書室和其他事件，工作如何全靠他的能力和創造力。上一次蘇維埃大會決定，讀書室管理員應當與教員同等級，並且照樣給薪金。藉着讀書室管理員的創造力，各種團體都組織起來。一

定要有的是『戲劇的』和『農業的』團體，平常是 Politgrammnoie（政治訓練班），『合作社』，Selker（農村通訊社），『音樂的』，『婦孺的』團體，有時男人也像女人一樣的加入裁縫團體。有些地方，他們爲女人開設特別的團體，教她們怎樣保持家庭的清潔和衛生，以及雞、豬、牛等較好的飼養法，在俄國的鄉村裏面，這一些完全是女人的事務。爲要組織這些團體，讀書室管理員招請鄉村的農人、醫生、教員和來巡行的地方法官——實際上是要使村中所有的『專門家』都來把他們的知識分給知識較低的人們。

在城市裏面，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多數藉着俱樂部的工作進行，俱樂部是由職工組合來組織和維持的，教育的內容則由中央政治教育局負責。實際上，一切組合和工廠，在青年工人的工廠學校外，還爲成年工人開設夜課和夜校，組合常常選派年齡較大的工人入拉布費克，作爲升入高等專門學校的準備。戲院、電影、博物院、史蹟陳列報和紀念碑，以及公園，和具有美術或歷史意味的地方——一切都由教育部管理，教育部管理這些東西，不祇爲了正式學校的用途，並且用以滿足男女工農的文化慾，這一方面的生活，對於這一般人，從前

是沒有份的。

(註一) 熟練的農業顧問。

(註二) 無家可歸的兒童。

(註三) 一切農夫在冬季穿的粗羊皮外套。

(註四) 特製羊毛暖靴。

第六章 向着新家庭的過渡

婦女地位的一切改變，其中最迅速的和最普及的是關於結婚，離婚，和家庭的法律，第一次型成新的革命的生活態度，並且給與從前法律所無的母親和兒童的保障。

在十月革命的兩年以後，列寧在女工大會中演講道：

『工人政府成立的頭幾月，便完成了婦女的立法革命。蘇維埃政府將一切束縛婦女的法律完全除掉。這裏特別是說，利用婦女軟弱的地位以陷她於不平等以至卑下的地位的法律——那就是，關於離婚和私生子的法律，以及婦女到法庭要求父親養育兒童的

權利……現在我們可以驕傲的並且毫無誇張的說，除了蘇維埃俄羅斯，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國家給與婦女絕對的平權，改變了婦女在日常生活家庭中屈辱的地位。這是我們一種最先的而且最重要的工作……

『當然，祇有法律還是不夠的，我們決不祇爲了法令而有一刻的滿足。但是我們在法律問題裏面，已經實行了以男女平權爲原則的一切，我們對於這個實在有可以驕傲的權利。蘇維埃俄羅斯的婦女法律地位，從最進步的國家的觀點上看來，也是一種足以標榜的理想。但是我們自己坦白地講，這不過是一種起點罷了……』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發布的結婚和離婚的法令，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修成了法律。隨後幾年的改變，是當時編修法典的人們不能見到的，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元月一日，執行一種修正的法典，那是用過去九年的生活和風俗的發展爲根據的。因爲結婚的法律在人民生活的影響一天比一天大，並且引起重大的變化，於是不能執行的地方要加以修正和變通，在敘說修改的法律以前，我要先說一說原有法律的要點。

開頭大概需要着重的說，蘇維埃政府，不論其中的個人對於將來男女關係的方式懷着怎樣不同的理想，已經把一夫一妻組成的家庭定做社會的單位，並且考慮到，除了在特別情形下，母親對於自己小孩的照顧，總比國家的照顧更爲妥當。

Narkomyust (司法部) 的柏蘭頓堡斯基 (Brandenburgski) 陳述道：『曾經形成夫妻父子間權利和義務的家庭，必有一日會完全消失，替代它的是一種社會教育和社會利益的國家組織。但是這一種組織現在還沒有形成，所以蘇維埃政府要定下家庭中間相互的義務。』

教育委員盧那查爾斯基對於這個題目有過許多著述和講演，他說：

『我們憎恨資產階級的家庭，但是不能由此下結論說，從事革命運動的男人不應當有家庭，女人也不應當生小孩。……社會的核心，（我們必須極端注意的）就是家庭。……至於將來有沒有一種沒有家長的自由家庭，或家庭完全破裂，我們不必預先去斷定。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個人的差異是不要排斥的，我們也並不努力向那一方面做，所以將

來的家庭大概是有各種不同的方式的。」

蘇俄第一次的結婚法祇承認經過民法手續的結婚。宗教儀式並未加以廢止，但奪去它在法律上的意義。事實上，大多數農民和許多市民依然在教堂裏結婚。不過倘若沒有（註冊局之簡稱）發給的結婚證書，祭司須拒絕主持婚禮。

在俄國結婚或離婚，除了註冊手續要用幾個戈比，並不費什麼錢。在城市裏面，常有一長列奇形怪狀的配偶等在註冊書記官的案前，祇須二十分鐘就可以完成婚禮——檢驗合同，詢問新郎新婦是否心願結婚，並在結婚簿上寫下名字。一個俄國朋友告訴我，當她在列寧格勒結婚的時候，書記官對於來在她前頭那一個少婦很表示反對，因為這是她來此註冊的第七次了。他和她爭辯了好些時候，當時他的夾鼻眼鏡不斷的顫動下來，於是他用一條線把它們繫在頭上。到末了，那個女子終究得到她第七個丈夫。

在先有人覺得，註冊手續倘再加上長時間的莊嚴的教堂結婚，那就更有意義，更有效力了，如果結婚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有些地方專為這一件事預備了一間特別的屋子，註冊部

的長官乃是奉命來主持，並不僅是一個書記官。用『紅色婚禮』來代替舊式儀文，更能滿足一般人的要求。在許多工廠中發展出一種固定的禮節。新婦和新郎同坐在一個用紅布覆蓋的講台上，觀禮者是組合的職員和婦女機關的代表。工廠委員長是主婚人。新夫婦宣誓共同工作以增加工廠的生產，接着是合時的演講，隨後是一番娛樂或茶會。婚禮之後，隔相當時期，便要舉行 *Octobrina*（十月命名禮），用以代替舊日的洗禮，那時工廠委員又要出來主持，把小孩獻給蘇維埃政府，命名時用列寧、托洛斯基、金諾維夫，或『紀元』來代替古聖先賢的名字，假如是女的，就命名為『*Rev*』（革命），電化和莫斯科，『十月二十五』假如是男的，也許要起別種適當的名字。

俄國人是十分注重儀文的。雖然最簡單的會議，在主席和書記以外，還要正式選舉主席團。演講、問題和討論，嚴守一定的規則，並且最後要做成決議案和記錄。一切事務的執行必要伴着細密的決議案。蘇維埃的領袖本來是不關心儀式的，因為見到在民衆中建立新社會形式的基礎儀式是很有用處的，於是從事提倡革命的儀式。

現在回到結婚的法典，按原先的規定是要有一個共同的結婚名字的，隨使用新郎的或新婦的，或兩人合併起來的，但是因為尊重兩性的 *Two Sides*，於是定出一種法令來，規定他們可以用一個公共名字或依然用結婚以前的名字。

如果發現配偶中的女人未滿十六歲，男人未滿十八歲（註一），這種結婚是要註銷的，再或受壓迫的不能自主的結婚，也是要註銷的。多妻制是犯禁的，瞞婚嫁娶的人要受犯罪的處罰。結婚的禁止，祇限於低能的或才能不相稱的人們，父母和子女，或兄弟和姊妹。

離婚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夫婦雙方同意，祇要在註冊局簽一個字便算了事；如果祇一方而願意，就要到官廳去判決，因為兒童養育的問題常包含在裏邊，離婚絕對不用證明任何方面的『罪惡』，並不需要解釋和理由。

因為有許多人不明白這些法律，尤其是農民，於是全俄國推行一種報告局和法律指導的普遍制度，司法部訓令鄉村的分部特別注意農婦的利益，因為，大體說來，鄉村的狀況常使她們得不到保障。贍養問題的審判一定不要手續費，並且要在一日內提前辦理，即使還

未達到判決的地步，法庭有權指定相當數目的贍養費。

有否定的幾點——在革命的結婚法中，本可以看作不需要的——因與舊法典對照而加以注重。例如說，妻不一定要隨從丈夫，如果丈夫遷移了他的住處。結婚並不影響男女雙方的市民資格。在原來的法典中，結婚不能造成共同的財產。夫妻間對於財產的協同，法律上規定不得侵犯各方的權利。夫和妻要共同擔負經濟責任，一方需人照料的時候，他方就要負責維持。這一項規定在離婚以後還有效，直到『環境改變』那就是說，重新結婚或得到一種新的職業。

『私生子』的污名已經廢止，未結婚的父母和已結婚的父母所生的兒女有同等的權利。嬰孩未誕生的三個月以前，未結婚的母親可以向註冊局報告嬰孩父親的姓名和住址。如果兩個禮拜內被報告的人不出來反對或加以反證，就算他承認做父親，並且要擔負養育嬰孩的責任。這種辦法也適用於已婚的女人，如果她的丈夫不是嬰孩的父親。關於男人否認做父親的事件，法律上規定了下列的手續：

『如果法庭發見嬰孩的母親所指出的男人在自然的趨勢中會成爲嬰孩的父親，於是就確定他做父親的資格，同時決定要他分擔懷孕、生產和兒童教育的費用。』

女人在這些事件中接收的贍養費，名爲阿林門塔（Alimentu），對於那些必須供給費用的男人，他們常常引用一句古語『喜歡滑冰的人，一定要攜帶他的雪車。』法庭上這種執行會分去過男人薪水的三分之一。母親的地位是時常顧到的，同時也要慮到男人實際上所能付出的限度，並且要爲他保留一最小部分的生活費。如果他另有一個家庭，所有的需要也是要加以考慮的。

控到城市法庭的一切事件，有一大部分涉及阿林門塔，在鄉村法庭的佔三分之一。受這種影響的人口比例，城市的比鄉村的多着許多，因爲農家女孩子很怕丟臉，於是不長於要求阿林門塔。

這種法律把對待未婚母親的普通態度完全改變過來。在往昔的時候，結婚前失掉女貞的少女是終生沒有幸福的。有的時候她寧肯自殺，不願眼見後來的結果；有的時候她把嬰

兒殺死。假如被人發見，不是從家庭驅逐出來，就是趕快結婚來保全她的『名譽』。在往日受辱的家庭要把整個的事實隱秘起來。現在她高傲地走到法庭去要求阿林門塔了。法庭向她詢問密切的問題，她就坦然地回答，並且把訴訟的手續刊在報紙上面，那是整個世界都會見到的。不過報紙上所刊載的並不像是一件動人聽聞的破婚故事，因為俄國報紙是不把這種事件當作新聞的，祇把重要的事實列入報紙背面的『法庭欄』裏邊，未婚的母親不再是一個蒙羞的零餘者，乃是一個自尊的個人，有權利要求孩子的父親分擔養育兒童的責任。

兒童滿了十四歲，法律允許他們自行決定名字，籍貫，和宗教。到那時為止法庭由着父母決定。如果父母不能在宗教上同意，就當兒童完全沒有宗教，等待長大時自行決定。

父母必須養育兒女，照顧他們心理的和生理的適當發展，準備他們從事有用的活動。俄國以外流行的觀念——法律要父母把兒女帶在一起——與此恰恰相反。兒童可以被送到家庭以外去受訓練或教育，但是，未得他們自己的同意，不能將他們僱給人。子女也要供

養不受政府給養的須人照顧的父母。收養子是犯禁的。

俄國傳統的遺囑將爲法庭遺產條文所代替，因此妻（註二）和倚靠死者生活的戚屬得按平等比例分配財產。倘若遺產數目不足分配給所有的合法承繼人，那就先要照顧最需要的人。有時平均分配顯然是不公平的，遺囑也可以許有，不過即使有，也限定有利於合法的承繼人。原定法律限制妻所承受的財產不能超過一萬盧布，其餘的都歸國家。到了一九二六年二月，下令規定遺產沒有限制，但課以累進的稅率，對於一個超過五十萬盧布的數目所課的稅率達到百分之九十。

這就是革命以後九年間家庭由以發展的法律基礎。不爲前例所限的法庭，早就覺出要根據案情來判斷，因爲這些案情是出乎法律規定以外的。在推行的幾年間，普通都承認現行的法律已經是過了時的東西，於是法學家草成一種新的法律，在一九二五年的秋季提出來。新條文引起極大的反對，於是把這個草案送到全國各地去討論。

俄國人一到談話的時候是不會中止的，關於這個問題已經是義蘊畢宣了。不過除了這

些家庭問題的暴露之外，還是不能將俄國現下的家庭景象清晰的描寫出來。倘把所討論的事實加以細心的挑剔，你可以證明共產黨已經提倡多夫多妻制度，同時殺害了他們的嬰兒，繁殖了空前的罪孽，廢除了家庭制度，完全節慾的主張已經開始，共產主義的女人在拒絕生育，一般的女人又在被逼繁育，或者說你所要證明的一切差不多都有。

托洛斯基，在他的小冊子『人生問題』裏面，把我所見到的家庭現狀加以極真切的描寫：

『家庭關係，』他寫道，『包括無產階級的在內，是破裂了……大家都很清楚，當下有一種偉大的歷程在進行，那是十分混亂的，交互顯出病態的或反叛的景況，可笑的或悲慘的方式，這些方式對於一種新的高尚的家庭生活秩序的創始，還來不及顯露它那潛在的可能性。……』

『因徵兵而離開他日常環境的丈夫，在內戰的前綫上變成了一個革命的市民。這是一種驟然的改變。他的眼光寬大了，他的抱負提高了，而且那是屬於一種比較複雜的社會

的抱負。他成爲另外一個人。隨後他回到家裏，覺得實際上一點也沒有改變。舊日在家庭中同家人的融洽和了解已經消失。新的了解沒有發生。相互的驚訝變成相互的不滿，隨着就成爲惡感。家庭於是破裂了。

「丈夫是一個共產黨員。他的生活是活動的，要擔負社會工作，他的思想開發了，他的個人生活完全爲他的工作佔去。但是他的妻也是一個共產黨員。她想和他共同從事社會工作，參加公共集會，擔任蘇維埃或組合的工作。在他們未覺得以前，家庭生活實際上已經不存在，而家庭空氣的消失會引起繼續的衝突。夫和妻都不滿意。家庭於是破裂了。

「丈夫是一個共產黨員。妻不是什麼黨員。丈夫爲他的工作佔去；妻，像從前一樣，祇是料理家務。關係看是『和平的』。其實是冷淡下去。但是丈夫的委員會——共產黨的『細胞』——命令他應該除掉懸在家中的神像。他十分願意遵從，覺得是極自然的。對於他的妻，乃是一場大禍。祇這樣一點小事，就把隔絕夫妻精神的鴻溝給顯露出來。關係是弄糟了。家庭於是破裂了。

「一個舊家庭。十年以至十五年的共同生活。丈夫是一個好的工人，忠心於他的家庭；妻也竭力為家庭操勞。但是她偶然接近了共產黨的婦女組織。一個新的世界展開在她的眼前。她找到一種新的寬大的努力的對象。家務放棄了，丈夫激怒了。妻在她新覺到的市民意識中受了創傷。家庭於是破裂了。」

革命以後，凡到過俄國的人都看見過這類事件的各種情形。我就親眼見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個在農場任職的共產黨員，他的妻雖然沒有什麼政治思想，但是很聰明，並且讀過許多共產黨關於婦女解放的宣傳品。她覺得整天坐在家裏是很無聊的，並且想要找點工作。而她的丈夫說，他需要一個家庭，不需要一個寄宿舍。

許多家庭受了物質狀況的影響而發生衝突。最快樂的配偶是無定限地分居的。丈夫往別一個城市工作。妻留在當地工作。生活是無聊而且寂寞的，於是一個或兩個去找尋別的伴侶。在別種情形下，丈夫在政府的托辣司中得到一個重要職位，與 *Zemlen* 來往，開始享受較高的生活，常常宴會，希望他那女工的妻來為他裝點一下。有的時候一個農人墜入城

市的職業，他那二十年來的老妻就成了不合時的了。

也有這樣一種家庭，夫妻的結合是由於革命和改造國家的相同的興趣。這樣的家庭我曉得一些，普通說來，都給人一種家庭幸福的印象，比起沒有受過革命和自由離婚的破裂影響的家庭來還要好得多。

斯密多維 (Smidovich) 同志就是一個好榜樣。她是一個忠實的實行的老布爾塞維克黨員，她從前是婦女部長，現在是共產黨管理委員會中三個女委員中的一個。有一天我把她帶到克穆林宮她的家裏去。她自己也許是那門內蹣跚走開的人的祖母，慈祥地從眼鏡的邊緣望着小孩們遊戲。她的白髮由前額梳到後面，用一條小帶束着，她那一雙從銀邊眼鏡後面閃光的眼睛，充滿着理解力和思想，她的雙頰還顯出紅潤的健康的面色，那是她那一輩人很難保持的。他的丈夫高坐在禮拜日的早餐桌前，像一個柔和的老族長。有三個孩子，一個十四歲的蘋果臉的女孩，兩個怯生的大兒子，此外還有兩個表親。笑聲充滿了寬大而低頂的屋子，那一所房子是從前大彼得得常來觀操的地方。孩子們敬愛他們的父母，時刻

擁抱着他們——『媽媽，媽媽，』女孩子不斷的說，『你什麼時候放下你那蠢笨的工作來同我們散步一回呀？』

要想詢問斯密多維同志對於將來的家庭生活怎樣思想，這彷彿是不需要的。

『一定啦，』她告訴我，『我們年歲大點的共產黨員是這樣想，最好是單獨的愛一個人，並且忠心於他。我們不像別的人們那樣容易改變，因為我們的結合是比較強固的……爲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在一塊奮鬥了一生，建立在這上面的結合是不容易破裂的。我們首先要尋求一個同志——一個我們能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的人。如果相愛的情感消失，結婚的關係當然要停止。至於將來，我們知道新經濟方式定會創造出新人類關係來的。有的我們正在意識的創立——其他最好的方式祇能由生活自身來證明。我們當然用不着資產階級家庭的老方式，那是建立在女人之經濟的屈服上面的。』

我問她對於兒童公育的意見。

『我們對於兒童應受的社會訓練，還很缺乏財力來供給，』她回答說，『所以家庭必須——』

保留作訓練兒童的核心，如果沒有其他的理由。這是沒有問題的，假如我們爲兒童安排下設備完全辦理完善的機關，比在大多數家庭裏面會好得多。我愛我自己的孩子，但是究竟能看顧他們多少呢？我整天的工作，並且晚上也常工作。禮拜天是我唯一自由的日子。假使他們在兒童院裏面，在我得暇的時候他們也可以回來，同時他們能得着比我們所能給的更好的訓練和照顧，並且他們會度一種更多興味的生活。」

在這種情形以外，死守在一起的舊家庭依然存在，受着舊勢力的壓制，一切前代的遺傳都還固結在那裏——在那裏女人不僅依舊做奴隸，並且心滿意足的那樣做，在那裏女人覺得丈夫何時不打她們也就何時不愛她們了。

因爲非常強烈的震動城市的變革輸入鄉村格外延緩，所以鄉村中時常有這一種舊式的家庭。鄉村的家庭比城市的家庭是較能持久的。經濟因子黏合的作用，在鄉村比在城市強大；因爲農民家庭的改造不是一件簡單事情，土地的分配問題和財產的劃分問題常把一個家庭團結在一起。不過即使在鄉村，改變也是很快的。起初是戰爭，革命，和饑荒，使他們

的生活出了常規，隨後是女人的覺悟，知道屈服在一個可恨的丈夫的殘暴下不再是必需的了。到法庭控告丈夫的農婦，一天比一天多，農人不敢再把妻撻到氣息慄慄的地步，因為每一村都有婦女部的代表，指導農家婦女怎樣能得救濟和離婚。

(註一) 假如結婚發生問題的時候，已經生過一個小孩，或者妻已經有了孕，依然維持原案不動。

(註二) 此項條文限於保持夫婦關係至最後一刻的妻。離了婚的妻祇有在依賴幫助的時候可以有效。由偶然的關係生育的兒童，可以承受遺產的一份，但是做母親的不能承受。

第七章 結婚法之製定

蘇維埃政府的創建者大致都承認結婚制度在將來是會同國家一齊消滅的，不過他們彼此同意至少在過渡時期保持結婚制度的形式是比較好的。但是同時有二十萬的青年男女決定放棄註冊的利益。其中有許多結合照舊具有正式註冊結婚的一切形態和結果。

當這種情形因了死亡或離異引起法庭的注意的時候，就要由常識來判斷，按照註冊結婚的條件給與法律的權利，雖然結婚法上並沒有這樣的條文。

在別的幾方面也證明法律是不適用的。當法律公布的時候，財產和金錢本是無關重要的，自然要規定結婚不能造成共同的財產，因為新法主要的目的是要毀掉舊法一切的殘餘。因為新經濟政策下，商業的再興，和錢幣的恢復，婦人在家中幫助男人在外面活動的工作，離婚時常是一點也得不到補償。因為丈夫可以巧妙地說，全部財產都是他們共同努力得來的。禁止繼養的條文也是不能實行的，因為國家沒有力量贍養到處漂泊的整千整萬的孤兒，他們當中有許多為需要助手的農人或別的人們招致了去，事實上就是繼養了。錯誤的條款有的由法院在判案時改正，有的由特別法令來改正。因為這是一種很笨很混亂的方法，於是司法部的委員製就一種新法典送交一九二五年十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改革是事實結婚的認可，和夫妻共有結婚期內積蓄下來的財產，和農家個人無力給妻（不論註冊與否）阿林門塔時得由全體家人負責償還。

但是這樣一種坦白的對於事實的承認，代表們還不能充分地了解。他們說，這樣一來，最隨便的關係也可以得到法律的承認了！有學問的老布爾塞維克黨員和不識字的農夫雜在一起嚷着要廢止這種『對於離婚和墮落的承認』。農人們對於一人犯罪全家承當的意見特別着慌，並且聲稱這樣一種法律定要殃及許多農家。有一個農民代表說，『如果有三個兄弟，其中一個要給阿林門塔，你就要我們把牛割成碎片嗎？』一點鐘一點鐘地爭論下去，反對派請求到下一年再定議，而司法委員克爾斯基（Kuznetsov）和助手克里林珂（Krylenko），柏蘭登堡斯基訴稱不能使十萬女人沒有保障，並且主張即刻決定。後來共和國的農民主席加列寧（Kalinin）很機警地動議，每一種法律最好是服從大眾的意見。像這樣在人民生活上有重大關係的法律尤其應當如此了。在這種情形下，農民既沒有得着充分的考慮，婦女機關也沒有發表確定的意見——也許是太早一點了。於是決定『在原則上』接受新法律的草案，保留在下一大會中通過。

提出的新法傳遍全國。報紙雜誌全幅的登載。俄國各地書店的窗子間放着整百本的小

冊子，載有全份的新草案以及雙方的辯論。新法的贊助者，爲要準備最後一次的爭論，從事證明未註冊結婚之可違重的地方。Gosizdat（政府印刷局）印出一種小冊子來，售價八個戈比，用簡明的文字向俄國民衆解釋新結婚法。書面上畫着一雙愉快的農家配偶，同着三個整潔快樂的小孩，小孩們飛跑着來傳遞這個標語『去認你自己的家——離克穆林宮三十五分鐘。』

『現下可以容易而且簡單地結婚了，』小冊子裏面寫道，『不用教堂的人物，不用他們的祝福。這些自由的結婚是同心相好的工作的印記。愛情，共同的工作，所愛的兒女——是目前蘇維埃俄羅斯結合人們在一起的一些條件。如果沒有愛情或同居的願望，離婚和結婚一樣簡單而且容易。如果但要兒童不受苦，蘇維埃法律所注重的就是這一點。』

『不論男女是否在某地舉行過結婚的註冊，或逕決定同居未請求祭司或官廳的許可，其間是沒有分別的。祇要男女雙方把他們的結合看做結婚，不看做苟合，這就夠了。如果一個男人從良心上待遇一個女人做他的妻，這就足以稱爲正當的結婚了。當他們同居

在一處，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這就足以表明他們是夫婦了。他們不須要證明什麼。一切都是很清楚的。

『不過要使一切人都知道結婚的情形，平常是不十分容易的。有的時候沒有機會來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共同在一個地方居住，一雙配偶必得暫時離開。例如，一個青年的紅軍兵士許要喜歡人人知道某一個可愛的女人是他的妻。這樣是註冊好一點，因此就利用不着做任何說明。法律證明一切，使得妻舒適了，孩子們也舒適了。兩者在法律前面都得到保障。這就是我們註冊的理由。』

在印刷品的流行以外，據官方報告，單是鄉村就有六千聚會，以及其他無數的演講，辯論和討論。世界史上，與人民相關的法律很少這樣廣泛的由人民來討論。一月十三日克利林珂在婦女部中為新法草案辯護道：

『我們並未想到有這樣的爭論。原定法律的主要目的在於反抗教堂的結婚。當法律製成的時候，祇有一個人反對註冊。……但是我們並不相信，在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經濟

平等的狀況下，註冊還要成爲必需的。我們現在保存它作某一種東西的工具，並不以爲它自身有什麼重要。但是有人說，當下還沒有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我們的計畫完全是空想——在現下罪惡的世界，我們的草案結果會淪爲離婚和墮落，會毀壞結婚和家庭的根株等等。讓我們觀察一下本問題的真相。現在一個男人可以有一個家庭，兩個家庭，以至三個家庭——但是僅僅負擔註冊結婚的那一個家庭的費用！第二個和第三個的妻竟是一無所得……按着我們的計畫他必須供養三個……從我們的問題和一般政策的觀點上看來（爲一個強固的家庭和一種永久的美滿的結婚關係奮鬥）就如從保護結合中的弱者（社會的和經濟的）的觀點上看來一樣，新法律比舊法律所給與的多着許多。」

討論中對於新計畫雖表示很多的不滿意，同時對於改革的要求則表示一致。不滿意的程度的差別，從最守舊的農人和最守舊的共產黨員到郭倫泰，前者不特主張要使註冊負責，還要限制離婚的自由，後者則主張完全取消註冊和經濟的擔負。她（郭倫泰）提議結婚可以用一種契約來成立，未來的伴侶藉着這種契約規定相互的經濟利益和彼此間以

及對於兒女的義務，爲要泯滅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妻的界線，不應當有結婚的註冊，祇應當有兒童的註冊……她計算俄國每年產生的五百多萬嬰孩，大約有一百萬需要救濟。她說，現在除了 Repmen 以外，很少人可以清付阿林門塔，所以全體成年人應當每年納兩個盧布的稅，就可以供給託兒所和產婦院等一切費用。有些郭倫泰的信徒甚至鼓吹一切待賑的兒童都要離開父母送入兒童院去，未婚的和沒有兒女的人都要納一種特別稅。但是她的建議爲許多反對者所打消，以爲是一種不能實行的空想計畫，因爲農民永遠不肯爲城市的兒童納一種額外稅，而且，無論如何，這種款項也不能照顧嬰孩到一歲以上。

提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草案，和前一年的沒有多大改變，但是因爲普遍宣傳的結果，比先前得着格外有力的贊助。草案開頭說道：『結婚註冊的設立，目的在易於保障個人的和財產的權利，以及妻和子女的利益……註冊是結婚存在的確鑿證據』。同時，這種保障也推及於不註冊的結合，不註冊結婚的存在成了重婚的一層障礙，後來因爲審查一切法律的 Sovnarkom（人民委員會）的堅持，於是增多了一條，載

明關於未註冊的結合的案件，法庭所要證明的結婚實情如下：同居的事實；共同家庭的現狀；用個人的通告或其他文件在第三者前的宣布，證明結婚是實際存在的；同時也要依據環境，和相互的給養，和兒童的訓練等等。草案中以結婚期內積聚的財產歸夫妻共有的條文，爲要應付農人的反對，修正做在控告農家某一個人的時候，女人所要求的阿林門塔的數目祇限於被告一人的部分，用錢財或農產物來清付，無論如何不能強分田地，牲畜，或工具。關於贍養離婚同妻的責任，失業的限期六個月，無能力贍養自己的限期一年。這種計畫把離婚弄得更爲簡單，因爲准許在註冊局裏面解決一切離婚案件，即使有一方面不同意，法庭的干涉也祇限於在劃分財產或養育兒童問題得不到相當解決的時候。否認做父親的期間從兩個禮拜延期到一年。新法律也規定下，如果有幾個候補的父親，法庭必須從中間選出一個來，因爲倘使把一個合股公司的所有者來代替父親的地位，會使那個孩子太難爲情，他的同伴會嚷道『這裏有一個伊凡諾夫公司的兒子』。草案中照舊規定結婚的年齡爲十六歲和十八歲，但取消原法律特別情形下准許早六個月結婚的一節。法律中並

加進一條命令，要新郎新婦簽具證書，彼此說明他們的健康情形，尤其關於花柳，神經或結核等病，以及先前的結婚（註冊的或未註冊的）和子女的數目（註一）。草案更把家庭的責任擴大，在需要而且可能的時候，兄弟姊妹和祖孫間的贍養都包括在內。贍養是許可了。當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新法決定施行會議的時候，我得身與其間，會場是克穆林宮沙皇的宮庭，一個以孔雀石為柱，以水晶為燈，金碧輝煌的廳堂。坐在舖着黯紅色（滿廳都是這樣顏色）的長桌邊的代表中，有許多是女人。一個有溫和面孔的健壯農婦，頭上圍着淺色的 *patok*（肩巾），腳上穿着一雙靚靴，莊重的大方的走向主席團的坐位。

大多數代表是真正俄羅斯族，但是雜在他們中間的是蘇俄聯邦的自治區與共和國的代表——韃靼人，巴士克人，啟耳基茲人，以及許多說不出名字的荒原上半遊牧種族——有的人所代表的地方，還存留着多妻和初蓄婦女的制度。在一九一八年舊法典的原則上，未合成蘇俄聯邦以前各地結婚法實際上是一致的，祇有回教依然興盛的地方要有特別的條文。但是蘇聯形成以後，擴大各地自主的承認，聯邦中有些部分已經行使它們自己的

法典。白俄羅斯祇承認註冊的結婚，而烏克蘭不僅准許一方面單獨進行離婚，並且准許一方面單獨的來註冊結婚，後一個的否認限期為一個月，這正合老俄國的諺語『當我不在的時候，他們同我結婚，而我却在高塔裏邊。』

有幾個代表抱怨說，不能旅行烏克蘭去冒這樣的險——回來以後不知不覺已同別個結了婚——乃是一種羞辱。到了必須讓步的時候，大家同意最好是將蘇俄聯邦的根本法律條文應用到蘇聯去。

在介紹新結婚法修改草案時，克爾斯基解釋道，註冊所以被認做結婚的良好方式，因為它在法律手續上為法庭構成不可爭辯的證據。『但是終歸有這樣一個時候，』他說道，『我十分相信我們將使事實的結婚和註冊的結婚在一切方面都平等，或竟把後者完全取消。那時的註冊是僅就事實做統計的紀錄，因為紀錄常是需要的。同時，由結婚發生的一切權利的適當性可以用註冊做最好的證據，因為現在保障不註冊的結婚的計畫祇限於財產關係和贍養問題』（註三）。

克爾斯基把他所接到的全國法律討論報告作了一個結論。以阿詹吉爾斯基 (Archangelsk) 省爲落後農民區域的代表，他說該省每一鄉村都考慮過這個問題，有百分之四十贊成全部新法律，百分之六十反對其中相當的段落，至於城市的人民則極表同意。農民所以表示不滿，大部分以爲事實結婚的承認，要增加不道德並分裂（從經濟方面說）許多農場。有些農民提議，離婚應有相當的理由，離婚的數目要限制到三個或四個以至七個，其他的人則主張離婚後兩年或三年以內不准再婚。有一些農民大會以爲如果不註冊的妻沒有財產權，就贊成承認不註冊結婚的主張。城市中所發的反對論調是屬於另一種性質的。有的根據優生學的理由來反對，以爲承認事實的結婚會減少註冊結婚的數目，因此國家難以執行關於年齡和健康的法律條文。別的人恐怕教堂結婚會因此復活，因爲在教堂結婚的配偶可以滿足法庭所規定的一切結婚證據，並且可以請求法律的保障。城市和鄉村間意見的紛歧，同樣發現在老年人和青年人中間，農民大會所發表的反對法律草案的意見書，附帶着來的是青年人贊成它的決議案。

爲要答辯這些反對，克爾斯基提出來說：對於增加不道德的憂慮，僅祇註冊結婚的存在也無法限制那些願意不註冊結婚的人，並且由莫斯科法庭所調查出來的不註冊結婚的三百起阿林門塔案件，久遠的結合佔百分之三十六，臨時的關係祇佔百分之四。他答辯說，結婚法並不鼓勵多夫多妻制，因爲把經濟的責任加在每一層關係上，反供給穩固的一夫一妻制一種工具。

關於離婚的數目，他以爲並沒有什麼可驚的理由，因爲平均起來，一萬人中每年祇有十一起離婚案，比那些離婚不自由的國家反是少的。他又覺得並沒有給教堂留地步的危險，因爲自從一九一三年起，俄國每萬人中有八十一一起教堂結婚，在一九二五年，每萬人中有一百起註冊結婚，表明後一種方式在人民生活中已經成了一種確定的組織。

隨着來的爭論同過去一年一樣劇烈。克利林珂站起來請求取消人民委員會主張獎勵固定關係的『結婚證據』，因爲製定草案的人曾經下了一整年的功夫來研究結婚的定義，但是沒有得到結論，因此才決定最好由法庭來裁奪，有一些代表對他表示同意，但是大

家的意見以爲法律上要有相當的保證，僅祇具有相當程度固定性質的結婚才可以要求法律的保護，於是這個定義算成立。

共產黨員利亞散挪夫 (Rizanov) 攻擊事實結婚的承認。『我們聽說，』他說，『這一個草案，在接近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意義上，是前進一步的，在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裏邊，大體說來，結婚關係將不屈服於任何義務的律例。……我敢說一句，在這些共產黨的宣言裏面連一點共產主義都沒有。當我們走進共產主義的社會一切儀式，一切壓迫都消失了，於是我們要問一問自己，同志們，結婚是否止是兩個兩條腿的動物私人的關係，祇能使他們自己感到興趣，在這種關係中，脫離了一切武力的社會並沒有權來過問？我們還要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十年上，以人民委員會的名義，怎麼能有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草案來要我們忍受？……我們應當教導我們的青年 Comsomols，結婚不是一種個人的行動，乃是一種具有很深的社會意義的行動，要受社會的干預和制裁。他們必須曉得這是在社會的眼光中認可的一種相當的方式。……這種法律是祇能產生 *Disputes* (糾紛)』

的！

這一番話雖有人鼓掌歡迎，却大為後來的言論所揶揄。有一個農婦很嚴峻的說，利亞散挪夫同志的觀點是不能加以嚴重注意的，因為他的調子是唱出來了，他自己是既不需要註冊結婚也不需要事實結婚。

有一個從達革斯坦 (Dagestan) 來的黑色代表，名為撒姆爾斯基 (Samur ki)，腰間插着一把短刀，站起來說，這種法律雖然可以通行俄羅斯其他各地，但是在達革斯坦就要加以十分小心的研究，因為在那裏去年有十個女孩子因為不得父兄的同意就要結婚都被刺殺了。

『不註冊結婚祇是一種墮落的方式，我們要明白的說，祇有註冊結婚才是結婚——別的都是罪惡，應當加以相當處罰。你說你反對多夫多妻制，但是你却要間接地把它援引進來……至少謨罕默德的法典是真實的……』(『羞辱呵！克利林珂插嘴說)『我是里色的。要我紅臉是很難的。』從達革斯坦來的那位先生繼續往下說，『為要使家庭生活穩定，

妻應當用丈夫的姓。……我反對法律上「妻不應當隨從丈夫」的條文。設使丈夫要被指派出外一年，那末怎麼好呢？如果妻不願意隨從她的丈夫，讓她向他離婚罷！」

「如果妻要被指派出外一年呢？」第二個人問道。

當時穆愛露娃 (Moirova) 一個女代表說：

「同志們，我一定是一個直率的人。當我頭一次讀這個草案的時候，我就很憤激，以為在革命的第十年上，兩性平等是早經規定了的，還在我們法律中容有這樣一條。這一條是不是真正要緊的，我想，為什麼說油是油質的呢？……然而彷彿是我錯了。在我們當中彷彿還有這樣的人，以為丈夫無論到那一處，妻總當隨從着他。同志們，這是太過了！」

大部分的討論都是向男人攻擊，因為他們拋棄妻子，逃避阿林門塔，夏天妻幫助耕田，到了秋天就同她離婚——事實上，新法律整個的辯論在於保護兩性中無告的弱者。

最後，多娃利摩蒂 (Tovarish Molish) 從西伯利亞來的一個高大而且多鬚的農夫，按納不住了：

『各方面都是男人不好！』他突然說。『但是家庭破裂常是女人的錯……她看見丈夫漸漸的老了。年青的人帶着歌曲和手風琴來了。她就離開丈夫和三四個孩子，同着年青的人走了。大體說來，在這個年頭，女人幹着許多壞事呢。她們常常跑到婦女部去誹謗丈夫。整個的婦女委員會聯成一氣，做丈夫的一點也不知道——於是他就受辱了！』

這些批評使得別的幾個代表膽子壯了起來，也敢抱怨法律完全偏向女人方面。他們說，這是不公平的——他們於是說出一些承受阿林門塔的女人因為要得到阿林門塔特地去引誘那些薪水較高的工人的事實。

就是那些堅持男人是最壞的罪人的女人，也認可女人的行為也不常是正常的。有一個農婦代表主張，為要防止女人陷入不良的關係，即使未註冊結婚的子女也不應當受父親的養育。別一個女人反過來激烈地說——『這會成爲農工婦女一種難堪的污辱！我們所有的井和塘就都要充滿無辜的嬰孩的屍體了。』

女人大致都主張保護不註冊的結婚，全國各地的婦女組織送來同樣的決議案。

內務委員貝露伯羅多夫 (Beloborodov) 提出下列的事實反對現存法律和草案的許多怨言，都是根據了這種變態的情形，因為戰爭和革命使得兩性比例數的關係失了平衡。他說，一九二零年的戶口調查證明俄國婦女的數目比男人的數目多過四百萬。據一九二零年的調查，一九二七年人口的比例數，從二十七歲到三十六歲，男人佔百分之三十三，女人佔百分之六十七；從三十七歲到四十六歲，男人佔百分之四十三，女人佔百分之五十七。這種情形，加上城市人口的增多，和社會標準的改變，於是引起當下的狀況，等到下一代人長成，在他們中間沒有這種不平衡的比例，情形就許要完全改變了。

有許多人反對女子在十六歲結婚的條文。因為，第一，早婚對於兩性的教育有極大的障礙，而在十七歲上做母親的農婦尤多困難，因為她們同時要繼續夏季的田間工作和冬季的紡織工作，使得她們還未達到生理的完全發育就成了老婦人了。因為這種反對，女人的結婚年齡，和男人一樣，增到十八歲。

討論繼續了一整晚和第二天的一天。當把問題付最後表決的時候，提出的草案以代表

人數百分之七十五的贊成通過，並提交一個由三十四人組織的委員會（內中有十一個女委員）依據討論的原則從事末次的修正。修正終結在要點上沒有多大變更。關於婦女和兒童以及社會的利益，着重在註冊的任務，關於未註冊的結合有否充分的穩定性以給與任何法律效力，保留下『結婚證據』做法庭的指導。

法律就這樣製定了。我所以用許多篇幅來敘述這一件事是由於它的新奇：一個整個的國家和它所選出的代表，對於實際的情形用了這樣十足的真切和坦白，來為它的結婚糾紛謀解決。最痛快的地方是他們那種不顧的精神，即使對於山他們自己創製的習慣和成規以及他們有否認任何最後決議的精神，大概他們要隨着境遇的變遷一次一次的修正他們的結婚法。

青年人和老年人的觀點是懸殊的，漂亮的城市工人和質樸的農民大眾的觀點也是懸殊的，要想為他們和解釋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但是鄉村各地對於這最後通過的法律並不像感到很大的紛擾。在從莫斯科大會回到馬斯羅夫結特的火車上，有幾個老農對於現

代這種『狗的婚禮』頻頻搖頭。在角落裏有一個青年女子在痛哭。她的故事就從哭泣中述說出來。她的父親，一個窮農，曾經受下一個有錢的老枯拉克的十桶酒做她的身價。父親到伊凡 (Ivan)，她的愛人，那裏商量過，如果他可以不要她，就給還他三桶酒。伊凡不肯要酒。但是父親說，無論如何她得同那個枯拉克結婚。有兩三個青年的農人圍着她，並且立即談起話來。

『你是多麼笨，你不曉得法律嗎？』——『沒有註冊的證書，祭司不肯爲你們行婚禮，你若不願意結婚，他們是不肯爲你註冊的。』——『祇要把這些事情告訴他們，看會有什麼

』——『而且你也太年青了——無論如何，他們不會許你結婚的……』

『但是我的父親要打我呀！』

『那末，你就可以讓你父親被逮捕！到婦女部那裏去，她們會教給你辦法。假如你願意和伊凡在一起，那是沒有人可以阻止你的……』

在馬斯羅夫結特四旬齋前的兩個結婚的月裏，有三十五對青年配偶首先到蘇維埃去

註冊，然後走過街區到禮拜堂去行禮，跳舞，和唱歌。另有五對註過冊而取消「教堂的儀式」。又有兩對也不到教堂，也不到蘇維埃，逕行成立起家庭來。有過一次離婚。一個青年女子爲了七個盧布被父親出賣，她的未婚夫常吃許多 Samagodka (家釀的酒)。那個女孩子不滿意父親的選擇，她的未婚夫說，如果她能交還他那七個盧布，他就可以解放她。但是她沒有法子籌得七個盧布，她的父親恫嚇她要她服從。幾天以後，她聽人說及新法律，就從泥濘的路上走到別一村市的鎮總部去，於是得到離婚。

(註一)司法部原主張要有一個醫生的證書，等到問及這一點的時候，Narkomdrav (衛生部) 回答說，即使這一項規定是適當的，也無法執行，因爲有許多鄉村還沒有醫生。

(註二)烏克蘭結婚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上載着說：

「未經註冊而發生密切關係的人們，可以呈驗一種雙方簽字的願書，把他們的關係當作結婚來註冊，因此註冊可以按照本法典前列各款規定舉行。倘若

祇有一方呈遞此項願書，同時指明對方爲某人，既無對方承認的表示，當地註冊局須在三日內通告被指做夫或妻之人，限令自該項通告公布後一月內報告註冊人員是否承認此種願書。」

（註三）這樣辦法，一個不註冊的妻可以享有一個工人的政治權利，但不屬於給予主婦此項權利的條文。

第八章 革命的道德

到此爲止，我們已經敘說過成文的法律，外表的形式。我們已經見到由戰爭和饑荒的恐怖年代造成的混亂，由革命規定的改變，由環境造成的新方式。什麼是男女生活的關係，和新的輿論，和青年人的態度？有什麼新道德律發展出來？共產主義者所遵行的是什麼樣的道德？

共產主義者一起頭就假定沒有一成不變的道德真理，祇有社會上的每一階級製造它自己的行爲標準。這是他們的道德和別個的道德主要的差別，當你考慮到那些依據此種

標準發展出來的行爲律的時候，在他們根本的贊成和反對中間，以及多年來統轄人類行爲的法則中間，有一種奇異的相同的地方。他們對於這些道德律的應用乃是另一問題。對於下面的事實，他們絕不受牽制：在態度上應用一種不同的標準來對待自己階級以外的人們。他們不要說，『尊重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並且在每天的生活裏面都違背這一句教訓。他們要說，『尊重你的父母，如果他們是好革命黨人——如果不是，就要教導他們。』

關於管理個人生活的規律，要從社會的觀點上來考慮。共產主義者的哲學不先注重個人的行爲。是要從整個的社會觀點出發，並非現存的社會，乃是正在建設的社會。新社會的任何妨害都是錯誤。任何貢獻都是對的。列寧所下共產主義者的道德的定義是『聯合工人反對各種榨取方式並提高人類社會標準的一切行爲。』

在將來這個循環會不會因經驗而轉到個人方面，（因為經驗會證明凡是於個人有害的一定害及全體，因為它妨碍了個人與全體相關的作用）這樣一個問題，是要留待將來解決的。但是對於下列的事實有了相當的認識和社會的建立必須藉助於更圓滿的發展

的個人。

在革命時期，革命自身創造出行為的法則來。至若此種行為或彼種行為會於將來的社會比較有益是沒有時間來考慮的。各種情形都需要迅速的判斷和積極的行動。在那些日子穩健的和年老的共產黨員，對於兩性和愛情的一切事件，都保持一種固執的態度。無論如何也沒有時間顧及愛之精緻的方面。個人要求的滿足祇是草率了事，好像一個人在櫃台上匆匆地喝一杯咖啡。

現在穩定的期間已經到了，他們判斷行為的標準能夠超過革命中一時的方便所應用的原則。雖然是同樣的，不過當下要涉及社會之代那模的發展，不限於一天或一點鐘以內的事情。這就可以型成一種確定的法則，行為的特別規律。像這樣一種法則，既要依據健全的實際的標準，又不忽略將來的革命的理想，在製定的時候已經遇到好幾種困難。第一，上述的忽略態度難以免除。第二，因為饑荒，疾病，工作過度，和劇烈的改革，使得許多青年的生理和心理都失了常態。第三，此間繁殖着先前開放過的一些理想的學說。末了，一部分因為

要抵制上面的一切，於是生出一種極端節欲主義的態度來，所有的表現依舊是變態的行爲，甚至要摒除生活上一切愉快的方面，遊戲，唱歌，跳舞都在禁絕之例，並且主張把所允許的有限的娛樂也鑄成政治的形態。

假如一切年長的人們，多年來從事地下工作和先期戰鬪，在革命後的建設工作上有點發狂，那末，青年人們之失掉平衡也是當然的了。當他們正在上課的時候，國內戰爭爆發了。革命和內戰的破壞期接着是軍事共產主義的殉難期，當時殘存的物質幸福爲大家均分了。在那些日子無論他們會感受何等的痛苦，可是隨後的生命從未給與任何同等興奮的東西。聚會以及政治的和社會的活動開始充滿了他們的時間。用了政治的書本來餵養他們那疲乏的青年的頭腦。他們在各方面爲各種新奇的理想所封鎖。隨後新經濟政策來了，具有新的撩人的誘惑。對於這種種混亂的形式，當然是青年人惶惑和成年人狼狽了。

布哈林在第五次 Comsomol 大會講演時說過這樣一些影響。第一，他解釋道，有一班人把革命以前的需要，或革命自身的部分做成一種機械的禮儀。革命前的一些革命舉動現

下當作習慣保存在這些人的法典中。假如革命前在某一地方禁止過吸煙，有些青年人就以爲每個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和 *Comsomol* 在參加會議的時候，都要口銜着四根香煙，藐視一切禁煙禁酒的宣傳。如果從前資產階級的舉動是漂亮的，他們就主張無產階級要比從前更爲粗暴，入屋從不脫帽，並且在地板上吐痰。真正革命者定要穿破爛污穢衣服，因爲清潔是資產階級的習慣，在一切事情上越和資產階級的習慣相反，他的革命精神就越大。這種思想大祇應用在行爲方面，還要應用到戀愛方面。因爲在鬥爭的狂熱中沒有功夫求愛，在那些日子真正革命的愛人不能願慮求婚的技巧，祇能立即講到本題上去，凡是反對粗陋的言詞和笨重的行動的女子，人家就斥責她沒有除掉資產階級的偏見。

郭倫泰，在她的小說『三代的愛』裏面，爲這種態度辯護——限於不太趨極端的方式。第一個故事是瑪麗斯特盤諾夫娜 (*Maria Stepanovna*) 的戀愛史，因爲愛上了另一個男人，離開了她的丈夫（沙皇軍隊的校官），受了許多大衆的誹謗，結果她的愛幻滅了，於是決定用一生的光陰去組織各省巡迴文庫。她的女兒阿爾加塞爾治依夫娜 (*Olga Sergeevna*)

後，就從放逐中回到聖彼得堡藏在M工程師家中做女管家。在他們當中，雖有政治思想上的隔絕，居然生出一種難忍的熱情的依戀。雖然她並非不愛她的丈夫。按照母親的成規她要捨棄丈夫而就愛人，但是阿爾加，徘徊於兩者之間，後來終於回到丈夫那邊去，雖然當時產生了一個工程師的女兒，他依然願意她回來。過了許多年，在革命終止以後，她和她的女兒堅尼亞（Gonia）同一個年青的同志安得利（Andrey）住在一間屋子裏邊，她已經和他發生了戀愛。因為工作的關係要她遠離家庭，她勉勵安得利和堅尼亞兩人要好。一天晚上她回到家裏來，看見他們兩個正在擁抱着，她於是很灰心的跑到郭倫泰那裏求救。並不是擁抱的事實使她苦惱，祇因為他們未曾告訴她一點什麼，他們沒有關心她的痛苦——並且在他們中間簡直沒有真的愛情。堅尼亞是懷了孕，但是她不曉得是安得利的或是別一個同志的。堅尼亞自己怎樣說呢？堅尼亞，高大，溫文，而且清爽，長着一雙黑色的圓眼睛，已經是一個『負責的黨中同志』，應郭倫泰的請求到她那裏去。

『你驚異我沒有等到發生愛情便和男人同住嗎？……我已經讀過許多小說，曉得發生愛情要費多少時間和力量。……不過那是過去的了，我們那裏有閒功夫呢？常常是匆遽的——常有別的事情佔據我們的思想。倘若你愛上一個人，他奉命到前綫去了，或到別一個城市去了——或者因為太忙你就忘記了——何妨從事幾分鐘的撫愛，使兩個人都得一點點幸福呢？』

『我為什麼不告訴母親呢？我不要令她難受。如果我們真是彼此相愛過，那也許就不同了。不過我並沒有從她取去什麼。我所不明白的是她為什麼不注意在興趣和年齡方面他都同我接近，他同我分享一切東西——而祇注意他吻我的時候……當她自己得不到時間吻他的時候。母親是為變態的和道德的思想所苦，並不曉得在我這樣年齡的真的愛情。但是我以為我的方法是比較好的而且比較簡單的——沒有嫉妬，沒有痛苦。我不要像她一樣的用愛。倘是那樣，我還有時候工作麼？』

當她離開的時候，郭倫泰自己問自己說，『誰是對的——新的階級，有着新的感覺，新的

見解，新的觀點。』而摩尼亞的聲音從走廊中傳過來，『趕快呀，同志們——我們要遲到會議了——有許多工作要做——太多了，』——我們知道郭倫泰是站在摩尼亞一邊的。

但是所有青年人都不是摩尼亞。這種哲學當然免不了被許多人所憑藉和曲解，作為墮落的一種的藉口。郭倫泰自己也不將它視為任何永久的解決。她祇是說，在極端恐怖時代這種態度是需要的，因為在那種時候，『把一個奮鬥着的集體的道德力，浪費在不直接與革命有利的經驗方面，乃是不合理的。當那個時期既已過去，以後的光陰是要『追求雙翅的愛神』經驗愛情的甘苦，並且鼓蕩一切的情感——至少是具有社會價值的那些種情感。』

斯烏爾羅夫大學 (Sverdlov University) 的沙爾凱 (Zaikind) 教授是與郭倫泰極端相反的，並且用他大部分的時光來排斥她的教訓。現在蘇聯的工業化的政策，要注重機器（生產的工具）的製造，不注重直接消費物品的製造。沙爾凱教授也要把性的問題工業化。他相信，性對於無產階級應有的效用，祇在於它能生產一個強有力的階級，以從事他們

將來的奮鬥。據沙爾凱教授的意見，以爲『性吸引的對象倘是不道德的不光彩的，就如一個階級的仇敵，那末，那種卑劣的程度，就彷彿人和鱷魚或猩猩發生性吸引一樣。』他既承認性是相當愉快和娛樂的源頭，他覺得工人階級應當『從全體同志一切娛樂的總和中來研究這種娛樂，決定它的利害意義的程度，並且沿着最利於革命的路線來規定它的用途。』他的十二條誠命是這樣：

(1) 在無產階級中間不應有過早的性生活的發展。

(2) 結婚以前要完全節慾，祇有在社會學的和生理學的圓滿成熟的狀況下才可以結婚。

(3) 祇有在計畫一種長久共同生活的人們中間，以及每一方面都適合於共同創造工作的人們中間，才可以結婚。

(4) 性行爲祇是對戀愛對象所起的深厚的同情和依戀之完成。

(5) 性行爲不應當太頻。

(6) 愛情必須專一，寧當固執不常轉變。堅尼亞的哲學是一種病徵，不是一種階級理想。

(7) 在每一次的性行爲中，必須記着有生育小孩的可能性（註一）。節育和墮胎都是有

害的。

(8) 在愛的關係裏面，必不可以含有賣俏，獻媚，和玩弄的成分，以及特別的性略取的別種方法。

(9) 性的選擇必須順着於革命有利的路線。肉體的吸引祇是一種蠻性的遺留；必須把階級的值價，和革命的共產主義者的純優生問題，藉着下一代人來洗淨人類的污點，做爲選擇愛人的唯一考慮點。

(10) 嫉妬是必不可以有的。……假如被一個比你壞的人篡奪了去，要把你的優點證明出來，假如是比你好的人，那就應當退讓。

(11) 必不可以有性的顛倒。

(12) 性必須完全爲階級的助力，一點不能有所妨害，處處都要有所裨益。

沙爾凱教授既承認，像這樣完全的『性標準』，倘使拿來隨便執行一下，即刻就會發生悲慘的結果，可是他相信他所主張的是依據當下實際可能性的折衷政策。不過，像這一種武斷哲學同郭倫泰的剛剛是同樣的失當和曲解，並且剛剛同樣滿具空想的言詞。

舉例說，拍爾姆 (Perm) Comsomol 委員會裏邊有一些熱心的青年道學家，決定晚上派偵探去捉那些在河邊橈子上交頸而眠的 Comsomol 男女孩子，用口袋套在他們頭上，使他們不能逃走，隨即把他們帶到 Comsomol 來受社會的懲罰和同志的勸導。有一天晚上，Coms mol 委員會的書記，主張此種辦法最力的人，也裝進口袋裏邊去。當他們發現了他是個什麼人，捕他的人們就想把他釋放，但是他慷慨地主張，不能因為職位的關係，在待遇上有所差異。他在大衆面前承認他的罪過，請求饒恕，把這種過失諉之於他的年青，並且要加倍努力來弋獲其他的人。

這種行動之受人嘲笑同與此相反的放縱之受人責難是一樣的嚴刻。庫斯敏 (Kuzmin)，Comsomol-ki Pravda (共產青年團真理報) 的編輯，用許多篇幅來登載本題這一方面

的議論。在一篇標題爲『少年老成』的社論裏面，他說，他接到了一封信，上面寫着『生活的新途徑』。下面是那位匿名者主張廢止握手的理論，他說握手是資產階級的一種發明，特意用來在工人和農人中間傳播疾病的。有一些勞働階級的領袖繫着領帶，這是一種極壞的行爲，是 Comsomol 所不能容許的。漂亮衣服應當摒棄做資產階級的偏好，一切女孩子都應當穿皮的短衫和長靴。愛情要除掉一切情感，認出它的本來面目——祇是肉的結合。聽過乾燥無味的報告以後，那些不耐沈悶而開始吹噓的 Comsomols 最好加入孟雪維克或社會革命黨。縱情於小資產階級的跳舞習慣的任何人，都應當和莠草一樣擲出 Comsomol 的隊伍。

庫斯敏認定這封信是彭明較著的，於是把它載入社論欄裏面，在篇末加以短短的諷刺的評註。過了不久他接到一封令他吃驚的信，信中通知他說，『十月革命』工廠的某同志奉命做一個『生活新途徑』的報告，他就用上而那一封信作根據，再把它發揮了一下，報告上去。有幾個同志不同意這種見解，講演者就向他門搖着一份 Comsomol-ki Pravda 說，

中央委員會定贊成他的主張的，於是他們不再作聲。庫斯敏同志說，『這簡直像一件奇聞，然而這是實際生活的一段。當我接到一些贊助原信作者的觀點的信件的時候，真使我毛髮聳然！來信中有一個作者這樣主張，愛情和共產主義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我恐怕這位青年朋友剛把生命從門間趕出去，它就從窗子裏邊飛進來了。』Comsomols 是在受苦，『庫斯敏總結起來說。』『有一千種勢力在他們身上印它們的印記。他們正在從一切矛盾勢力中找尋一條出路。新的需要，思想和欲望方在產生。舊的是毀壞了，而新的還未創造出來……青年 Comsomol 沒有舒暢的時候，祇有飲酒。假如一個女孩子反對在她床上揩污穢的鞋子，或者在晚上換去她的套衣，他們就把這種見解稱做小資產階級的……但是，倘若我們的 Comsomol 一面做着嚴重的工作，一面自己照顧自己，穿得乾乾淨淨地，漂漂亮亮地，甚至於說，繫上領帶，如果願意的話——卸除過多的額外工作，平均分配在全組人員身上——並且，在鄉村，倘若青年們閒暇的時候來跳舞和奏樂，究竟有什麼可怕處呢？』

在老年和青年中間，比較持平的領袖，對於上面說過的兩種極端，都十分關心。同我接談

的，有多年從事地下工作，革命和內戰，並且當下在黨內佔重要位置的老共產黨員；在工廠，大學，中學，以及火車中，會議中偶然遇到的青年人，我發覺他們都用一種非常坦白的態度來應付他們生活中的事實，十分勇敢地尋求一個解決。他們一切缺點都毫不假借的公開；又在著述許多論文和書籍。這些問題已經是非常的尖銳化，約在一年以前，共產黨監理委員會（註二）在執行會議裏面提出黨德問題。許多入黨的新黨員，舊價值是毀棄了，但還沒有重新估定，正從日常生活中尋求行爲的指導。因此監理委員會覺得這時應當刊行相當『指導方法』並且應當在道德問題上創立一種新輿論。

自此以後，黨中領袖曾經加意定下相當行爲規律來指示青年們。Комсомо́л 和黨的報紙，雜誌都用許多篇幅來登載各種討論以及道德和 But 的問題的論文。But 這個字的原義是『生存』，但是普通用法却是『某一社會階級生存在某一時代的物質的和文明條件的總和』或者簡單一點說，就是『生活的途徑』。有許多青年人寫信給年長的人們請求指導，年長的人們所給的指導常是同前代人所給的一樣的不費力。最近官辦

Comsol 印刷所把這些論文集印成一本完備的專集，題名爲 Comsol Bilt。這本書的內容是值得注意的，因爲在俄國這是第一次刊行這一類的書籍，除了幾本小冊子是例外。

書中載有一九二零年列寧和克賴拉賽特堅 (Clara Zetki) 的談話——普通看作正統派共產主義者對於性的問題的觀點之最好的表現。列寧一開始便是對下面的情形表示驚訝：正當第一個無產階級的政府向全世界反革命派爭鬥的時候，女工的討論團體偏是充滿了性和結婚的問題。關於青年人對於性的問題所持的『現代』的態度，他頗加以諷刺：

『青年人對於性生活問題所持革新的態度，當然是基於「原則」和本諸學理的。許多人稱許他們的態度是「革命的」和「共產主義的」。他們也真誠地相信是這樣。可是並不能感動我這個老頭子。雖然我並不如一般人爲憂鬱的節慾者，這種青年人的平常也是年長者的，所謂「新的性生活」時常像是完全屬於資產階級的，祇是資產階級

賣淫場用別一種方式。依我們共產主義者所了解的說來，這一切與自由戀愛是毫無關係的。你們當然深悉那種著名的理論，以為在共產主義的社會裏面，性衝動的滿足和愛的要求將同喝一杯水一樣簡單和隨便。我們的青年人對於這種理論真的要發狂了。這已經成爲許多青年男女的惡運。相信它的人堅持這是馬克斯的學說……

「口渴當然是要滿足的。但是一個常應的人，在常應的狀況下，會不會躺在街上喝泥溝裏邊的水？或至喝許多人喝過的杯中的水？但是它的社會方面的關係遠更爲重要呢。喝水是個人的事情。戀愛則是兩個人來參加，並且從中間生出一個第三者來，一個新的生命。於是涉及社會的利益，對於集體的責任是要考慮的。」

「我一點也不要宣傳節慾主義。共產主義一定要從戀愛生活的圓滿中獲得生命和勇敢的欣喜。依我的意見，當下常見的生活的放縱，並不能獲得生命和勇敢的欣喜，反倒滅消了它們。在革命的時代這是壞的，壞極了。」

「青年人需要健康的運動，游泳，旅行，各種體格的鍛鍊，各種精神的興趣——研究，調查，

科學考察——健康的身體造成了健康的精神。我們不要教士，不要吉安先生（Dongu-
iii）也還不要德國的腓利斯第恩（Philistine）做快樂的媒介。

『你們知道我們的X同志……一個漂亮的，天資很高的青年。我恐怕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好處。他從這一個戀愛跳到另一個戀愛。既不爲了政治的鬭爭，也不爲了革命……革命需要集中，需要羣衆和個人一切的努力。無產者是一種進步的階級。不論藉着縱慾或醇酒以求麻醉或興奮，都是不需要的。……他祇需要清醒。』

『但是，饒恕我，克列拉。我已經遠離開我們的任務。你爲什麼不警告我守秩序呢？我的驚訝逼着我來說話。我們的下一代人給我很深的騷擾。他們是革命的一部分。假如資產社會的罪惡開始顯現在革命的世界中——像雜草的滋生一般——那末最好是及時設法來阻止它們。』

該書以後的篇幅，是布哈林，盧那查爾斯基，雅露士拉維斯基（Yaroslavsky）和許多別的人在響應列寧的意見，他們並且格外發揮一些行爲的規律，他們說，這些規律對於新社

會的建築者的需要，即如工具之於木匠一樣。斷然的側重在嚴正方面。他們聯合一致反對喝酒，吸煙，和縱慾。他們堅持，他們討論這個問題純然出發自社會效果的觀點，並沒有對青年主張道德化的理想。他們坦白地承認，對於現在的景況，老一輩的人大概要受責備，因為他們是負這種教育的責任的。他們已經了解，單是政治也許可以滿足老一代人的生活，因為在那時候他們還有別的東西，至於下一代人則需要更多的東西來充實他們的生活。

在過渡時代，家庭猶如未來社會的『細胞』，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在國家對於兒童能有適當訓練以前，父母的訓練永久是重要的。優生學的幾條重要原則：

『我們的青年不要忘記了這一件事，』尼克萊高爾莎夫 (Nikolay Kolzov) 教授寫道，『他們中間最好的人必不可以僅僅將力量和才能用在組織新文明的任務上，還必得將他們的能力傳遞給下一代人，不要將傳種的任務留給那些無用的人，因為他們像野鳥一般生活着，並且將粗心和低能遺傳給他們的兒女。每一個健康的強壯的，能幹的青年男女，從生理的成熟之開端，就要記着，他們最少要生三個小孩，能生四個更好，如果他們願意下

一代也像現在一代廣有才能。每個青年在結婚的時候，要選擇一個能够生育並且訓練最好兒女的人做配偶。對於那些持這種態度來結婚的人，目下一切結婚法註冊，阿林門塔等等的爭執，完全失掉意義。』該書末後一部分是 Comsomol 分組的決議案和報告，有的是可悲的，有的是可笑的，皆是新生活途徑所不應有的證例。

他們對於自己所寫的和所說的就是這一些。我對於他們的觀察比我自己的更為注意，因為沒有一個不完全懂得言語而又長住在美國人社會中的外國人，能够深知俄國人此一方面的生活。我自己的印象彷彿更要光明一點。考慮到黯淡的影子，我的想像也可以繪出他們一切的經過，對於他們工作中卑劣的，可笑的，或可悲的方面，我永沒有吃驚過。我所驚奇的反是他們所能保持的健全，以及他們所創造出來的秩序和美觀。極端的舉動不足以迷惑我，因為從俄國的歷史上，我知道俄國人的特性是在靜止以前必定要擺出很闊度的弧線的。

在判斷俄國的境況的時候，還必須記着，他們對於性有一種偶然的態度，這是盎格魯撒

克遜族的頭腦所難於捉摸的。男人和女人，男孩子和女孩子，旅行時一同關在火車的廂房內，在同一屋子裏邊睡覺，在河邊或海灘上赤着身體，絕不管彼此看見看不見。先前離婚的禁令反養成俄國人額外結婚關係的觀念，夫方或妻方的不忠實，不如西方人看得重大。俄國究竟比其他各地增加了多少亂交的情形，這是難以計算的。至於比較的多是顯然的。性自由的濫用當然是難免的，但是這種坦白的態度，在兩性關係上，比起我們這種假仁假義來，結果一定是更爲健全，更爲適當。

對於新道德兩種相反的傾向，我都詳加玩味過，因爲時此時彼的在證明俄國現道德的完全崩壞或極端嚴峻。這都不是真確的。實際是還沒有型成。新道德法典依然是一種代那模的東西。因爲規律的嚴峻，年長的人所命令的，年青的人所接受的，在別一方面都有着充分的補償。最明顯的事實是青年羣衆不願誠意的接受任何理論的法典；對於更優美更精緻的將來，當下的要求比既往任何時都劇烈。

對於自己的錯誤的承認，以及對於自己的愚蠢的揶揄，已經生出相當的效果。污穢和褻

樓的讚許已經大大的消失，現在算是得到空閒來享受別的東西了，我特別注意（Conroy mole，在他們個人的外表和普通的態度上有一個顯著的改變。對於跳舞和娛樂的禁忌也）有了一種反響。

工廠，學校，鄉村，Commonol 辦公室，裏邊充滿了男孩子和女孩子，滿具計畫，熱心，和一種躍動的力量。

『不要想』一個莫斯科大學醫科的青年學生告訴我，『祇因為性的問題是我們一些青年當中的一種「病」的問題，我們一切都受它吸引。我們大部分的人沒有時候專去想它。我們不僅要為將來準備我們自己，並且還要順着我們所研究的做實習的工作。我們在教育大學中的工人。我們大多數人在工廠裏面講授我們已經學過的東西。女人甚至比男人更為活動。……男女學生中間沒有什麼不自然的差別，於是泯滅了許多羞怯的態度。我們當然要找一個同志的。我們有許多人已經結了婚，並且我們的宿舍裏面住滿「小孩」』

她領我到學生宿舍裏邊去，在那裏我見到許多住在一起的小家庭，每一個家庭住在一

間小屋裏邊，丈夫和妻都在習課，小孩就和他們住在一塊。有的時候託兒所還有地方，但是那個學生母親一定要把小孩留在身邊，用她那些微的薪水僱一個女人在日間幫助她，這些都是需要的嬰孩，它們的母親想，最好是在年紀輕的時候生育，以便後來將所有的光陰用在工作上沒有幾個人有兩個以上的小孩。他們解釋道，現在大學裏邊所以有這許多小孩，因為許多這一代的人得不到機會在普通年齡完成學業，於是現在來趕補。

爲要防免青年人健康的傾向，正在推行很實際的方法。有醫生和專家講演早年放縱性慾的危險和花柳病的結果。充分的坦白的演講，一點也沒有隱諱。又用電話傳播這些方面的教育。學校裏面特別努力施行適當的性教育。尤其重要的是競技運動，這種運動在過去幾年已經傳遍全國。他們發展體育並不以體育的自身爲目的，祇把它當作強健身心和解放餘力的方法。關於娼妓，我不大願意引用我所能找到的少許統計，但是比起舊日來，娼妓實在是減少了。調查的結果，證明宿娼的大學生比舊日少的多，部分的緣因大概是由於兩性關係有了較大的自由。但是目下賣淫的情形很使政府發慌，要用嚴厲的方法來防免。

他們想到，最有效力的方法，是工人經濟程度的提高，以及社會化的廣播。當這些事情辦好了的時候，他們相信賣淫的制度一定會消滅。但是他們也看出目下實際方法的需要，已經在 *Narkomzdrov*（衛生部）下面組織了一個『中央廢娼會』。

政府關於本題的一切宣言和法令，表明他們所反對的是賣淫的組織，並不是個人的賣淫。法律所懲罰的，是從女人身上榨取利潤的人，而不是娼妓自身。祇有在傳染花柳病的情形下，娼妓才要受罰——不論男女都是一種該罰的罪過。最近這種法律已經修正過，規定傳播花柳病的人要受罰，所以現在也許要施行強迫娼妓檢身和醫治。

當地軍事機關奉令不准壓迫個人娼妓。

訓令中說，『考慮到下面的事實：女人爲娼是由於難堪的物質的或生活的境況，軍事機關各員，在執行職務的時候，對於娼妓要遵守一切禮貌和客氣，無論如何，必不可以有一毫的魯莽。』

全俄國的花柳藥房，都聯結起來，成了廢娼的一種特別媒介。與它們相連的是有組織的

課程，演講，和電影，不僅爲了治病的人們，也是爲了一般的民衆。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處，有許多 Labor Artists（勞働組合）已經組織起來，在裏面受醫治的和不願再幹那種營生的娼妓們，過了傳染時期以後，得有工作和獲得月薪的機會。在莫斯科有這樣一個裁縫鋪可以收容二百二十個女人，從事全年永久工作的有一百二十個人。連帶着設有一間膳堂和宿舍。她們有自己的俱樂部，壁報，和 Comsomol 的組織。縫衣機是由縫業托辣斯供給的，女孩們忙着爲衛生部製造圍裙。莫斯科的著名宿舍爾邁克夫加（Ermaikova）是專爲難民設備的地方，裏面有一個婦女收容所，拯救了許多賣淫的婦女。從前我會參觀過莫斯科二十哩外一個爲妓女設備的小農業殖民地。當我見着她們的時候，看她們都有常態青年的健康和愉快，並沒有留下從前的職業的痕迹。

實際方法之外，還有衛生部，共產黨婦女團體，和職工組合等恒久的廢娼宣傳。要求和供給同樣的要加以撲滅，從施行新衛生規則的觀點出發，並且以引起工人和青年對於無產階級國家內娼妓制度存在的羞恥感覺爲目的。妓女自身的羞辱並不如擷取她的人的羞

辱大。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經公布一道命令，凡是和妓女發生關係的黨員都要開除黨籍。新道德法典的形成，所受影響比無窮的演講，討論或體育運動更爲重要。生活上新的要求和興趣是主要的原因。沒有青年男女的遊惰階級，能創出服裝，髮式，和儀容的標準，給其餘的人來做效的。沒有沈湎聲色作無聊消遣的青年大眾，受了各方面震喊的廣告的鼓勵，肯把生活消磨在提高性要求的整千的人爲的方法的事務裏面。在俄國大學校裏邊沒有『普通教育』這種東西，所以不會每年製造許多『半生不熟的知識份子』來擴大游惰的不安分的隊伍。他們的學校和大學都要教導青年做一些確定的事業，父母在法律上負責要他們的兒女能從事一種有用的職業。

他們對於性的興趣既不當做一種遁逃，也並不以其自身爲目的。因此這種興趣便成爲非常有力的，成爲格外粗野的，如果你願意。他們所關心的是把這種興趣同他們生活的其他方面做成了適當的關係。他們太沈溺於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學業，他們建設新世界的職務了，於是這種興趣不能像在遊惰者的生活中，或在不能從生存的勤苦中來發洩他們的

能力和願望的人們的生活中，那樣可以做變態的發洩。使男人把女人僅看做一種雌性動物的無數情形都已廓除。年長的一代無論怎樣存留着舊社會的習慣，現下的女孩子同男孩子已經得到同等待遇的標準。老年人中依然餘存着輕視女人一般可能性的態度，在少年人中這樣態度完全看不出了。在鄉村和小市鎮裏邊，情形當然要差些，在那裏比在城市中家庭同舊觀念有一種強固的持續，因為城市的教育機會是大的。不過，無論在那裏也不再能把兩性做任何的隔離，女孩子同男孩子在這一方面完全有同等的機會。大家承認每一個女孩子都要給養她自己。形成新道德律，新兩性關係，以及將來的家庭的，實際是這些經濟的和社會的力量。

(註一)參看第十章。

(註二)一個由資望隆重的共產黨員組成的委員會，從趨向最高的社會理想的進步的觀點，來批評各黨員的活動。

第九章 居住問題

「家」這一個字，通常含有家庭或眷屬的意義。但是在俄國革命後的頭五年，有整千無家可歸的眷屬在四處漂泊，敵軍和饑荒一臨到他們，這一區的人民就要竄到那一區去。沿着火車路我們時常見到他們，一把銅壺之外，沒有留下一點其他的傢具。一家人，一天，一天，忍耐的圍守着這個殘餘的銅壺，等候一個機會搭入滿載的火車。俄國人有一種到處爲家的極端諳練的本事。我記得我曾看見過一對青年夫婦，在擁擠的車站地板上設下臥具——枕頭，被單，氈子和其他一切，絕不差怯的在擁抱着睡覺。一個鐵路的 *компа*（頭等車的後部），爲一個家庭所據有，是世界上頂像家宅的地方。他們的床具散鋪着，滿裝着車站龍頭的 *Kipyatok*（熱水）的茶壺騰騰的冒氣，還有一種常有的醃青魚和蒜頭的氣味。

那些稍存家庭意味的人家，比起無家可歸的來並不見得好。簡直沒有時候想到家庭生活。在那些日子，人們祇求活着，不問怎樣活和在那裏活。祇在最近兩三年，他們才能談到居住問題，現在他們對於居住的狀況加以不稍假借的公布。他們把自己在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和短處一一的說出來。因爲日下有非常多的社會困難——家庭的破裂，墮胎，賣淫，青年

們的墮落，疾病和醉酒——直接的或間接的是由於住居缺乏的原故，關於用來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我們必須看一看俄國家庭生活前途的一切考慮。

俄國也同歐洲各國一樣，大戰以後即刻感受住居的恐慌。第一，她的古代城市和惡劣市鎮都十分衰敗了。大多數工人住在潮濕的地窖裏面，有些地窖依然在用着，即使在戰前的時候，工業中心也有一種恒久的住居恐慌。戰爭阻止了理應可以完工的任何普通的修理和建築。革命以後工人們自行接管那些大的宅舍，旅館，和府第。集體公有的態度，以及保管現在屬於人民的物品的需要，乃是後來藉着政府的宣傳和實際的經驗發展出來的，在那些日子是並不明顯。我相信，故意毀壞是沒有的。因為從沒有住過裝鉛管的房子，很少人知道怎樣照料它。當鉛管裂開或窗戶破碎的時候，是從來沒有修理過的。國內戰爭的巷戰與以更多的破壞。當我第一次到莫斯科的時候，到處都有這樣的痕跡。建築物的牆壁上有許多傷口，窗戶塞滿了破布，從前是房屋的地方，現在變成了一堆一堆的磚瓦。在一九二零年和一九二一年的時候，破壞的程度達於極點。可怕的冬季已經由那些過來人再三再四地

向我描畫。沒有燃料。房頂和窗戶都壞了。很難找一間沒有窟窿的屋子。他們拼命的扯下空架的房子做燃料，把用來建築的木材也燒了。

在極端不舒服的狀況下，女人必得料理她們的家務；沒有水，沒有食品，沒有燃料來使她們的家人得到飽暖。她們必得運輸壓斷背膊的木材和水，有的時候還要經過很高的樓梯——在那些日子是沒有升降機的——站在行列中一點一點鐘的等候領取 *Pyok*（戰糧），平常祇是鹹青魚和一小塊黑麵包。

直到一九二一年，採取了新經濟政策，得有饑荒後的復興，同時住居的狀況也有了一般的進步。我在一九二二年經過莫斯科，同年十一月又回到那裏，前後一對照，簡直是一段神蹟。傷口已經治好，處處都見到新的油漆，鉛管和窗戶正在修理。

在一切工業中心，尤其是莫斯科，住居狀況的救濟是很短促的。從列寧格勒到莫斯科的遷都，使得那裏一切利便處都非常緊張起來。工業復興把千千萬萬的工人帶回城市，他們曾經躲到鄉間，當工廠關閉和食糧斷絕的時候。許多年沒有見面的父親和兒子突然間相

過了，他們家人所住的小寓所就更覺得擠擁了。改良狀況的傳述使得整干的青年農人都到城市來求生活，因為他們厭倦了田間的荒年，沒有種子，沒有牲畜，也沒有耕具。這種過程還是繼續着，像莫斯科，拉斯妥夫，頓河流域，和巴庫等地方，建築物不能與人口同時增加，每個人所佔的面積一年比一年的縮小下去。常有八九個人擠在一間屋子裏邊。新來的人一定要分佔鋪位。大約有百分之二十可以居住的地方，因為攏總的毀壞和缺乏修理而糟掉了。住居委員會已經由工人管理的各種大房子中選舉出來，但是他們有許多人在職務上是漠不關心的；沒有集中的管理，沒有集中的計畫。國家沒有力量來自行管理建築和修理房舍的事務，祇有求助於工人，要他們自行參加恢復的進行。因此，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九日，公布了一條法律，給與人民自動組織『住居合作社』的權利。在一九二五年，這些工作集中於一個主要的組織，“*Centrogil'sorus*”，或『中央住居合作會社』。住居合作社共分兩類——租賃合作社和建築合作社。頭一種是由住國有房舍的人所組織的。按期由政府租賃房屋的制度已經施行，定下了保持信用的辦法，嚴正的擔負房屋的保護，修理，以及擴

大的職務。中央機關購買大批必需的建築材料來幫助他們，並且與以專門的指導，同時廣為宣傳，在組織合理的生活方法，和鼓勵團體的文化活動上，又給與實際的助導。宅舍中原有的團體正式組成了合作社，並且組織了新團體以取得其他的房舍。

我曾經到過許多與工廠和機關相連的公共宅舍，並且見到它們在社會發展的各階段中進行。那些革命後立即實行純共產主義生活方法的團體，因為缺乏訓練或準備，時常是失敗的，並且退到個人主義的制度中去；同時那些比較緩進的團體，祇應用它們自己試驗出來的新社會方式，漸漸為進步的社會組織形態立下一個強固的基礎。

充公的大建築物有一些是像大學宿舍或旅館的，在長廊上敞列着一行一行的單間臥房。這些單間臥房時常為一全家一全家的人所佔有。在這樣的建築物中，有時你可以見到一個中央膳堂，或可以搭膳的中央廚房。但是比較常見的是有一個中央廚房，或每一層樓有一個廚房，讓女人們預備自己的飯。有的廚房是闊大而且空氣流通的，有着許多爐竈，管子裏邊常有開水。不過平常總是狹小的和嘈雜的，女人們在爐子旁邊彼此擁擠着，充滿着

火烟和爭吵的濃厚空氣。每個女人也許將她的 primos (汽油爐) 帶到廚房裏邊，單獨地做她自己的飯。她也可以在自已屋裏煮飯。那些分做許多間隔的住宅，情形每每是更爲擁擠。每一家佔一個間隔中的一間屋——或者有五六家以上的人擠在從前爲一家設備的地方——並且共同使用一個廚房。用飯的時候是一種習慣了的經驗。在這些日子當中，俄國城市的女人少有能够自己使用一間廚房的。廚房同時也常是人的臥房。但是雖然有這種陰鬱的景象，大體說來，工人生活總要比從前好，已經發展成公共住宅的社會組織，即使對於女人，也可以使她們脫離桎梏的生活狀況。每一個公共宿舍都有它的俱樂部，圖書館，託兒所，因了教育和實驗的傳播，婦女也漸漸進入合理的生活方法。

城市中國家化的產業共值六千萬金盧布，其中的一半，實際上包含那些最大的建築物，是住居合作社從政府方面租來的。蘇維埃聯邦二千五百萬城市人口中，有百分之十五住在住居合作社所租的房子裏邊。合計起來共有三萬一千五百間獨立合作社，大多數位置在莫斯科，列寧格勒，拉斯妥夫，巴庫，頓河流域等大工業中心。合作社每一股份的價值從一

個半到二十個盧布。籌劃充分的經費來修葺房屋，是他們主要的困難。會員付房租祇是一種名義，有些時候，他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就用非常高的價格把房屋租給 *Эконом*。公共銀行和城市銀行成立的時候是非常窮的，它們祇能以高利息給與三個月到十二個月的短期放款。隨後一年中央市政和建築銀行組織成立，政府又有建築放款的特別津貼，情形於是有了進步。又有一條舉辦『改良生活狀況公債』的法令，規定所有企業都須以百分之十的利潤留作此項用途，這又是一個來源。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二六年，這種公債達到四千五百萬盧布。在那些特感住居恐慌的地方，這種公債的百分之七十五要留作住居之用。

第一個住居合作社是在伏洛打 (Volodga) 組織的，是和鐵路工廠有聯絡的，隨後在鐵路工人間更有其他幾種成功的計畫。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莫斯科召集第一次住居大會，制定全俄統一的計畫。在一九二四年的秋天，已經組織了十七個建築合作社，並且有些企業開始自動的幫助工人建築。

一九二四年十月，我偶然見到第一批新的工人住宅，當我經過頓河流域的拉斯安夫的

時候，那是北高加索區的首都，一個住居特別恐慌的城市，因為這一區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是很重要的。在傍晚和交夜的時候，街上擠滿了人——由本地製煙、紡織和農具工廠出來的工人和不久以前親自做過工人的政府僱員們。礦工代表從頓河流域來領取建築房舍的經費，迷惑的農人從本區各部分湧了來，打聽土地、納稅和機器的消息。黑眼睛的哥薩克人雜著俄國中部的斯拉夫人。黑鬍子，寬衣服的高加索人，繫着裝有手鎗和短劍的銀色腰帶。平和的昂然的行走。沿着植樹的街道的是工人俱樂部、花園、室外運動場、電影，到處都擠滿了人。

後來我走到城市的邊沿，突然發覺像樹林般的新屋在建築。有一種很大的鏈聲和鋸聲，間雜着男人的低音，在唱一支有音節的古代民歌。我和一些營造師談話，他們告訴我，有一羣工人，討厭住居擁擠的狀況，要求工廠行政機關加以改良。行政機關答應為他們墊付幾年的原料用款，數目和期限依工人的薪水而定。在這一種安置下，工人可以建築他自己的房子，照納租的樣子付還墊款。選定窮苦工人承受此項墊款。先前的實驗沒有後來統一公

共事業的那樣計畫，但是比起工人所住的小屋來，實在是好到不可以道里計了。

兩年以後我又到拉斯妥夫去，試着尋找從前見過的那一組房子。許多 *lost* 的房子——他們稱爲工人小村——已經矗立起來，無從指定從前所見過的那一所了。在一個冰冷的十二月的下午，我隨便選定一個地方，坐着一輛馬車出去，我們駕駛了一 *hour* 半，經過不能形容的泥濘，經過一處正在建築的工人小村，內中是長排的挺直的三層樓的房子，看來很像一些醜陋的美國市外區。

我所要到的那一座工人村並沒有這樣不愉快的庸凡。它是由七十多間白灰矮房組成的，房外是寬闊的街道和相間的空地，中間有幾座磚造的大建築物。在那樣淫雨霖霖泥濘滿道的下午，沒有地方看來可以引動人，祇有一些細長的小樹和叢林應許較好的日子到來臨。

我們叩了幾家的門，但是都沒有人在。後來有一個小男孩告訴我，所有的人都在俱樂部裏邊，並且把我們領到最大的那所紅磚建築物裏面，是一幅同力合作的動人的圖畫。在

我們走進的大屋子的一端，有一些人在一個戲台上從事完工的拂拭，有的在製造板櫓。有一些女人坐在地板上縫帳幕，並有一羣青年人正在畫劇場的風景和火景。有一羣無可形容的人站在戲台上，彷彿是在排演一齣戲劇；提示人的廂位（俄國各舞台上，一件最顯眼的東西）中有一個人用盡氣力把劇詞從人聲嘈雜中嚷出來，演員們再向他大聲的嚷過去。一個黑髮的大漢，帶着一頂大的，粗糙的，羊皮帽子，穿着皮製短衣和長靴，彷彿是在指導建築和戲院的動作，走過來介紹自己，是合作社的主席，客氣地問我們有什麼要他幫忙的地方。我說我來的目的是要看工人的房舍，他就指定別一個人代替他的職務，他來同我們一道行走。他解釋說，他們現在剛剛完成俱樂部的建築，這個建築物祇是在禮拜六的下午和假期用自己的勞力造成的，這樣就可以省去一半的費用。下一個禮拜就可以開幕。

我們走進幾所房子去。這些房子從本意上是很適於做兵營的。每一所房子有六個間隔，四個大角間，中間有兩個小屋，留給獨身工人和沒有子女的配偶。每一個間隔都有自來水和水廁。獨立洗澡房在俄國還是很少的，因為鄭重其事的洗澡祇能在公共浴室裏舉行，全

俄國的浴室每一個禮拜有一天注有熱水和暖氣。還有地窖和下房，用來堆置物件。房子裏面是沒有一致的形式的。有一些在角落上懸着他們的神像，有的就畫着列寧和斯達林的照像。有的是陳列簡單和煥然一新，有的則是混雜和狼藉。

越過他自己的間隔的銅壺，那位精富力强的主席告訴我，他怎樣籌集了二百萬盧布的資本，把這些兵營的秃壁改成了安適的房舍，這個工作是已經起首，但是永不會完成。

『我是一個農業機器工廠的熟練工匠，並且是在組合作業中活動的。在每一個會議中我都提出居住問題，後來究竟從我們自己的組合以及其他組合中找足一班人組成一個合作社。後來他們要我辭去組合的職務，專任合作社的主席和經理。我的工作是有十倍的煩重，然而這是值得的！』

他告訴我本區現在住着二萬六千五百人，其中有六百十人是合作社的股東，這個數目還在繼續增加。與工人相連的各種企業已經拿出六十萬盧布，職工組合也會加以援助，蘇維埃執出應有資本百分之四十做為長期貸款。不好的方面，他承認，是經營的費用太大，每

一所房子，合計爲原來的兵營和增加的建築共付出三萬二千盧布，每一個間隔要付出五千盧布，比俄國現下工人住宅的平均費用，幾乎多過兩倍。合作社用了分級的辦法，使工人容易交納房租，工資最高的工人，每月收入從八十五到一百個盧布，每一方 *arsbine*（一 *arsbine* 等於二十九吋）要繳二十個戈比，每月收入從八十五到七十個盧布的工人，繳納十六個戈比，遞降到失業的工人，每一方 *arsbine* 祇繳五個戈比。燃料、電、和水祇收幾個盧布，每家每月全部用度的差異，從五個到二十個盧布。有時那些有三間屋子和一間廚房的間隔，往往由兩家分住，這樣一來，更可以省儉費用了。雖然是這樣經濟，可是住在這裏的工人，平均每個人所佔的面積，比住在城市的多過兩倍。電車路延長了一哩以達到他們那裏，工廠發給他們車費，所以這個距離並沒有妨碍的事。事實上這是一種利益，因爲他們時常省下車費，在天氣晴朗的時候，他們可以步行。

主席的妻是一個羞怯的婦人，坐在後面，讓丈夫講話。但是當我打動她的話匣子的時候，我知道她是一個婦女部的職員，並且曾把四百個女人組織成了代表團，按着時候開會。她

告訴我，她的夢想是要組織一所公共膳堂，但是大多數女人還沒有達到願意接受這種意見的時候。不過，總竟有了一個婦女委員會，從事管理普通的衛生狀況，她們正在籌畫一個公共洗衣所。

雖然這區祇有一年的生命，俱樂部之外，他們已經有一個合作商店，一個圖書館，一個託兒所，一個幼稚園，一個地氈店，一個藥房。所有達到學齡的兒童都到學校去讀書，那一間學校是和鄰近的建築合作社合力組成的，從二十歲到五十歲的成年人有八十五個方在學習讀書和寫字。

我在伊凡諾夫渥斯奈忒斯克參觀過的工人小村是格外動人的。整千紡織工人住在本城，整千別的工人每天早晨從遠區聚到市鎮中來。那些住得太遠不便日日來往的，就在一些人家的地板上租一個地方睡覺。從前他們整千的人都是這樣做，那時租價高漲，有時他們要替換着睡覺，現在還有許多人是這樣做的。在伊凡諾夫渥斯奈忒斯克，工人小村運動是很熱烈的。我到那裏參觀的那一天，我和維拉亞利希娜娃在薄暮的時候駕着車去參觀

其中一個工人小村。這個『村』比起我從前所見過的，要動人得多了。房子是大的，三層樓的，有六個至八個的間隔，下面用磚，上面用洋灰，建築得很好。房子有幾種不同的格式，外邊留有很多的空地，與那些板板的行列不同。裏邊是闊大的寓所，有電燈，有現代的爐子，有水廁。這裏每個工人的費用和拉斯妥夫的工人村一樣，但是創辦費省減許多，所以全部用費都可以早早清還，工人們可以免却任何的支付，祇有每月一點公共事業的費用。紡績工業也會積極的幫助工人們建築房屋，該項工業現在實際上已經達到戰前的產量，能有足夠的利潤來保證這件事的。這一個工人村第一批建築物中有一個公共洗衣所，不久就要開張了。他們有一間特別學校，兩班輪流着照顧她們四百個小孩，有一座光線充足的大房子已經蓋起來，預備用做一個託兒所。一切工人都有自己的廚房，但是有許多人同意加入一個公共的膳堂，關於這一件事有過許多的談論和騷動。

因為缺乏資本和貸款，直到一九二五年，建築合作社還不能從事大規模的建築，在那一年內，俄國百分之二十五的新房舍是由該項組織建築的。截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共計

有一千零六十五間會社，二十萬社員，資本股份爲四百六十萬盧布，債務爲三千萬盧布。他們建築了約有三千所住宅，共有九千三百五十個房間，收容了四萬人。社員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工業工人。大多數建築合作社發展在工業區域，但是在工廠中心的多過在大城市中的。實際他們都願意建築單家居住的小房屋，或祇爲幾家人建築，這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各種不同方式的社會化受有各方面的鼓勵和援助，祇是沒有由上面來的壓制。去年中央住居合作社發起了一個熱烈的教育運動，解釋組織的方法和樣式，並且鼓勵各團體盡力自行籌劃經費。中央住居合作社遣派職員到各地去，又在莫斯科舉辦一個六個月的特別課程，有一個時候各地合作社派來了五十個學生。這種課程包括住居問題的演講；住居合作的法律的和組織的基礎；俄國的經濟地理；建築材料的地域的研究；建築學；市鎮計畫；衛生法；花園與草場；自來水，燃料，與燈燭問題；文化工作與政治經濟。學生們最初也出外考查住居的設計。每一個學生需要四百個盧布，其中三百個盧布由遣派學生的合作社擔任，其餘的由中央住居合作社撥支。在莫斯科外邊的一個工人小村裏邊，有一個很實際

的試驗室，在那裏有四種特別建築樣式，要從經費，牢固性，溫度，衛生，和安適的各方面加以試驗。

藉着中央住居合作會的援助以及貸款來源的擴充，每一個間隔的平均費用已經減到三千盧布左右。他們試着再求縮減，因為要使普通工資低下的工人享受住居合作社的利益，這樣的費用還是太高一點，至於像伊凡諾夫、涅斯克的事件，各工業用一種方法來援助最窮的工人得以最先遷居，那當然是例外的。在普通環境下，一個間隔每月的租金會達到十四個盧布左右，這對於月薪六十盧布的比例數未免太大了。莫斯科每一個工人間隔的平均經費，從七千到八千盧布，每一間隔有三個臥室，有廁所和廚房，每一間臥室需費二千盧布左右。這和美國屋數相同的間隔——（大約要大一些，其中有一個新式的廚房和設備完全的浴室）差不多用費相等。

現在貸款的安置比從前便利多了。舊時祇能得到短期高利的放款的地方，現在合作社可以得到為期二十五年到六十年的放款，利息低到百分之二或三，百分之九十的款項都

可以這樣借得，所以它們的社員祇須預備百分之十的資本。這樣就可以延長租期和付租期以就全低工資的工人。約有百分之五十的合作社用自己的社員來建築。這樣一來，最少可以減去百分之十的費用，有的還會自己燒磚。至於那些比平常工人較為富足的人，有時還可以照原價向一個住居合作社購買一個間隔。

住居合作社既在住居境況中佔很重要的地位，同時約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宅舍是由別種組織建築的。據勞工委員希彌特 (Schmitt) 報告，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蘇維埃聯邦工人宅舍的經費共值一萬二千六百八十萬盧布；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則為二萬四千八百萬盧布。擬議在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要達到三萬四千二百五十萬盧布。這個數目的百分之四十五要從中央公共銀行貸借；百分之二十二由政府預算撥支；百分之十由『改良生活狀況基金』中撥支；百分之二十三由合作社基金中撥支。因為建築材料價格的高漲，許多人不能住居這樣費用大的宅舍，一九二五年所定每人佔十·四方 arshines 的標準也要降低一點了。直到一九三一年不見得能有真正够用的宅舍，並且立下一種個人所佔

面積的滿意的標準。從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蘇維埃聯邦工業中心住居面積不敷數日爲六百六十萬方 arshines，一九二三年則爲四百七十萬方 arshines，因爲在那個時期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而住居面積祇增加了百分之六。

在考慮住居問題的時候，我曾經特別的注重合作社的工作，因爲它們是側重社會組織問題的。住居合作社也從事教育那些工廠或其他企業所照顧不到的女人。它們有一個特別文化部，由一個女人在內主持，那就是奧斯特拉夫士加亞（Ostrovskaya）同志，她是一個經過多年的流放和地下工作的革命黨員。她最初注意住宅建築的樣式，住宅自身就含有減低女人家庭苦役至最低限度的意義。她向我解釋道，他們但要建築住居少數家庭的住宅，第一要有各家獨立的廚房，因爲這是大多數女人所需要的——到後來廚房可以改充別項用途，當公共廚房組織就緒的時候。她告訴我說，同志中還有主張共同生活之進步的方式的，但是聰明的人都曉得需要一步一步的做到，他們必須爲個人的興趣留相當的空間和自由。

『我們不願意我們工人的住宅和你們美國的一樣，所有住宅像豌豆莢內的豆粒——或者簡直像監獄——按一下彈機，就從牆壁中推出一張床來，再按一下別的，就為你預備好了廚房。我們要有你們的方便，和你們省工的裝置——但是我們要使人民住居的地方具有美和快樂，不僅僅是一種機械——我們要建築真正的花園市。』

奧斯特拉夫士加亞也很留意陳設。中央住居合作會社會經派了一個代表，到莫德、奧等國去考察工人住宅的情形，回來的時候帶了許多俄國素所未識的簡單而且舒服的設備的像片。他們曾經勸告家具製造廠加入一種適用的和藝術的工人家具的比賽，那就是去年夏季所開的展覽會。他們的小冊子中載着一些省力和衛生的設備，如煤氣爐，排水盤，帶蓋的垃圾罐——一切俄國家婦從不會見的簡單器物，以及紐約公寓中的人們所習知的比較複雜的設備。奧斯特拉夫士加亞同志見到許多工人在搬入新寓所的時候，將舊有的家具一道帶進去——天鵝絨的，靠壁長椅，滿有祖傳的臭蟲的沉重衣櫥，她於是不斷的作簡單陳設的宣傳，已經着了成效。

爲要顧到家內的女人，並且喚起她們對於集體的興趣，合作社開始用最簡單的策略。首先給與家婦加入合作社的特別利益，例如允許她們分期付款。隨着組織了婦女會議，一開始並不討論政治問題，祇討論與家庭有關的事務。他們先用小孩來引動她們，因爲他們相信，在社會化的過程裏邊，兒童的養育是社會的第一種職務。他們幫助她們組織婦孺診療所，託兒所，和幼稚院。隨後是集體的購買和清潔，縫補和修理的課程，家務和飲食的談話。這一切問題是由各住居合作社所選出的『文化委員會』負責辦理。別種委員會，含有三個到五個的委員，那便是政治，教育，清潔，和衛生等委員會。各委員會的主席，在一個合作社行政委員的領導之下，組成一個『合作社教育委員會』。在文化和清潔委員會裏邊，常要設法得到最少佔半數的女會員。清潔委員會在衛生部指導下進行教育工作，視察廁所，廚房等等，此外還進行疾病預防運動，組織演講會，體育會，夏季休憩所等等。因爲這些方法已經引起女人的興趣和活動，委員們再用文化工作和社會活動來引逗她們的興趣。在這些公社裏邊，集體生活的興趣漸漸的補充了（有些時候竟是代替了）家庭的興趣。家庭依然

是一個核心，不過個人的忠心和誠意現在已經轉向較大的集團。

住居恐慌——建築經費——花園市極普通的名詞。我們到處聽人說及它們。在俄國關於這一些所不同的是什麼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三種解答，在家庭及其錯綜的個人和社會的關係上都有一種重要意義。第一，事實上的擁擠，泯滅了家庭單位中一切的快樂或舒適；由此合成的憤懣和神經的緊張使得凡可以外出的人都要躲到外邊去尋求滿足；這種困難之部分的和浮面的減輕，就給與較多方碼的空間。第二，蘇維埃政府特意用集體的利益代替個人的利益，並且藉了發展共同努力共同娛樂的一切方式，以及轉移從前私人所操演的功用於社會方面以鼓勵對於集體的熱誠。第三，努力找尋一種合於這個過渡階級的媒介物，它的自身要為將來理想方式的一種準備，並要具有充分的彈性，以適合於將來的新方式，還要具有最低限度的破壞性。

第十章 母親與嬰兒

在蘇維埃俄羅斯，婦女和兒童並未國家化，柏拉圖理想國的兒童公育也並未實行，不過

蘇維埃政府對於兒童負責的程度，大過於世界任何的國家。社會保險法爲兒童規定下相當物質的給養，託兒所和學校負擔兒童的訓練。訓練兒童遊戲的計畫，不祇要給兒童一種豐富的，健康的的生活，還要從教育兒童的苦役上解放兒童的母親，令她也可以參加社會家庭的活動。

一九一九年列寧在女工大會中說：

『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還是受着圍困。爲要給與婦女完全的解放，爲要保證她們同男人的真正平等，一定要使家庭的功用成爲社會化，並要使婦女參加普通的生產勞動。

『我們這裏所考慮的問題，當然不僅要使婦女在勞働生產力，勞働時間，數量和狀況上得到平等，還要保證婦女不致因家庭中的地位而服男人所不服的苦役。你們大家都知道，雖然完全講平權，婦女還是受壓迫的，因爲在她們的肩膀上擔負着整個煩重的家務。家務在大多數情形中，是最愚弄人的，是女人所能擔任的最煩雜的工作，完全是沒有效果的。對於婦女的發展是一點也沒有益處的。』

「因為追逐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要為社會主義的完全實現而戰，並且在這裏為女人展開一個偉大的活動場。我們現在嚴重地準備着為社會主義的構造清除園地，社會主義的社會的真正建設，祇有在婦女得到完全的平等，免去一切瑣碎，厭倦，無用的苦工，來和我們共同擔任新的工作的時候，方才能够開始。為這一件事在將來我們要忙許許多許的年代。這是不會有突然的結果或燦爛的果效的……」

兒童的照顧，食物的預備，衣衫的洗滌，以及其他家庭工作——在免除婦女家庭苦役的過程裏面，所要考慮的就是這些問題，而兒童養育的問題常常居先。

俄國的婦孺工作，統轄在衛生部的『婦孺局』的下面，由利比底娃 (Lebedeva) 博士負責管理。參觀者在莫斯科見到這一部的工作，少有不加以讚嘆的。

格外動人的是河邊那一座偉大的母性院，關於母兒的健康和幸福的一切問題抵抗疾病和死亡的計畫，醫科，產科，兒科，看護科等課程，以及模範的制度，美麗的陳列，都是非常動人的。有許多圖表指示俄國嬰兒的死亡率高過其他各國。有許多傳單說明嬰兒夭殤的理

由和預防的方法。有許多模型表明嬰兒發展的各階段，生育的過程，常態兒童的發長，疾病和變態的原因與影響。有人帶着不斷的工廠與鄉村的婦女隊伍來這裏參觀。

俄國第一流的藝術家爲這種陳列畫了許多美麗的油畫。這裏也擺着許多派往全國的傳單原稿。有一種爲鄉村製的傳單，上面畫着一長列携着嬰兒的母親等候在「婦孺診所」的接待室。對面是一叢小十字架，碑文上寫道：「診症所滿時，墓地就要空了。」另一張畫着一個和顏悅色的農婦，一隻手抱着一個健康的嬰兒，另一隻手拿着一本書——標題是「母親愈識字，嬰兒愈健康。」另一張傳單中載有三幅畫，第一幅是一個行將生產的鮮衣農婦擗着很重的木頭，第二幅是在刈草，末後一幅是她的丈夫在和善地對待那行將生產的牛馬。其他傳單解釋母親應當吃和不應當吃的東西，嬰兒應當吃和不應當吃的東西——指示害蟲，蒼蠅，污穢，和不潔淨的環境的危險；解釋爲什麼不應當沿用農人的習慣，用層層破布把嬰兒的兩臂緊緊扎起像一個木乃伊。到處舉行母親自己乳兒的宣傳。其中最流行的一幅圖畫，是一個小牛怒視着一個吸一瓶牛乳的嬰兒，並且問道：「你爲什麼吃我。」

母親的乳呀？」另一幅畫着嬰兒要求自身權利的羣衆示威，有一個嬰兒在講台上演說他們的權利，擲着的許多旗子上寫道：『防免蒼蠅！』，『乾爽清潔的尿布！』，『我們母親的乳！』，『新鮮空氣和日光！』，『要產婆，不要伯加！』，『強健的父母！』

參觀者從這裏走入託兒所，看過他們那纖塵不染的清潔，現代的設備，科學的喂養。他們又看過診症室，牛乳房，育嬰所，模範產婦院（母親在那裏如在學校）。他們於是確信蘇維埃俄羅斯照顧母親的計畫勝過世界任何別的國家。但是他們最後的結論常是這樣：這種計畫祇是紙上空談，莫斯科這種機關不過用來向外賓炫示的，最好也不過在表明遙遠的將來他們有這樣一種可以實現的微弱希望而已。

當然他們的計畫遠超過他們實現計畫的能力。經費的缺乏障碍了許多這樣計畫的實現。在較小的城市中，兒童機關有時竟是莫斯科模範機關的一種滑稽的模倣。還有一些鄉村從來就沒有聽說有『婦孺局』這東西。

但是，我曾到過莫斯科東部的伊凡諾夫涅斯奈沁斯克，見到一間託兒所比我在莫斯科

所見的還好。在南部頓河流域的拉羅安夫，更南在比亞提哥爾斯克（Pidgor'ki）——『五山城』（厄爾布魯士山（Mt. Elbruz）在上面舉起它雪白的胸膛，）我見過同樣好的託兒所。四年前我見貴格會的教徒們幫助他們初開辦的託兒所，聽人說，在烏克蘭的工作比在大俄羅斯的爲好。我也見到中心計畫慢慢地伸張，直到馬斯羅夫結特，在一千 Verst 以外。

十一月，在莫斯科，我聽到利比底娃向婦女部大會報告說，必要採取嚴厲的手段向鄉村擴張託兒所的工作。她說，在工廠和工業中心，雖然設備還很不週全，不過正在進行着，但是農婦們依然帶着嬰兒到田裏去做工，或者把他們留在家裏給一個小姊姊看管。

在十二月的時候，在馬斯羅夫結特，我看見中央發布的訓令，利比底娃的請求已經發生了影響了。薩伯提娜（Sub otina）從亞魯爾斯克伊（Arhan'gel' Hoye）來的婦女部職員，有一天帶着夏季託兒所的計畫來了。去年她已經在這一區開設了第一間，今年她計畫著再組織兩間。在阿齊蒲夫加（Archipovka）的小村，已經集足了一間託兒所的經費。馬

斯羅夫結特的農民是窮苦的並且落後的，不能希望他們有很多開創力。但是 *Co-ops*（政府農場）的工人，大部分是從鄉村窮農中招募來的，在他們同農場的共同協議中，約定每年撥相當的數目來開設託兒所，從這一方面可以得到幾百個盧布。鄉村合作社和互助委員會各認捐幾百盧布。美國兒童委員會的代表允許薩伯提娜供給一切設備。祇要再捐一點款項來擔保託兒所夏季的經費就算够了。

在鄉村婦女討論此問題的會議中，有很大的騷動。有幾個坐近角落的富足的老巴巴裹在很大的 *zibos*（見第五章註三）裏邊，對於每一件事都搖頭。

『我們沒有託兒所也養大了我們的孩子，爲什麼現在的母親不能和我們一樣做呢？』
有一個說。

『這不過是要我們納稅的一種計策罷了——他們把小孩帶了去，直到我們納了稅才放出來，』別一個警告說。

『他們大概要把十字架從他們的頸子上除下來，不信上帝的人——你就要知道了！』

第三個說。

幾乎所有年老的女人都反對託兒所的意見，而年青的女人都贊成。瑪拉西亞 (Marashin)，一個兵士的寡婦，她的小男孩在去年夏季被水淹死了，當她把他留在家裏和小表親們在一起的時候，她現在爲待助的女人們辯解。

『說託兒所不肯好好照顧我們的小孩，這並不是真話。在別個村子裏我親眼見過一間，小孩在那裏喂養得很好，並且很乾淨——』

『是的，』坐在角落的三個女人中的一個插嘴說，『正是這樣。我聽說他們天天給小孩洗澡——受了這樣的看待，你怎能希望小孩身體強壯呢？』

『不要緊，』瑪拉西亞接下去說，『這總比我的威希亞 (Vishka) 的遭遇好——也比尼娜 (Nina) 的小孩的遭遇好，尼娜的小孩離開祖母爬到別的地方去，當找着的時候，已經被豬咬去一半了。即使我們自己沒有小孩，也應當幫助別人。女人生小孩不是容易事——如果受了許多罪所得的祇是小孩的死亡——那有什麼用處呢？』

角落上又發出喃喃的怨言。

『好的，縱令你的威希亞被水淹死，那是上帝的意旨。你是一點也不能違反的。你瑪拉西亞，不要瞎操心罷。也許這樣更好呢。現在他和天使們同住在天堂上——你還憂慮什麼呢？』

青年婦女把這個議案通過。她們決定親自向村中運動一切增加的經費。三月八日宣布託兒所在五月十五日開幕。

農場の木匠把一間正空着的農舍打掃乾淨，把木器都塗白，並製造一些藍的小床，小桌，小椅。牆上釘着鮮明的標語，懸着美麗的帳幕，窗內擺着鮮花。一大羣農民開大了嘴看這些陳設。

『Bojhi Moi (我的上帝)！』一個人驚嘆道，『用了這許多錢——用了這許多功夫——都是爲小孩子——怎樣的可惜呀！』

別一個說——『當然，他們不會把小孩子放在這樣乾淨的地方？』

起首請求加入的人來得很慢。有一個女人，人問她爲什麼不把小孩送入託兒所，她答道，『我爲什麼這樣做呢？我家裏有一個 *nanička*（小看護）呢？』他所說的『小看護』就是一個七歲或八歲的女兒，到處攜帶着那個小孩。到末了，請求加入的人數多過所中所能收容的了。

利底亞米海羅夫娜 (*Lydia Mikhailovna*) 城中護士學校的一個專家，到這裏負責管理，並且訓練村中三個巴巴作助理員。老莎士加 (*Stashka*) 簡直想不出清潔的需要。利底亞米海羅夫娜說，小孩應當放在沙箱裏邊，要離開農場的污穢地方，並且提議要換下泥污的衣服，她就反對說——『但是在家裏他們和豬一起玩甚至一起睡——爲什麼要這樣麻煩呢？』

雖然庫馬 (*Kuma*) 河的混水比較是近的，水槽中也裝滿從井裏打來的清水。當利底亞米海羅夫娜吩咐莎士加倒出浴盤的髒水，爲每一個小孩倒清水洗浴的時候，她就搖她的頭。『啊，爲小孩使用這樣乾淨的水，實在是一種羞辱——最好你讓我用一盤水來洗三四

個小孩，免得這樣糟蹋。」一個人若考慮到農家使用的每一滴水都是由女人挑來的，就不難於了解這一個觀點了。

她得有潔白的方布來揩流涕的小鼻子。但是到底亞米海羅夫娜每一轉身的時候，她就拿起她那用髒了的套裙來揩小孩的臉。當告誡她的時候，她辯解說：『但是，利底亞米海羅夫娜呀！他們的鼻子是髒的——手巾是非常乾淨的呀！』

這不過是中央偉大計畫定能達到鄉村的一種事實的證明，幾年以前，鄉村裏邊連一間託兒所也沒有。現在鄉村有四千間以上的夏季託兒所，城鎮中常年開設的託兒所除外。這此託兒在發展的階段上高低不等。我相信它們有的是不衛生的，不過比起普通的農舍來，究竟要進步一點。醫藥部的指導是很明白的，並且把它們提到頗高的標準。雖然它們還祇及於一小部分的農民子弟，但是却代表一個重要的創始。

在這種工作中所有的進步是顯著的。我還記得在饑荒時代所見兒童院的淒涼景象，院中塞滿了枯黃的小孩，擺動着空空的小手——廂房列滿了小孩的屍體，因為他們死亡得

太快，挖墳的工人來不及埋葬。不過這是饑荒最急迫的時候，即使這樣也還是可敬仰的工人，半餓斃的醫生和看護不斷的來往，在這種可怕的運命下，居然救活了整千小孩的性命。但是當下，參觀過許多託兒所以後，我所得的印象，主要的在城市裏邊，乃是寬大的充滿陽光屋子——一行行鋪蓋華麗的小床，遊戲室中設有滑面，斜槽和級梯以操練小孩的肢體，還有大塊的塗色木頭，和掛在牆上的許多畫。在早晨的時候母親們去工作，順道把小孩送來。所中的人把他們家裏的衣服脫下，放在一個袋子裏邊，於是給他們洗澡，換上乾淨衣服。他們睡覺，吃飯，和遊戲都有一定的鐘點。母親一天來喂小孩三次乳。別的小孩由一間衛生廚房供給飯食，裏邊有一個受過訓練的廚師預備適合各種年齡的食物。母親們在下午把他們抱回家去，洗過澡，吃過飯，很滿足了。這樣一來，兒童的環境就增加了各種變換和彩色，因為科學和經驗告訴我們，雖然有最合衛生的環境和科學的調養，對於兒童方開的智力也不一定能夠給與家庭空氣中各種的刺激。因為城鎮大多數託兒所的組織和設備都是非常好的，大致不能兼顧四分之一以上需要幫助的母親。但是數目在逐漸增長。

關於母兒的照顧究竟有了什麼樣的成就，若求充分的了解，一定要做一個小小的歷史。兒童機關從舊社會接受的遺產是非常缺乏的。在克倫斯基時代，連保護婦女的溫和的沙皇法律都廢止了，臨時政府並未進行一種實際的步驟來和緩婦女的狀況，也未嘗立任何獨立的機關來解決這個問題。

蘇維埃政府成立後一個禮拜內，第一次女工大會——代表五萬以上的婦女——便在比得格勒開會，討論母親的贍養問題。郭倫泰對於母兒應受政府大量保護的提案成為討論的原則，但是女工自己加以許多補充，後來通過的社會保險法把她們的志願直接地反映出來。蘇維埃政府對於保持常態的生殖率，保證健全的子女，保障婦女的健康和力量以從事社會上有用的工作，這種種需要，有了充分的認識，並且承認母權是一種社會的功用和責任。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疾病保險令』是後來建立廣大精微的保護婦女法的基礎。由這一項法律立出工人工資以外的一種保險基金，包括蘇維埃共和國領土內一切僱工在內，不問性別，種族，國籍或工作的性質和久暫，並且後來伸張到用自己勞力

工作而不搾取他人的一切人們。一切工人的妻同在工業中傭工的一切婦女一樣得以應用此項法律。

母權的保障和保險之一切制度，一方面由郭倫泰所指導的公益委員會推行，另一方面由 *Zerkomfund* (勞工委員會) 推行。前者組織必需的機關並且供給女工物質的幫助以減輕母親的擔負，後者則推行先前說過的工作標準與勞工保障的法律。一九一八年一月『母兒保護局』正式成立，一切保護母親的機關都統轄在它下面。同時該局又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功用如下：

- (1) 讓母親來照顧小孩——小孩所吃最好的一滴乳，是從母親的乳頭流出來的。
- (2) 要在社會主義家庭的空氣中來訓練小孩。
- (3) 為小孩創立健全的身心發展和樂觀的人生態度的基礎條件。

利什底娃博士被選為該局的局長，該局首先屬於公益委員會，後來改屬勞工委員會，最後成為衛生部的一部分，因為該局祇照顧三歲以下的小孩，所以側重醫藥方面多於社會

方面，雖然它和勞工委員會還保有一種密切的關係。

直到一九二二年，隸屬該局的機關不絕的增加。在一九二二年内，機關的數目因饑荒而陡增，隨後一年則又陡減，因為國家遭遇危險，中央政府必得取銷此種工作的供給，並且轉為地方的企業和政府的組織。

原來的理想，以為國家對於為女工照顧兒童的機關，同對於指導和醫藥的機關一樣，擔負整個的供給責任。但是到了不能再這樣做的時候，那些負責的人們決定不要鬆懈，吸取一切可能的供給來源的保持工作的進行。婦孺局的廣大宣傳已經收了效果。工廠，商店，衛生部，合作社，互助社，住居合作社，地方政府委員會，婦女部——各界人民都予以捐助。一九二六年鄉村託兒所所用去了一百三十萬盧布，其中有一半是鄉村團體和農民自己捐助的。其餘的由國家和地方政府供給。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常設機關的總數（夏季託兒所除外）實已恢復到一九二二年的數目，並且還在不斷地增加。如果我們把夏季託兒所也算在裏面，這個數目就要遠超過從前了。

保護母親與嬰兒的各種機關

	在 R. S. F. S. R.												在 U. S. S. R.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6	正月 —日	正月 —日	正月 —日
工廠與地方託兒所.....	14	78	126	565	688	914	447	503	535	603	631	739	7	7	8
常設鄉村託兒所.....	0	10	17	99	125	237	110	91	80	94	106	104	94	106	104
母兒院.....	7	92	121	370	418	765	491	362	313	287	245	439	287	245	439
育嬰堂.....	—	—	—	—	—	—	—	—	—	9	11	9	9	11	9
貧婦習藝所.....	—	—	—	—	—	—	—	—	—	—	—	—	—	—	—
嬰兒診療所.....	6	39	58	133	161	179	137	165	262	390	447	585	390	447	585
孕婦診療所.....	—	—	—	—	—	29	28	95	169	199	270	281	199	270	281
法定診療所.....	—	—	—	—	—	—	—	30	130	128	128	140	128	128	140
鄉村診療所.....	—	—	—	—	—	—	—	7	117	122	268	317	122	268	317
合計.....	27	219	322	1167	1372	2124	1213	1253	1607	1839	2113	2622	1839	2113	2622

此外尚有夏季託兒所共數目如下：

在 R. S. S. F. R.—1921—	在 Ukraine—46	在 U. S. S. R.—45
1922—125	123	248
1923—209	266	478
1924—524	426	950
1925—1,853	738	2,614
1926—2,919	873	3,908

從前面的表可以看出來，所增加的完全是『自由』式的機關，『限制』式的機關已經大大地減少（註一）。一九二二年以後，嬰兒診症所比任何別種機關都增多，最近幾年，鄉村診症所，法定診症所，和『窮母院』也見增加。

雖然許多共產主義者以為小孩的看護，應同革命初期的饑荒狀況一樣，完全要社會化，於是組織了許多限制式的機關，不過即使在一九二零年母兒公益大會中，利比底娃（自身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就堅決地主張母兒間能有最密切關係的機關。關於育嬰堂她說道：

『本局雖承認看護孤兒和棄兒的重要，但是並不覺得這種式樣的機關有一毫可取，因為嬰兒離開母親的乳一定多有死亡。不過，在這種過渡時期，既然有棄兒問題要我們處置，就必得繼續這種式樣的機關。不過，凡是自由式的機關發達的地方，棄兒的數目就大見減少，其中的意義是很深遠的。』

因為棄兒院和孤兒院的小孩不斷的死亡，該局遂決定把他們寄放到私人家庭中去。一

九二四年，他們請求莫斯科蘇維埃認可這樣一種實驗，送二百個孤兒和棄兒到精選的私人家庭中，這些家庭因看顧小孩可以得到一定的薪俸，小孩可以在監察下養在那裏。黨中各機關，先前反對這種計畫，以為是一種退步，後來見到在這種新制度下，棄兒的天亡率減少了一半，也就屈服了。從那時起許多他方採用了這種計畫。同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利比底娃說：

『假如我們機關裏邊有較好的設備，有受過較好訓練的職員，情形就要不同了。但是在我們現在的狀況下，家庭在嬰兒的發展上當然比育嬰堂更能供給一種較多刺激性的環境。我們不僅用這種方法減少死亡率，並且保證大部分嬰兒常態的發展，因為差不多在一切情形中，由育嬰堂訓練的嬰兒，智力和體質都是落後的。』

利比底娃更告訴我，內戰以來棄兒的數目已經大見減少。從前在莫斯科一處每年要收容二萬以上的棄兒，而現在全蘇聯的棄兒，和這個數目正相彷彿。

我時常聽到共產黨員與婦女部職員說及將來建設兒童美麗宅舍的計畫，在那裏兒童

可以完全離開他們的父母，而現在婦孺局實際的政策偏是這樣，所以我先前有一點驚奇。我請利比底娃博士爲我解釋政府對於本問題的態度。

『蘇維埃政府』她解釋說，『認定要負責照顧母親和各級兒童的健康，以及青年的社會訓練。這一項工作就由衛生部和教育部分擔。但是保障他們的健康的問題來得最先，在必要的時候，社會訓練的原則必得爲它犧牲。現在集體的教育的原則祇能部分地應用，第一，因爲經費缺乏，第二，因爲社會訓練的方法尙未正確地製定，第三，因爲人民的品質和心理還不能即刻接受集體的訓練。但凡在實施上證明出對於兒童最好的方法，我們都要應用，並且要繼續的應用下去。』

利比底娃博士以爲診症所的發展乃是她本局一種最重要的工作。

老俄國遺留下來的幾間診症所都是祇爲嬰兒設備的，並不包括懷孕的期間。它們沒有給家庭什麼幫助，也沒有推行教育工作。但是它們目下正按着德國和美國模範機關的辦法向前發展。最好的診症所還有它們自己的牛乳場，並且給與需要牛乳的人們額外的供

養。從小孩受胎一直到三歲的時候，它們時常診察母親和嬰兒。它們有演講，圖書館，展覽會。有一些更組織特別集團的深入工作，與美國社會代理人的特別工作做同樣的調查，以作進行預防工作的初步。婦女代表同它們一起工作，代替受過訓練的社會服務員。在原則上已經接受了巡行看護的意見，但是要達到美國這種工作的程度，需要有一個很長的時期。這是很有趣味的，俄國竟覺得『社會服務員』是推行它的計畫的一種重要因子。衛生部長希邁須珂 (S. Mushko) 在最近一篇演說中述及社會衛生——他的定義是『健康上的社會無影響的研究，以及消滅它們的方法』——已經在一九二二年首先探入各醫科大學。據他說，在俄國從事消滅一切有害的社會因子的時候，貧困是唯一的障礙，醫生實際上也變成社會服務員。

在鄉村裏邊，目的在把診症所變成社會的中心，在養育嬰兒以外，還給與婦女別種事情的指導，教授衛生的原則等等。在鄉村中，婦女代表巡行各家，把母親與診症所聯結起來，以代替巡行看護的職務。獨立的診症所還沒有組織好的地方，母親們常要用一天或數天的

功夫，坐在鄉村醫院或藥房，來領她們的小孩。鄉村醫生，其中許多是女的，對於這種工作曾經有過一種光榮的貢獻，時常給出免費的額外時間來幫助它的發展。但是要醫生和看護到鄉村工作是極端困難的，醫藥界既有人失業，而同時有許多鄉村缺乏醫藥的幫助。

社會保險法雖已廣播，但是祇限於工業，公務，和職業工人，以及農業工人。還沒有農婦的保險。雖然蘇維埃政府並沒有將現存的社會保險法視為固定的，不過現在還沒有進展的可能。婦孺局試行填滿這個缺陷，在鄉村裏而組織『相互保險機關』祇要繳納很小數款子，就能得着生育補助的保證，納款的多少，以年齡的大小與生育的可能而定。我還沒有發覺這種運動的很多的進步。在該局下面，『社會救濟會』的組織是比較普遍的。它們的任務是招募經費來幫助那些沒有受到正式機關的保證的窮苦母親。

重要的統計表究竟是一切成就的最好的指數。俄國的統計表雖同別國的一樣錯誤，但是說革命以來嬰兒死亡率縮減到兩個的數目，乃是很可靠的，至少是在大城市裏邊。

米希羅夫斯基 (Michailovsky) 博士在一九二五年第三次婦孺局大會中說，當一切戰

爭的時候，從歷史上看來，結婚和生殖的數目減少，死亡的數目增多。戰爭以後，結婚的數目增加，而生殖率祇在三四年內高漲，隨即降低下去。世界大戰以來，歐洲已經有過這樣一個循環。但是俄國同別的国家剛剛相反，生殖率並沒有減少。一九二零年俄國結婚的數目比戰前多兩倍。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結婚的數目降到戰前的水平，每千人中有八起結婚，生殖的數目比戰前略見減少。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一千人中有十三起結婚，直到現在還是這樣平均的數目。離婚法令公佈以後，整千的多年怨偶趕快來利用，所以隨後幾年的離婚數目是特別的多，但是到現在離婚的數目祇有百分之五或六。據其他報告最高的限度是百分之十。

歐洲俄羅斯戰前的生殖率，是一萬人中有四百三十八人。一九二三年降到一萬人中有四百二十五人，一九二五年又增高到四百三十人。從那時起，生殖率與結婚配偶的實際數目成正比例的比戰前增多，而嬰兒死亡率已大見減少了。從一九二五年莫斯科一千女工的答案中，知道一九一七年的嬰兒死亡率為百分之三十五，一九二五年已經減到百分之

十七。全俄國雖不能獲得此種問題的確實統計，但是從各遠隔部分的調查得着同樣的情形。大戰以前（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歐洲俄羅斯人口的自然生長是每萬人中有一百六十五人，而一九二五年就達到二百零一人。據米希羅夫斯基博士的意見，這種生殖率的增多與死亡率的減少實與戰爭無關。

雖然節育和墮胎等問題不直接受婦孺局的管理，但是該局非常關心這些問題的解決，因為這些問題在母性問題上有一種重大關係，這些問題在這裏是要略加述說的。

因為俄國承認墮胎是合法的，於是人常以為俄國在鼓勵墮胎。剛剛相反，墮胎的增多實已引起醫藥界和政界極大的驚慌。我在莫斯科各書店選集了七種小冊子，都是由婦孺局，衛生部，或政府印刷所出版的。各小冊子對於墮胎的法律和施行手術的條件詳加解釋，同時都指示即使是最適當的條件下也有傷害的可能，書中載有墮胎後死亡和疾病的統計，並懇勸女人不要墮胎，除非是絕對的需要，例如生育時真有生命的危險，或她或她的丈夫有一種疾病會危及嬰兒的健康，或她的經濟狀況不能養育小孩。詳細說明承認墮胎的理

由是要減少因非法的和無知的墮胎所產生的死亡和疾病，並且保證最低度的危險。

反對墮胎的宣傳並不限於文字方面。有一種應用很廣的活動電影表演墮胎的罪惡，同時對於生育的全個過程加以指點，婦女部印布並組織產婆滑稽考驗和他項非法墮胎的表演。任何伯加或醫生被人發覺有非法的行動，一定要加以法律上充分的處罰。隣村有一個伯加坐牢，因為去年她施過一次手術。莫斯科各報紙最近登載，戈特利醫生(Dr. Gotti)——一個很著名的很受人推許的醫生——因為一個病人的死，被人發覺他爲了自己的利益，並且在不適當的衛生條件下在家中施行手術。檢察官請法庭予以監禁五年的最高度處罰，並且褫奪以後五年的營業權。

婦孺局的詹士 (Gore) 博士對於本題所下的研究工夫，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他曾進行各界人民深入的考查，努力求得墮胎的原因。他告訴我，俄國現在墮胎的數目當然比革命以前多，而且是日見增進，不過增進的實數並不如主張嚴厲處置的人所說的那樣多。因為從前沒有註冊，增進的數目必得部分的取材於較好的統計。合法墮胎的增多不一定就是

墮胎總數的增多，因為有很多女人明白可以有適當的手術，很少人應用老方法，並且『地下墮胎』的數目一年比一年減少。單從墮胎的數目上看，雖然每年略見增加，但是從與生產的百分比上看是減少的。舉例說，在莫斯科，一九二五年，每二萬一千生產中，墮胎的有七千，到一九二六年，每四萬生產中，墮胎的不過一萬一千。據詹士博士的意見，嬰兒死亡率和棄兒數目的減少也必得歸功於墮胎的承認。大多數墮胎出現在城市裏面。因為農婦的無知以及設備的缺乏，鄉村裏邊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墮胎還是不合法的。沒有兒女的女人很少從事墮胎的。在城市裏邊，墮胎的女人多數是在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已經有了一個小孩；在鄉村裏邊，則在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並且有了三個或四個的小孩。答案中所給的理由大致是這樣，多數墮胎是由於物質缺乏或家庭太大，其次是醫學的原因，再則是各種不同的理由，有的是優生上的關係，有的因為未婚的女人怕羞——這一個原因在鄉間的流行比在城市利害。有少數人則以現代婚姻關係不穩固為理由。詹士博士相信，所以有這樣多的墮胎主要的是由於住居的恐慌，因為許多請求墮胎的女人，都是同三個、四個或更

多的人住在一間屋子裏邊的。

母兒保護局以爲他們一般計畫和教育工作的發展，是抵制將來這樣大數量的墮胎的繼續之最好的保證。爲要尋求一種立即實施的方法以抵抗此種罪惡，利比底娃博士和詹士博士在做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母兒大會的報告中，皆主張節育方法的傳播是制止墮胎的唯一策略。

幾年以前，我初到俄國的時候，我很納悶，官方關於本問題所表示的態度——或竟缺乏官方的態度。確鑿的沒有一毫限制。城市中的藥房和 Rezinorost（橡皮托辣司）的棧房爭先陳列各種避孕的物品，並且印送說明書。對於鄉村的人們，以至不知道有這種東西的，或窮到不能購買必需材料的大部分城市人民，這當然是沒有用處的。在那個時候，我就無從發見官方對於本問題的相當態度。衛生部和政府人員彷彿討厭這樣做。態度消極的原因可以部分地由下列的事實解釋出來：因爲西方各國有許多節育宣傳的文字，許多共產主義者遂以節育爲資產階級救濟社會病的萬應藥，不能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邊存在，他

們對於本問題的解釋，乃是出發於種族的意識的限制的觀點，而並不任女人自由選擇願不願意生這許多子女。

共產主義者當然不把貧困歸咎於糧食供給和物質產源的不敷分配，祇歸咎於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道，以及現社會制度下祇有少數人可以得大量東西的事實。人口過剩的問題永不能難倒俄國。她的天然富源可以照顧大量人口的增進。如果考慮到他們是唯一共產主義的民族，受着許多敵國的包圍，那末，他們慎重的採取任何減少人口的方法，是一點也不是驚奇的。末了一層，因為俄國應用避孕方法的知識比西方落後得多，而且現在還用那些各地早已廢止的方法。因為民衆方面的無知，使得許多女人拚死運用凡所找得到的方法，結果是滿意少而危害多，因此許多人就以爲沒有一種方法是可靠的，而且一切方法都是有害的。

但是一切反對漸漸地消沈下去了，現在對於本問題的態度與四年以前大不相同。一九二三年婦孺局開第二次大會的時候，決定第一次公家的步驟，雖然並未贊許那樣的節育，

却已認可一切著稱的方法的考查委員會的成立，研究新的方法，並且加以保舉。在那一年的秋天，利威（Levy）博士，克魯波斯加亞（Krupnikova）產婦醫院的領袖醫生，委員會中的一個委員，刊行一本慎重措詞的小冊子，述說委員會正在考查着的各種方法，並未加以任何的保舉。第二年的夏季，局列寧格勒開會，雖然爲了國家和社會的利益而非難節育的理論，但是認可由醫生保舉的一定的方法的使用。在一九二五年該局的大會中，終於承認由診症所傳播節育的知識，作爲抵制墮胎的一種方法。

該委員會依然在探討十分可靠的方法。有幾個醫生在實驗母獸結種避孕法，並且說這樣辦法可以得到由六個月到一年半的避孕期，絕不危及以後懷孕的可能。約在去年前後衛生部刊布了幾種小冊子，詳細說明一切著稱的方法，並且這一類的文字到處都可以買到的。

（註一）『自由機關』把兒童整天的或幾點鐘的留在那裏，或祇帶了去考察和診治；

『限制機關』把兒童留住在那裏。

第十一章 人民的飼養

如果『每一個厨娘都要學着管理政府』如列寧所主張的，那末，在她別的職務上顯然要做出一點什麼來？因為女人，把一生消磨在烹飪，洗濯，縫補，和看顧兒女的事上，時常還加上工廠或機關的職務，很少餘剩的力量和精神來管理政府。在家庭得着適宜的居處，小孩得着看顧以後，第二個問題就是將家庭司食的功用移到社會方面。

『人民的飼養』是跟着革命來的第一批問題中的一個，金錢既已取消，而人民必得有以飼養。分配糧食的唯一工具便是合作社的機關，另外還組織了一個主持這件事情的『特別委員會』。合作社組織了無數的膳堂，有一個時候可以供給三百萬人的飲食。但是它們辦理得極壞，在內戰時期糧食恐慌到極點的時候，許多都停閉了。在那個時候，公共膳堂都設在污穢的，擁擠的屋子裏邊，祇有黑麵包和不潔的水，留給人們一種可怕的記憶，這要用多年的宣傳和教化來把它忘掉。

依據一種通盤的計畫來組織公共膳堂的問題，首先提出一九二一年春間的全俄糧食

大會來討論。大會決定，爲要適合新社會方式起見，烹飪和飲食的事務必須按着新的原則來組織消費合作社要在全俄組織網一般的公共膳堂，使一切家庭漸漸離開個人的餐室。隨後饑荒來到，凡可以用在建設的組織上的力量，都應用到設立糧站以維持民生的迫切要求上去。不等到一九二三年，本問題又重新提出來。鐵路首先倡辦這一件事，爲鐵路工人們造了一長列的公共膳堂。一九二三年的五月，*Zritel' (Nirokhy Priyazy)*——字義是『人民的飼養』——已經組織起來，目的是（如章程上所載）『組織模範的企業，以借款，出品和設備贊助一切合作社和社會團體；並宣傳公共飲食的觀念，給與這種企業的組織以相當指導；組織麵包房，罐頭和製瓶工廠；規畫出產的運輸；發展信用的便利；並在全俄開設分處。』

Zritel' 發出一百盧布一張的股票一萬張，由各工業，各合作社，各組合的機關分別擔認，一九二三年的上半年，以一百萬盧布的基金開始營業。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年底，已經組成五百零八間膳堂，一天之內可以供給四十七萬八千份正餐。在私人組織的飯館以外，全蘇

聯共有一千二百三十間公共膳堂，是由政府及合作機關依據這種原則組織的。工人普通的膳費，平常分三種：二十三十，和四十個戈比。有的機關祇能這樣，供給普通人民高價的飲食，特別廉價則限於工人和會員方面。去年他們也討論到學校中的補養問題，因為據醫生檢查，城市中大部分的兒童是滋養不足的，並且有許多和學校相連的膳堂已經開設，兒童從那裏可以得到熱的食物。莫斯科也開設了許多由 *Narbut* 主辦的膳堂，一天供給五萬九千份熱餐，每餐取價三十五個戈比。

膳堂所吸引的多數是獨身工人，但是後來許多家庭也開始加入用膳了。有一個『工農視察』委員會，一九二六年春季調查過莫斯科的狀況，據說當時的狀況還是很不滿足，因為祇有百分之三十一的工人，全人口的百分之五·五是恒久的顧主。委員會所發見的工人所以居少數的主要理由，是膳堂在實際上容不下許多人；它們還不能取廉過家庭膳費的價格，有時價格高到五十個戈比；多數是設備不週和不合衛生的，而且環境很使人不愉快。許多膳堂不過沿用舊日的餐館和 *Rankins*（咖啡室——但不是格林尼治村式的）。

並且沿用從前不適當的設備，繼續從前不便利的和污穢的方法。在莫斯科，祇有六間膳堂應用預備飲食的機器方法。大多數的工人膳堂是管理得極不週全的。

這種運動的進步所以遲緩的別一理由，是大多數俄國女人極不願意放棄她們自己的廚房火爐——雖然這是一種奴隸的象徵。這是擊碎許多公共的實驗的礁石。在俄美農場裏邊，我們得到一種難於提倡家務組織較有效用的方法的實證。美國人已經領過一所很大的房子，並且組織了一個公用的廚房，膳堂和家務是當然有的了。按照情形把房子改造了一下，以便做利便的集中的廚房。到了美國人必得搬走的時候，把房子退還給俄國人，以為他們一定喜歡有這樣一個機會來過一過比較經濟的生活。起初沒有一個俄國人肯搬進去。後來有幾家被人勸着搬進去了，但是不出一個禮拜，其中有兩家已經在自己的屋子裏邊築起笨重的俄國火爐來，別家的女人則在廚房中擁擠着把食品携回自己的家中去。

在莫斯科 Narvit 的總部，我見着委員長韋倫金 (Vilenskin)，他能够有一點並且也能够說一點英文，很吃力地繙譯海軍警備團 (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 關於戰爭時

飼養整千船廠工人的偉大實驗的報告。

『請聽我說』他對我說，『你能不能給我一些關於美國的工人飼養，關於你們長列膳堂的文件？有沒有有一些關於兒童膳堂的印刷品？你們那裏一定有許多方法，我們也可以應用，並且於我們極有益。』他領我到一間設備完善的實驗室，室中有幾個敏捷的，穿白圍裙的工人，正在忙着表冊，試驗管和天秤。

他說，『我們在這裏試驗我們各處膳堂每天預備的糧食。他們將一禮拜中每一天的菜單樣品送到我們這裏來。我們考驗食品的质量的比較，溫素的價值，和清潔。依據我們研究所得，給與菜單上較大變換的指導和建議。我們的視察員時時到膳堂去巡察，要他們確切的奉行我們的指導，並且厲行我們清潔的規則。』

他走到一個食櫃前面，拿出一大抱一冊子來。裏邊滿載着關於標準，溫度，蛋白質，礆水化物，以及脂肪質的圖表。

『俄國從前對於食物的質量未曾加以注意』他解釋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成語，「肚

子不是鏡子——你放進去的東西是不能看見的。——先前麵包和湯是我們飲食中的主要物品。生命素的重要是一點也不曉得的。經過這多年的流離失所，我們要特別注重人民的健康。這一件事祇有藉着組織完善的廚房和膳堂才可以有科學的成功。因為大多數農人在家中所能得的食物是很惡劣的，我們要給他們一些比較滿意的東西來除掉他們的老習慣——但是我們還沒有辦到這一步。別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工人飲食在生產上實際的影響。由我們的調查知道俄國工人的生產力比較其他各國特別低下，飲食乃是主要原因中的一個。』

「Narbit 組織」一個『科學食品會』研究糧食產品最合理的用途，出發點是營養和味道；購買、儲藏和預備的方法；與各類工作相關的菜單和標準；清潔的衛生的預備方法；膳堂形式的陳述，設置廚房和別的屋子的方法；*left-overs* 的使用，排列和印布關於人民飲食問題的科學的和技術的材料。

因為缺乏受過相當訓練的職員，*Narbit* 和莫斯科大學商量好設立一種飲食科作為

生物學系的一部分。這種實驗是很滿意的，現在所有學習這一科的學生，把暑期的光陰都用到實習工作上去。此外，Narpit 自己也開設了一種課程，教授衛生學，飲食生理學，勞力保護，救傷法，細菌學，簿記學，經濟學，和社會飼養的技術，公共膳堂和廚房，貯蓄和烹飪等的組織和管理。

Narpit 的工作並不限於本問題的科學的和技術的方面。他們明白食時的環境會影響食品的消化性，環境愈愉快愈安適，男男女女就越迅速的離開家庭吃飯。Narpit 有一個特別文化部，由摩羅娃 (Moirova) —— 一個共產主義者 —— 掌管。她的職務是編寫小冊子和指導法，組織并鼓勵公共飲食的社會方面。為要達到這個目的，Narpit 獎勵并且贊助與膳堂相關的讀書室或小組的組織，在那裏置有報紙，雜誌，和書籍。有人建議牆壁上要懸掛宣傳性質和藝術性質的廣告；開設特別的展覽會。與圖書館相連的要演講，電影，音樂會，和班課。提倡壁報，用膳者和勞動的職工都要加以贊助，stolkors (膳堂通訊員) 的團體也組織起來。又有人建議要有一個特別委員會來游說旁的工人加入膳堂用膳，一個

通訊和法律指導局，以及報告最近新聞的一塊黑板。莫斯科模範 *Zarpit* 膳堂進行大部
分這樣的活動。別的在進行上有各種程度的差異，或者簡直沒有進行。

現下正在討論何者為最滿意的方式：各具廚房的獨立膳堂，或分派食品到各分堂的「
中央工廠廚房」。兩者都在嘗試中。*Zarpit* 所嘉獎的是伊凡諾夫渥斯奈沁斯克的工廠
廚房。在一個大紡織中心，有集中在一個區域整千的工人，要為每一個工廠建設獨立的膳
堂，費用就太大了。十七個當地工業的和社會的組織聯合起來，籌集了四十萬盧布，用來補
葺并且設備一個大膳堂。

大廚房中炫耀着洗菜切菜，和碾肉的希奇的機器。一天要預備一百 *poeds*（註1）或一
百 *poeds* 以上的菜，祇須僱用兩個工人就可以辦到。一個堂廚可以照顧五個大氣鍋，而且
同時可以做別的事情。用髒了的碟子從通膳堂的窗子溜到一間接連的小屋中，洗濯機就
裝在那裏。一個女人可以做幾百個女人單獨做的工作。廚房中空氣和光線都很充足，并且
是毫不苟且的清潔，一點也沒有油膩，煙薰，和格格的聲音。廚房的隣室有專為廚子和助手

設備的冷熱灑浴器。

一天之內要預備四千八百份到五千份的正餐，祇須九個廚子和二十個廚工做八點鐘的工——一個廚子能做九百三十份，至於普通的 *Narpi* 膳堂，一個廚子祇能做二百份。與工廠廚房相連的總膳堂，一天能供給二千份以上的正餐。其餘的都用保熱器裝送到各工廠的膳堂去。從德國輸入的鍋子專充這種用途。傳遞的時候減少百分之五的熱度，鍋內的食物還可以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熱度，由嘗試證明，放在鍋內兩三點鐘的食物，祇減少百分之八到十的熱度。這種保熱器還不能十分令人滿意，他們方在試驗俄國工程師所發明的一種。如果禁得住當下的試驗，俄國將要大規模的製造保熱器了。本年他們也將俄國的出品來代替外國的山藥洗濯器。不過因為蘇維埃的工業還未充分地發展，不能製造一切需要的物品，*Narpi* 不得不向外國再定購五百個保熱器，并且撥二十萬盧布來購買工廠廚房的設備。

伊凡諾夫、涅斯奈、沁斯克的工廠廚房所供給的正餐，定價為二十，三十，到四十個戈比。我

在一個分膳堂中吃過一次味道很好的飯。開頭是很好吃的 *horsed*，隨後從保熱器中取出一份蓋着肉汁和搗碎的山藥的熱氣蒸騰騰的肉食——並且還有茶和黑麵包。環境很簡單，點綴一些花木，擺着四個或五個人用膳的小桌子，上面蓋着漆布，每餐之後都是小心地揩乾淨的。各人自己去取應用的刀子，叉子和羹匙，自己向櫃台上定餐，並且親自將餐拿到桌子上面。當你把如數的刀，叉，羹匙退回的時候，你就領得一條籤子。

這個工廠廚房是在一九二五年的三月開辦的。在四月的時候，他們供應六萬四千七百十八份正餐。到一九二五年的十月，他們一月中供應十五萬份。下一年顧主的數目增加了一倍。在這種企業上約共用了五十萬盧布，兩年之內，他們能夠有六萬盧布的公積金，得到一萬盧布的淨利來擴充營業。在尼內諾弗哥羅 (*Nijni-Novgorod*) 已經造成一個相似的工廠廚房，別的正在頓河流域和聶伯拔托夫斯克 (*Dnieperpetrovsk*) 着手開辦。經驗告訴我們，從產品的取得，手續的機器化，費用的減低，衛生狀況和工人狀況的改良等觀點上看來，工廠廚房在預備食品上是要好過私人餐室的。

一九二七年的二月，在莫斯科舉行 *Zarpt* 大會，對於他們的工作的缺點加以嚴刻的批評，並且決定特別努力來減低用費，徵取較廉的價格，因為現在工人要把一半的工資用在飲食上頭。

(註1) 1 Pood 等於三十六磅。

第十一章 未來的公社之建設

沒有疑問，在俄國凡是生活的新方式正在形成的地方，家庭的單位越來越縮小，而且也減少了它在社會上的重要，集體及其在社會的和文化的生活上所必須有的一切貢獻，代替了家庭的地位，把從前限制婦女的地域無量地展開來。家庭之所以重要，不過因其相對的穩定對於將來市民的產生和訓練是重要的。家庭能將現在的功能保持若干時候，全靠國家能否證明自己可以處置這種職務而定。

因為家庭既消融在集體以內，其次的問題就是個人能否從這個過渡時期有所獲得，在俄國發展着的集體能否比較往昔的家族有更多的貢獻。這是指着俄國生活的各方面說

的，因為集體接觸到各方面。祇憑着個人現下所見到的情形來評判是不夠的。在過去的和近近的歷史中，凡是造成這種情形的一切要素，以及方在計畫的一切，都必得加以考慮。

蘇維埃政府於是在取得政權的政綱上規定要『設立社會生產程序有計畫的組織，來保證社會各個人的幸福和普遍的發展』。（註一）土地私有制的廢除，天然富源和工業的國家化，統一的經濟組織，工業和農業的密切關係，以及國內未脫原始的和發達的狀況的事實，給與俄國一種別國從來未有的機會，來規畫他們經濟的和社會的構造的未來發展的進程。

實現這一件事的一個機關是『政府設計委員會』（或稱 Gosplan）。到此時為止，它的主要任務是在調節工業的各種部門，以求免除彼此間的軋礫。不過，政府設計委員會，在將來的社會的發展上，也佔逐漸增多的重要部分。爲要詳細探討這個問題，並且估定社會間相互的關係及其對於工業、農業和運輸的依賴，必然要歸結到地方計畫的範圍。這並非完全說大的水動力靠近力源，工廠接近原料，貨物之合理的流通，乃是說工業流弊——把整

百萬的人聚集在不安適不衛生的生活狀況下，沒有適當的飲食，沒有日常居家生活或任何別種生活的寬闊和閒暇——的逐漸滅除，以及一種社會的新方式的發展，結合工作和文化，結合城市與鄉村最優美的質素。

他們不過方開始從事這種計畫。在現存的城鎮和新起的區域中，已經興辦了許多建築，並沒有應付一種目前要求的任何計畫。他們所受的妨害，不祇是經費缺乏，並且是組織中的官僚習氣和多頭政治，不稱職和冗濫，以及僱用毫不同情於新制度的工程師和 *Spets*（專家）的需要。他們走到一種進退兩難的地步，不是匆匆忙忙地去闖禍，就得取一種緩進的辦法。這種情形在建築方面尤其真實，倘便要從便宜的暫時的構造和比較久遠的耐火火的適合將來社會組織的建築中選擇一種，極平常是要選前一種。在免除浪費的工作上曾經有過可悲的耗損。但是在俄國求進步的需要的證實平常是等於說在這種事業上將要成就一點什麼。

在地方計畫一方面，第一種實施的步驟，是幾年前國家區域的重行劃分，依據經濟特質

的標準，改變從前決定政府行政單位的無理的地理的區分。其次，當他們注意到建築中進行着一種投機的方法的時候，他們在政府設計委員會下面組織一個『建築標準局』並且發見建築計劃上所感受的困難，不是計畫太少，而是計畫太多了！在莫斯科一個地方，三年之內已經接到五千個工人住宅的計畫書——在這上面用去過多的時間和勞力，因為簡單的工人住宅及所籌備的款項，在計畫上沒有很大的選擇力。但是有幾個不同的團體匆忙地在從事這一類的競爭。政府設計委員會於是召集了一個大會，所邀請的不祇是那些對於住宅發生興趣的團體，還有國民經濟高等會議（工業委員會），農業部，和鐵路航路的代表。

大會多半來討論建築和城鎮設計的專門問題。但是重要的事件是這樣，發言的人一個不了又一個的提出下列的事實：他們不再能把他們的計畫限於單獨的住宅，也不僅要涵蓋全區，乃是要涵蓋全地方，等列一地方發展中的一切要素。

有一些人覺得全國的模範計畫可以由一個莫斯科的總局來製定，別的人就覺得絕對

沒有計畫可以製定，因為全國各部的天氣，社會，和經濟的狀況是大不相同的，一致的意見是這樣，距離，光線，換氣法衛生等相當普通的標準，中央可以依據既得的經驗來製定，保留着那些看當地情形來規定或變換的材料以及佈置的細節。結果是政府設計委員會刊布了一些關於新公社的計畫和建設的臨時訓令。訓令中註明要有一個新公社位置的初步調查，參加調查的人是一個工程師，一個醫生，一個農業家，和一個建築師。關於土壤和氣候的一切特性，衛生狀況和與隣境的關係，都要在設計前考慮到，良好飲料的便利要定奪，疾病的來源要免除。註定每一區至少要有一個廣大的公共運動場和一個會場，具有寬闊的方場，公園，和花園，最少要留出十分之一的草地，要為每五十個兒童預備一個遊戲場。房舍不能佔過全面積的四分之一，並且先要按着『open system』來建築——倘把牆壁連同一起來建築，就不能超過四間房子和十六個間隔的數目。樓房的高度不能多過三層，也不能高過街上闊度的十分之九，並且建築的方法要保證充分的熱度，光線，和空氣，同時不能因此損害其他房舍的這些條件。還有關於體積的條例，火險的預防，以及處置垃圾的指導。

訓令中也主張保存一切自然的美或有歷史意味的地方。提出三種房舍來：具有獨立家庭設備的個人住宅，具有公共家庭設備的住宅，或獨身者同居的格式。用於行政、文化、衛生等的建築是必需的。

莫斯科省區在設計方面更進一步。莫斯科蘇維埃規定該省區內一切建築物要遵照一種確定的計畫和條例來完成，並且刊佈莫斯科省區新城市和新鄉村的建築的詳細條例。同時要按照這種計畫來改良已建築的城市和鄉村。有一個特別委員會為莫斯科定出一些計畫來——逐漸拆毀舊建築物來擴大街道，同時要保存一切具有歷史的和本質意味的，或美的建築物和地址。增進公共效用的建築物會增進機械化，但是也規定要增大公共的方場，並且擴充公園和林蔭公路。城市要加以劃分，把中區留給營業機關和行政機關和旅館，其次的區域就是地方機關和醫藥的科學的以及文化的建築物。因為莫斯科的四郊接連着十足的俄國鄉村，在那裏沒有什麼偉大的建築物。所以這個部分最容易接受指定的設計。有人提議將這一塊地方造成該城的模範區域，一切工業的企圖都要有更遠大的

發展。

政府設計委員會也定出一個全城城市計畫的初步設計。設計的導言上說：『每一個城市一定要有一個計畫，每一個計畫要以創造最完全的經濟的、清潔的和文明的境況爲目的。』設計中所包含的訓令，有關於視察現在城市以求進步的，也有關於新城市的建築的。但凡和環境發生密切經濟的、文化的或別種關係的地方，都要定出一種當地的計畫來。

祇有在這些新區的基礎上以及類似這種計畫的發展上，才可以決定未來家庭的真正方式；那裏的生活將是非常有組織的。因此人們怎樣生活，都可以由自己的意向來選擇，不再受經濟狀況的壓迫。現下這種擁擠的生活因爲造成不自然而且緊張的狀況，一些家庭分裂了，又因爲到處找不到地方，另外一些家庭勉強地結合了。當現下的住居恐慌解決的時候，並且當新式公社發達起來的時候，然後那些心願同居的家庭可以在適當的狀況下結合起來，而其他的家庭也不再因了經濟的或社會的強迫來延續一種錯誤的難堪的境遇。有一些家庭也許要保持家庭組織的舊方式到若干年後，但其他的家庭（看現下

的趨勢是日見增加)也許不願再形成此一類任何的束縛,並且把先前用在家務上的時間來從事公共的活動。

政府設計委員會以外,其他組織和個人日漸高興來計畫問題。火花報(蘇維埃政府機關報)載有一篇重要的社論(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提到擁擠過度的危險,於是說:「建築房舍和開發水源等都不過是緩和的辦法,當着已經到了管理人民自身的時候。社論中寫道,『有計畫的條例並非是一種應急的特殊辦法,乃是適用於一個長時期的精密制度。這種制度定要免除大城市迅速發長的原因』」。

著者隨即提出來說,已經進行着的某幾種運動,因為對於剩餘勞動力(注入城市的速率約比戰前多兩倍)的吸收,可以幫助這個問題的解決。這些運動有的是鄉村新收穫和強度耕種法的輸入,工具和機器的分布(使農民在相當區域耕種較多的田地)農業集體的形成,鄉村家庭工業的發展,新面積的開拓,(據說,蘇聯現在耕種着的田地僅佔可以耕種的田地的四分之一)和戶口稀少的地方的移民。

不過依著者的見解，此外有一個更重要的因子，便是工業的分散。往昔各種工業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和一定區域中，但是在將來這些工業定要發展成爲小城鎮以至成爲鄉區。他總結起來說，『由這一點使我們歸結到，按着國中整個經濟體系的利便，來分配全蘇聯的工業的問題。』關於發展地方工業的需要，曾經有過很多的討論，並且已經取過幾種步驟來建設製造公田農產品的企業。

另外一個重要因子是依據一定計畫來進行移民工作。農民常是從俄國的這一部分遷移到那一部分，當田地饑荒或收穫失敗把他們從家中逐出的時候。這些移民有的是由政府安排的，但從來不按什麼計畫，祇爲了某種政治上的目的。平常是農民自動的遷移，單身地或成羣地離棄他們的家庭，乘着戴篷子的四輪車到處漂流，直到找着一個可以貯足的地方。饑荒後的那一年，一篷車一篷車的襤褸的人民和露着骨的牲畜，來自數百里以外的東方，返到撒馬拉省，那地方是他們十五年前土地不敷的時候離開的，當下他們聽見一種謠傳說，因爲饑荒的緣故，人民已經非常稀少，有很多大塊的田地荒在那裏，於是他們就回

來了。等到證明是謠傳，他們有許多人必須要轉回去。現政府打算阻止這種無目的的遷移，並且把土地饑荒的剩餘戶口與習慣相同的地方聯結起來，同時要使這種遷移適於全體的進行。統計所得，在俄國戶口稠密的區域，定要如此辦理的剩餘人口達到兩千萬，這個計畫至少要把其中的五百萬人在以後的十年內安排好。所有可以殖民的區域都已詳細地考察過，並且有了具體的報告可供有遠識的拓殖者參考。有些地方已經組織起小博物院，其中陳列着土壤和蔬菜的標本，關於農民對於他將要遷去的那地方所要知道的一切都有收入。在那裏有款項可以借貸，移住的頭幾年可以免稅，並且政府要為這些新社設置行政，經濟，醫藥，教育等必需的社會機關。去年前後大部分移民都是依據這種計畫辦理的，去年一年祇有百分之九·八的移民返轉了來。即使是遷移也要用來促進社會化的進程。經濟狀況在家庭狀況上的影響，鄉村比城市更爲強烈。土地饑荒既從家庭中趕去一些人去，於是家庭分裂了，留下的人因工作上的需要便結合起來。土地之合理的分配可以給農夫農婦以較大的自由來選擇他們的家庭生活。對於那些天然破裂的家庭，新社會結合比

較容易成立，爲要開闢新的土地，習慣和經驗相同的人們結合起來，使新公社的社會組織格外容易成立。

在俄國鄉村中沒有什麼外形的改變。建築計畫還祇注重在工人方面，社會化的進程在農民中間格外遲緩。合作社，互助委員會和各文化機關都是對於將來的重要準備，在現下的鄉村中也佔重要地位，不過並沒有在農民家庭實際生活中引起什麼變化。農業集體和公社的人口僅佔全體鄉村人口百分之二。並且，在鄙野的鄉村中這種團體日見減少，分裂爲較小較便利的工作單位。

革命方過後，政府鼓勵農民團體在舊田產上建立公社。但是因爲他們個人主義的舊方法過渡得太匆促太徹底，許多都失敗了。同時，從下層起，另有一種集體農業的形式穩定地發長起來。一個農夫的田地離鄉很遠，匆忙的月份他便露宿在那裏，這時運動便開始。其次，是當他搭一個草棚來度夏的時候開始運動。於是他得以聽見政府要把田地給那些願意合作生產的農民團體。他是窮到不能獨力建一所新住宅而且也不能長久居在那裏的，並

且農民是不慣過孤獨生活的。於是他聯合了幾個別的農人成立一個集團或 *trud* (勞働組合)。你可以看得出他們發展的階段很不齊。有一些農民依然住在鄉村裏，不過合力料理一大片田地。其次的階段是在田間建築幾間潦草的住宅，而且是輪流地住在那裏。最末的階段是建築新的住宅，并且成立一個新公社。

全部集體運動是革命以來俄國農業中一個最重要的發展，鮑得爾 (Karl Border) 在他論鄉村一本書中說得很詳細。我先前提到這種運動，因為它是農民家庭新生活的發展中一個最重要的成分。施行在此種運動上的計畫，當下祇涉及純農業方面——土地的分配，款項和機器的置備。關於建築物和市區都還沒有計畫到。不過這種運動也正注意到有計畫的組織。關於一定土地單位最有效能的人民單位，最適合此種發展的房舍種類，機器代替工人問題以及工業企業的介紹，皆經加以研究。在社會方面，這些組織依然是孤立的——甚至與通行鄉村中的社會利益都隔斷。不過這是因為它們還太小，太窮，太幼稚，並且經濟組織最好的形式都還未計畫出來。關於它們未來的發展，在規定任何現實計畫以前，

它們需要在實際解決問題的時候自行徵集較多的經驗。當集體各社團的發展能夠定出計畫來的時候，他們就要比舊鄉村有格外多的機會來從事社會組織。

關於將來鄉村公社的型成，另有一個重要成分，那便是 *Co-ops*，或說是政府農場。這種辦法是用舊日的田產來作榜樣，指示農民大規模機器化生產的利益。工業組織進步的理想藉着這種榜樣開始輸入鄉村。它們這種為農民服務的中心地位，使農民不斷地接觸這種進步形式的組織，確定不移地使它們成為鄉村中社會的酵母。它們也指示新式生活的方法，按照這種方法，農民依然留在鄉村，但要到大農場去工作，正如城市工人要到工場去一樣，在那裏可以獲得與耕種自己田地所得的同樣多的盈餘，而工作狀況的良好則不是他自己所能辦到的。

關於各項發展中集體組織的介紹，政府的態度清楚地表現在住居委員會一個演說者的演說中——『我們定要努力向集體方式過渡，但是必須考慮居民的習慣和他們對於個人方式的成見，並且在集體化的介紹中要格外地小心。我們不能斷定以後十年或二十

年內會有什麼樣的方式出現。」

隨着設計和機器化的發展，來了科學的組織，羣衆生產和標準化等問題。機器漸漸蔚成偉大的力量以形成生活的整個傾向。機器逐出假期中用來裝飾鄉村的那些華美的紡織物，逐出那些旅行者所喜歡的粗笨木杯和木匙，逐出曾爲歷代藝術和詩歌的靈感的優美景物。關於這許多把美和色彩給生活的東西之喪失，有的責備機器時代，有的責備共產黨人。不過這些舊日的東西美固然是美了，但是同時也必不可以忘記另外一方面。紡織物代表舊日家庭的女工和童工苛暴的榨取——因爲這一切工作都由他們來擔負。人若看見浸苧麻的淤水的臭氣中的工作（長天老日地在捶打和割截紡織的原料），或看見黑暗的農舍中披麻和紡織的長而且慢的手續（用上所有的勞力祇能製出有數的幾碼布，即使在小工廠中也可以比這個多製出一倍）——既看到了這一些，所有的美感都要失掉它的效力了。

但是舉凡存心破壞的舊俄國的美並不是意識的產物。舊俄國景物中豐富粗獷的美

乃是暴風雨的日子暮中狂亂無狀的美。小孩子所揮灑的強度顏色——前代海賊的粗野，雜着東方的奢華和東羅馬帝國的曲線和彩色，這是我們所知道的俄國藝術的背景。俄國城市的美並不在於一棟一棟的建築物，也不在於散漫無章的街道，但在於大體的印象，背景，過去年日所賦與的氣息。教堂自身是醜不堪言的，粗鄙而多飾的，具有圓球形的屋頂和小題大做的小十字架的，不過大體上看來，各城市具有許多染色的屋頂和金色的十字架，是非常壯麗的。

俄國現在常談的問題是怎樣用工業化來輔助文化和美；怎樣來做機器的主人而不做機器的奴隸。進程中倘有一些舊的東西都要去掉，同時要用其他的東西來彌補。但舊時無意識的民衆的美，依然是可以找得到的。譬如在一個偉大的民衆集會中，雜亂的旗幟川行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這裏邊就存留着舊日的美。因為力的貧困，使得許多工人穿黑皮短衫來取暖，用許多碼簡單花樣的薄紗應衣料的飢荒。不過這是一種暫時的需要。彩色的愛好深入俄國人的靈魂，是不會為革命或機器逐出的。

機器的輸入，在便宜原料的大量生產以外，給人另外一種感覺。機器自身具有剛健的美感。它那爽直而確定的輪廓打破舊俄國藝術紛雜的曲線。機器把樸素的氣分帶給圖畫，文學，戲院。實驗上的變化是非常大的，大家所希望用來鑄造將來的不是一個模型。要爲一切新的東西開闢路徑，但是也要保存舊時最好的東西。當麥伊賀爾（Meyerhold）激賞着他那勇敢而有生氣的，有着和諧的大衆的動作的，有着集體的英雄的新劇本的時候，小戲院依然按着優美的舊式樣來編製古典的劇本，而藝術戲院及其技術室依然用巧妙的個人動作來感動廣大的聽衆。

機器的精確把秩序和計畫帶入俄國人的傾向中。機器時代的到來，首先碰到俄國器具強固的原始背景，那就是說，他們定要免除機器發展中的許多障礙。這種情形，和他們的程序的性質，使得俄國在將來不會有莓因街（Main Street）的無意義，或紐約市的粗野。

末後一層，正當機器適應的歷程中，把藝術帶入生活，乃是從來未有的。這是由三種主要勢力助成的。第一，收集個人舊藝術珍品，化爲人民的財產；博物院發達和舊建築物的修

復。第二，藉了學校和俱樂部及劇場，為各個人留出藝術表現的機會。最後一項，藝術家：『建設家』的革命團體的努力，用藝術來直接滿足人民的嗜好，於是賦與藝術一種新的意義。他們相信，無所謂什麼『純藝術』，一件物品的美乃在於它功用上的適應。他們相信現世界沒有『畫架』，藝術家的地位，藝術家一定要成為專門家和工程師，一定要參加生產，並且要留心衣料，器具，宅舍和俱樂部及城市的設計。

阿拉托夫 (Arator) 在他所著『藝術與階級』中說及這一般人的哲學：『創造一個美的人生而不僅去表現它，融合藝術和生產，用人類集體的能力把人民所依以為生的質料造成社會有益的物品——這實在是一個偉大的理想——不愧稱為無產階級。』

由這種運動的影響，有時以灰色的難看的建築物表現樂利哲學和無產者的精神，有時是具有空中邊道的城市的幻想，那裏的地道與從前任何地道制度不同，一按機關便可以把你送到所要去的處方，雖然有的表現不免粗糙和惹厭，但是對於那些真想在社會利益上運用技能的人們，這種運動可以供給一種新的發動的媒介。有一些舊日的『畫架』藝

術家在紡織廠中編製紡織圖案，有的在編製書籍圖案，或製造器具，更有一些在設計人民住宅和俱樂部和療養院。他們把戲院當做一種强有力的工具，用來發達人民的體格，創造新社會的方式。宣傳，是的——祇宣傳熱誠的創造，不宣傳被動的屈服。在普羅利加爾（Проликарт）戲院，用男女工人來充藝術家，并把戲院放進工廠去，在機器和汽鍋中間安置背景，以表演工業。新舞台上沒有昂頭闊步的一個一個的英雄，祇是社會自身，各界來看的人。是一天寬廣一天。革命假日慶祝都變成戲劇的表演，工人大致都來參加。我在莫斯科見過這樣一個慶祝會，各處都有醜劇和戲劇在表演。詩歌和音樂對於他們是相伴的生命節奏。戲劇的形式和內容必須是革命的，是在感情上結合人民的，是刺激人民來共同活動的。在活動電影中，他們也找出無窮的機會來解釋和表演新式的生活。

我遇到了萬利拿希敏諾娃（Елена Семінова），她是建設派第一流的女藝術家，一個三十來歲的漂亮人。革命十週年紀念委她佈置 Red Square（紅區）——一個很大的光彩。她對於新藝術的可能性，正如婦女部那些富於政治思想的諸姊妹對於她們的使命，具有

同樣奮鬥的熱誠。她指給我看她爲工人俱樂部，圖書館，和膳堂所製各種極有趣味的計畫。

另有一個女人，斯特盤諾娃（Степанова），革命前方開始做未來派的畫家，革命後轉向紡織圖案，戲院和工人俱樂部的服裝，並且供給麥伊賀爾舞台背景一些新的意見。現在她是一個電影的導演家。我問她女藝術家在當下比革命前是否有較好的機會，她毫不躊躇地答道：

『當然啦！先前常有這樣的偏見，因爲是女人所以發生問題——現在是祇有才幹的問題——當下我同我的丈夫有同等的機會——並且當下比先前更多女人得以發展她們的才幹，先前祇是有資產的人才有機會。』

女人雖然可以進從未進過的藝術園地，不過在藝術界還沒有很出衆的女角色。因爲女藝術家（有特別天才和特別能力的除外），祇有等到她們的自由確定以後才能發展，而此刻還來不及實現這種效果。女人從不能要求別個來爲她犧牲，平常爲使天才得到創造力上完全的自由，這種犧牲是要緊的。一個男人可以爲了他的藝術或他的職業犧牲他的

家庭和他的朋友和他個人的生命——但是大多數女人太是個人的，感情的，拋不下那種細微的職務，這種職務佔據了她的全心，遂不能從事家庭以外的創造工作。不到未來的社會組織把她從許多舊職務中解放出來時，她就不會成爲藝術家。

我並不要說，俄國已經有了很順利的工作計畫，穩定地在建設這種未來的社會，供給人民一切文化和物質的需要——因爲現在是祇有它的可能性存在。我所要說的是俄國有這樣一個機會。關於俄國重要的不是人民已經有過勇敢的夢想——乃是他們用了造成世界的軟弱而愚蠢的個人，已經從事實現這種夢想，清清楚楚地認定他們自己將要實現的目的底可能性。

正如托洛斯基所說，『社會組織之意識的創造，曾經在人類史上佔一個不重要的地位……我們不能從我們的指尖捏出新式的生活來。在建設以前，我們定要曉得我們有什麼……指示給我們由革命的爐中製出過什麼樣的生活來……爲要把文化提到一個很高的標準，工人階級必須想到自身生活的方式……而改造我們生活方式的綱領，是要把女

人從家務的苦役中解放出來，給兒童以社會的訓練，把婚姻從經濟的壓迫下解放……」
共產黨人既已明白他們當下缺乏物質的和人類的基礎，不能按着他們的心願來改造他們統治下六分之一的世界，他們至少是在試着一部分一部分的做成一種適合未來模型的圖案。

(註一)見俄國共產黨政綱。



標商冊註

